古物新知

中國歷史教師教學資源冊

中一級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2025

使用指引

- 本教材以教師及學生為主要對象，提供與課程相關的知識內容及／學與教策略，支援教師教授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
- 本教材所提供的資料、視頻、相片、圖片、思考問題與建議答案等可作多用途使用，如課堂教學材料、課程規劃和學與教的參考、學生課業等。教師應配合《中國歷史科課程指引 (中一至中三)》（網址：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curriculum-documents.html），並按照學生學習多樣性、課堂教學、評估需要等，以專業判斷調整內容，以作出合適的處理。
- 就本教材的內容，教師可提供適切的補充或安排學生預習／延伸學習活動，深化學生對課題的認識。
- 教師應在學與教活動後進行解說，讓學生將新知識和想法與已有的知識和經驗作整合，以鞏固學生的學習。教師須採取審慎及客觀的態度，開放而細心地聆聽及了解學生的需要。教師亦可鼓勵學生將新知識和想法應用在往後的學習活動或日常生活中，使學習得以深化、鞏固和更有意義。
- 教師可以按照中國歷史科課程的宗旨與學習目標，選取其他正確可信、客觀持平的學與教資源，以助學生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培養正確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以及提升慎思明辨、解難等思考能力和不同的共通能力。
- 教師須提醒學生使用媒體時，須慎思明辨地檢視、分析和評估資訊內容，保持理性思考，不受情緒影響作出錯誤判斷或不當行為，並正確地、安全地、合乎道德地及合法地使用媒體，建立正確面對網絡資訊的價值觀和態度。
- 部分資料可能在使用時已有所更新，教師可瀏覽相關網址，以取得最新資料。
- 歡迎教師指正未盡完善之處，亦歡迎提供更新資料，以增潤內容，供所有教師參考之用。

前言

呂大臨（1044-1091）是北宋時期的一位士大夫，著作甚多。他編撰的《考古圖》是中國史上第一本古代青銅器的目錄，可謂最早的金石學著作。在序言中，呂大臨陳述了他編寫這本書的原因。他首先指出，從古至今，倖存的文獻實在很少。他說：「漢承秦火之餘，上視三代如更，晝夜夢覺之變。雖遺編斷簡存二三，然世態遷移，人亡書殘，不復想見先王之緒餘。」儘管我們覺得所流傳下來的文獻已經很豐富，但實際上，它只是古代文獻整體的一小部分。單純依靠文字研究古史，有極大的限制。幸好除了文字之外，歷代的文物也大量被保存下來，幾千年後仍不斷湧現。呂大臨在《考古圖》序言中也提到：「數千百年後尊彝鼎敦之器，猶出於山巖屋壁田畝墟墓間。」歷史文物可以補充文獻不足之處，或提供文獻中遺漏的歷史訊息，讓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史事。要鑽研歷史，需要充分利用傳世文獻，也需要積極利用歷史文物。

有鑑於此，嶺南大學歷史系與香港教育局在2020年開始合作編寫《「古物新知」中國歷史教師教學資源冊》，選取了二十四套歷史文物，其中既有眾所周知的，也有近年出土的，為中國歷史教師編寫了詳細的說明，闡釋文物的歷史背景及意義，並提供了如何在課堂上運用這些歷史文物的方法。「古物新知」一共三冊，配合初中三個年級每一學年的中國歷史課程。第一冊涵蓋的歷史時期最為廣泛。它從石器時代開始，藉由各種史前文物展示日益複雜的原始社會。隨後，我們解讀古代金文，了解它們如何生動地表現西周封建制度的運作。在接下來的三個單元中，我們利用各種各樣的文物進一步了解秦朝法律、漢代儒學以及漢朝與匈奴之間的民族關係。對於魏晉南北朝，我們選擇了司馬金龍（?-484）墓來說明該時期漢族與鮮卑族動態的文化互動與共融。接下來的兩個單元為大運河和唐都長安。兩組文物均提供了有關隋唐時期經濟和文化的豐富歷史資訊。在最後一個單元中，我們透過唐代僅存的少數宮廷繪畫之一「唐宮仕女圖」來了解唐代貴族女性的生活。

「古物新知」力求深入淺出，引導老師逐步了解文物的歷史背景及文化意義，加深對相關歷史年代的認識。雖然「古物新知」與呂大臨的《考古圖》相隔近千年，但它們理念是一致的，都希望利用流傳的古文物，配合傳世的文獻史料，重構歷史時空，更深入認識中國文化的豐富性和悠長的歷史。

目錄

1 石器時代 006
2 青銅器與西周封建 018
3 從文物看秦的以法治國 030
4 五經與太學 042
5 匈奴與漢的和親關係 054
6 北魏司馬金龍墓 068
7 隋唐運河新知 080
8 長安城與唐代多元文化 090
9 與唐朝女性生活特色及地位「唐宮仕女圖」 102

1 石器時代

何謂「石器時代」？

「石器時代」顧名思義是指主要用石頭製作工具的一段歷史時期。歷史學家又在該時段以製作石器的成熟程度為標準，細分為舊石器時代[1]、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2]。由於該時期的歷史遺址未出現文字，歷史學家亦將這段時間統稱為「史前時期」。研究新舊石器時期的材料均由考古獲取，比如歷史遺址、墓葬及具體器物——包括石頭工具和陶器。

本文將集中探究新舊石器時代對人類發展的影響，舉出仰韶文化西水坡遺址的蚌殼堆塑的〈龍虎圖〉及良渚（音：主）莫角山遺址的人獸面紋飾隨葬玉器，對比地域文化的異同，繼而以〈鸛（音：貫）魚石斧圖〉及黑陶足鬶（音：虧）兩項文物分析新石器時代的社會特點。

石器時代有何重要性？

石器的製造是判定人類智力進化的重要指標。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主要是兩者形體和腦大小的分別。野獸是依靠自身肢體的優勢進行捕獵，比如尖銳的爪、角、牙、強壯的軀體，或橫衝直撞用利爪攻擊或噴射毒液置獵物於死地。在身體構造上，人是不可能跑得比麋鹿快，牙齒也不夠狼虎鋒利，但人卻可以把牠們變成「盤中飧」，以野獸的毛髮造獸皮衣保暖，甚至將牠們引以為傲的利齒、爪、角化為武器。這一切皆因人類掌握製作石頭工具的方法，而動物不能。可說，縱使體能不及，但人類在智力上凌駕了動物。

[1] 距今大約300萬年至1萬年
[2] 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

石器時代的另一大突破就是農業的發展。新石器時代開始，人類掌握基本的耕種技巧，以石頭創造出農具，方便耕種。又開始馴養動物，穩定了食物來源。農業推動了人類構建固定的居所，在各種因素刺激下，人口快速增長，社會模式也變得更為複雜。有關農業的影響，在此不詳細敘述，我們會在下文進一步探討。

中國的石器文化

石器時代的遺址散佈於全國各地，例如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華南地區、東北地區、內蒙、新疆等地[3]。在命名該時代的遺址時，考古學家多根據其所在的位置，在地名後綴「文化」二字。所謂的「文化」，是狹義以器物的裝飾花紋、材質、造型等因素，從技術層面來劃分地區特色，與時人所認知的「文化」的廣泛涵義不同。

兩河體系是中國文明的搖籃，自古朝代興衰多發生於此。石器時代最為廣泛研究的文化流域是有「中原」之稱的黃河流域，以及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有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4]；長江流域則有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屈家嶺文化、良渚文化等[5]。本文會集中探討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如何展現石器時代的多彩文化。

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

先民在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生活有很大的轉變，判斷這兩個時代的標準有二：

(一)製造方式

從伐木除草、翻地耕種到收割；捕魚的魚叉[6]和日常碾磨工具比如磨盤、磨棒、石臼、石杵等[7]，所有工具均為石製，正是石器時代的一大特色。

舊石器時代的石器設計簡單，一般用岩石如燧石、石英、瑪瑙等打造[8]。採用這些材料的原因是石料有韌性，較易成型，並且物料隨手可得[9]。工

[3] 吳山：《中國新石器時代陶器裝飾藝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37-61
[4] 同上註，頁37-52
[5] 同上註，頁52-55
[6] 劉莉，《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頁150
[7] 同上註，頁133
[8] 王兵翔：《舊石器時代考古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41
[9] 同上註，頁42

具類型有卵石工具、石片工具、石條和石斧四種[10]。它們均由人手打造或透過石頭互相打擊塑形，所以器物質感會較粗糙而且體積也較大。北京周口店[11]就是中國舊石器時代的重要考古遺址之一，洞中有大量石英、石片可用作例證[12]。

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品質更為精良，也越趨精緻，刃口較為鋒利，石器通體磨光。是時，人類開始用陶作器，故考古學家在不同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都有發現大大小小、品相不一的陶器。具體例子，請參見下文。

(二)生產模式

捕獵、捕魚和簡單採集是整個舊石器時代人類獲取食物的主要途徑。農業發展標誌了人類進入下個階段——新石器時代。起初，人類收集自然界野生的種子，隨意撒播在土地，作物產能並不理想，仍要依賴捕獵、採集等方法獲得食物。隨著不斷嘗試，人類慢慢掌握了農作技巧，選擇適當作物、種植地點，實驗出最佳播種及收成時間，作物的產能緩緩增長。最終，人類擺脫了對捕獵的依賴，定居在固定的地方並開始馴養動物。

新石器文化的共同點

以下將針對新石器文化的三個共同點：農業社會、群居村落、陶器製作逐一分析。

(一)農業社會

中國幅員廣大，地貌和氣候南北各異。縱使南方和北方都是以種植糧食為主，但所栽種作物的類型也有很大分別。

中國北方氣候較乾燥，土壤屬於乾土，所以多種植小米等耐旱作物，是粟農業[13]。南方潮濕多雨，所以農業較發達，盛產稻米，是稻農業[14]，比如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碳化稻[15]。江南一帶世有「魚米之鄉」的美譽，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遺址發現石犁、開溝犁和耘田器等工具，就是先民耕作水田的證據[16]。

[10] Stone Age--Britannica Online Encyclopedia及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頁46
[11] 位於北京西南48公里
[12] 王兵翔：《舊石器時代考古學》，頁41
[13] 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頁434
[14] 同上註，頁436
[15] 陳同濱：〈世界文化遺產良渚古城遺址突出普遍價值研究〉，《中國文化遺產》，2019年04期，頁55-72
[16] 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頁79

耕種方法

「刀耕火種」是古代最為常用也最直接的開墾方法，其經濟成本低，效率高，所以許多地區沿用這種方法。石耜（音：自）和開溝犁都可以翻動較大塊的泥土，從而砍斷植被的根部[17]，更方便清空一處。清理雜草後，先民會焚燒該處的草木。草木灰燼含有礦物質，可令泥土更為肥沃，從而提高農地的生產力。收成過後，再次焚燒草木，等待土地恢復營養便可繼續種植作物。

飼養家畜

捕獵者和獵物的角色並非固定，單純依賴野外捕獵維生的風險非常高，小則因獵獲不豐受餓，重則有生命之危。在農業發展穩定後，人類逐漸減少狩獵，而且想方設法馴化動物，令牠們為自己服務或把牠們圈養起來，成為日後的口糧。

人類選擇馴化動物的主要考慮是物種相對溫和的性情與較滿意的繁殖率，有六種生物在新石器時代被廣為馴化：馬、羊、牛、雞、犬、豬，合稱「六畜」。豬是六畜中最早被飼養且最為普及的一類，是新石器時代常見的牲畜，所以豬骨的出土數量在六畜中稱首，仰韶幾乎每個村耕遺址都能找到豬骨。豬也是良渚文化的主要肉食來源，學者指出卞家山遺址共出土動物骨骼兩千餘件，豬骨的數量就佔了七成[18]。

仰韶文化的南方遺址多出現水牛，這或是因為當時中國北方氣候較現在濕潤之故[19]。此時的牛耕尚未出現或普及，所以牛對人而言只是食物來源之一；良渚文化則沒有或較少養牛[20]。

小結

今日我們常說中國「以農立國」，這在新石器遺址就已經奠基。石製工具用於農業耕種，且數目龐大，製造也越見精良，反映時人對此甚為重視。另外，我們也從農業初步窺見「南北差異」，兩地不同的氣候、土質，不但影響到種植的穀物及飼養牲畜，乃至文化層面上也會出現異質化。

[17] 同上註，頁77
[18] 易華：〈良渚文化與華夏文明〉，《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05期，頁5-13
[19] 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頁89
[20] 易華：〈良渚文化與華夏文明〉，頁5-13

（二）群居村落

隨著農業穩定發展，食物來源充足，人類得到足夠的營養，增強體能也刺激生育率，人口漸漸增加，從而形成村落。

村落佈局與社會分化

「家」的古意是家居之中圈養牲畜，即養豬，後來才被擴大詞義，泛指人的居所。新石器時代發現村落遺址均以家庭為聚居單位，私人的生活空間和公用空間被明確分隔，村中也有燒窯用以燒陶。稍遠的地方有墓園，村民死後會被埋葬在該地，這也是中國傳統「生於斯，葬於斯」的起源。下文會選取仰韶文化西水坡遺址及良渚莫角山遺址群為例稍作分析。

甚麼是仰韶文化西水坡遺址？



蚌殼堆塑的〈龍虎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仰韶文化西水坡遺址位於河南省濮陽縣城西南隅，累計發掘面積5000餘平方米[21]。蚌殼堆塑的龍虎圖是仰韶西水坡遺址最特別的墓葬，以貝殼堆砌成兩種動物形態，死者置中，貝殼對陳列兩側。對於它們的構成，學者眾說紛紜[22]，但普遍認為該圖屬宗教性質[23]。除此之外大部分墓葬並無隨葬品，不強調財富私有，隨葬品中以生活用具最普遍，其次才是生產工具和裝飾品，基本上呈現出平等的地位[24]。可見當時的社會狀況較為簡單，無社會分層問題。

甚麼是良渚莫角山遺址群？

良渚莫角山遺址群平面為長方形，「南北長約1910米、東西寬約1770米，總面積約300萬平方米」[25]。良渚莫角山遺址有大面積夯（音：坑）土基址和大量的火燒土坯，學者認為此應為宮殿[26]。莫角山之北為反山，這是由人工堆築起來的貴族墳山，該處發掘出11座墓，隨葬大量玉器和漆器等。反山大墓或是最高統治者的墓穴，隨葬玉器上面刻劃人獸面紋飾，或為神化統治者的形象[27]。

小結

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告訴我們甚麼訊息？

從墓葬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業社會在經濟飛躍下衍生出階級分化現象。發展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社會開始複雜起來，階級和經濟分化也越見嚴重。我們可從墓葬大小和葬品的數量、質量推斷墓主的地位。

墓葬可以證明村內的階級分化問題，而遺址的防禦建設則證明村莊的「外交情況」，新石器時代的社會並不和平。良渚餘杭遺址有夯土城牆環繞，城牆寬約20至145米，周邊有水溝和護城河[28]。這些基建的作用有可能是防禦野外動物襲擊，更可能是防止敵人入侵。種種跡象暗示著部落之間或有武力衝突甚至戰爭，新石器時代的生活未必符合「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29]的獨立且和平的相處模式。

[21] 秦存譽：〈略論西水坡仰韶早期遺存的文化面貌與社會性質〉，《洛陽考古》，2018年02期，頁27
[22] 宋存國：〈淺議濮陽《蚌殼堆塑的龍虎圖形》的出土及意義〉，《北方文學》，2017年24期，頁94
[23] 同上註
[24] 秦存譽：〈略論西水坡仰韶早期遺存的文化面貌與社會性質〉，頁34
[2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穫〉，《東南文化》，2014年02期，頁31
[26] 嚴文明：〈良渚文化：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源頭〉，《尋根》，1995年06期，頁9
[27] 同上註
[2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穫〉，頁31
[29] 《道德經》第八十章

(三)陶器製作

雖然石器時代是以石頭製工具為主，但時人亦有造陶器的潮流，這個事實能從村落遺址發現燒窯及以陶器作墓葬品兩方面證明。

為甚麼先民要製作陶器？
上文提到農業發展是進入新石器時代的重要里程碑。只有農業穩定發展，種植的作物比生活所需要多，才會有盈餘。我們能想到，在農業社會中，收成會受天氣或自然災害影響，所以人類必然有積穀防饑的意識，在豐年儲存糧食，那麼在凶歲就不必挨餓。為了便利保存，人類便製造了陶器。

在舊石器時代甚少或沒有發現陶器的痕跡，因為食物的數量不穩定，僅能滿足基本需求，因此不需要儲存食物的器皿。反之，新石器時代就大量出土形式各異的陶器，故此我們可說陶器的製造是農業發達的佐證。

此外，大量生產陶器意味著先民需要投入更多時間製作。農業生產的特質就是並非一年四季勞作，有農忙，也有農閒。假如生活朝不保夕，先民是不會有這麼多時間去燒土為器，更不會在陶器上做花紋圖案，這點又可佐證農業社會的生活遠較原始社會的生活豐裕。

陶器的種類與文化

因用料與燒製方法不同，新石器時代的不同時期、在各個地區挖掘出的陶器便有了不同面貌。比如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所出土的陶器質料、顏色及形狀都截然不同。

黃河一帶出土的陶器顏色各異，所以黃河流域文化的仰韶文化又被稱為「彩陶文化」。早期到中期的仰韶文化多為彩陶，設計以器物、植物、動物圖案較多[30]，〈鸛魚石斧圖〉可為一例。

甚麼是〈鸛魚石斧圖〉？



鸛魚石斧陶缸（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鸛魚石斧圖〉畫於陶缸側，高37、寬44厘米，約佔缸體面積的一半[31]，白鸛向右側立趾高氣揚，鳥銜著似是白鰱一類的細鱗魚，而魚身僵直，誠然無力掙扎[32]。魚的右邊有一長柄圓弧斧，中間似是穿孔，可穿皮帶[33]。鳥銜魚和斧頭並列在同一畫面，略顯突兀，應有深意。歷史學家認為該圖案應是某氏族的圖騰，屬於酋長之物，斧頭證明他生前勇武，帶領氏族打敗敵人[34]。

甚麼是黑陶足陶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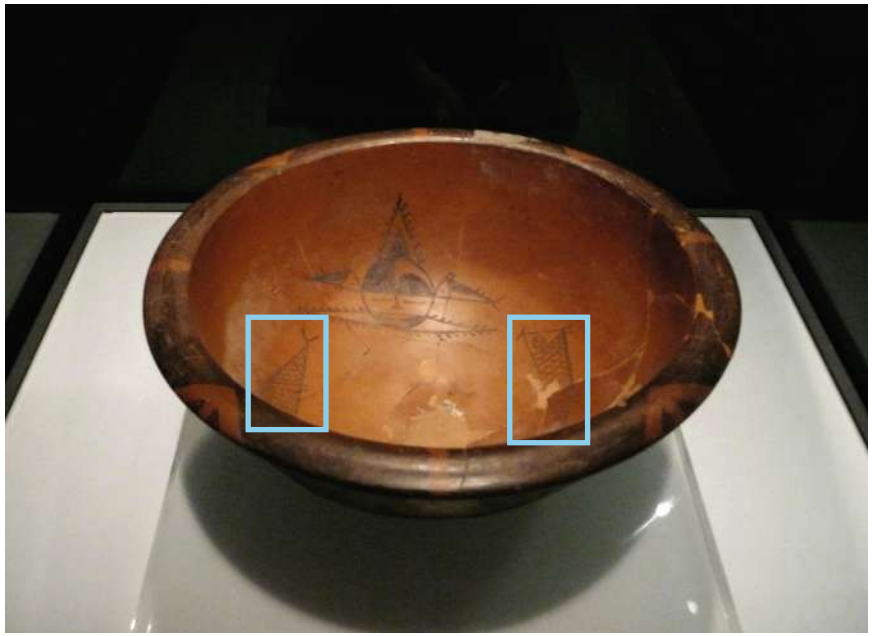


黑陶足陶鬶（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長江流域文化出土的陶器以黑陶為主，黑陶的胎壁薄而規整，刻劃紋最常見的是線條，有斜紋、旋轉紋等幾何花紋[35]，參見黑陶足陶鬶。該器造型典型，出土於雀幕橋遺址，現存嘉興市博物館。陶鬶頸細，身肥大，三足，有把，似是動物彎曲的尾部，或為溫酒器或盛酒器。器身有直線與橫線條文，形成幾何形狀，學者認為這些刻紋乃探索中國文字起源的重要線索[36]。

[31] 嚴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303
[32] 同上註，頁303-304
[33] 同上註，頁304
[34] 同上註，頁306-307
[35] 施昕更：《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杭州：浙江省教育廳，1938），頁24
[36] 吳山：《中國新石器時代陶器裝飾藝術》，頁38

我們可以怎樣以新石器時代的陶器認識歷史？



人面魚紋彩陶盆（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各地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陶器上出現了模擬植物、動物、人物甚至幾何圖案[37]，這些紋理是反映該地區風貌的重要線索，也是考古研究的一手材料。比如陶器上出現動物圖案，那麼該地就應有該物種，牠們或為人所食，或對人類產生威脅。如上圖出現魚紋，該地就可能是近水源。在考古科技未有如現今那麼發達的時候，這些圖案就成了考究當時地理狀況的重要線索。即使現今有鑽地挖掘，透過生物科技分析土層結構，這些圖案也可以作為證據，再次核實驗證結果無誤。

[37] 吳山：《中國新石器時代陶器裝飾藝術》，頁9

小結

陶器本身不是生產工具，而是食器、盛器、儲器或禮器等，具實際和裝飾的不同作用。燒陶需時，製造過程又複雜，當農業社會慢慢創造手工藝品，就表示了農業發展為社會帶來豐裕的經濟。另一方面，社會慢慢複雜起來，出現權威領導，分配包括人等各類資源，導致社會分工發生變化——並非所有人都是農夫，新的職業發展起來。

總結

農業是進入新石器時代的標誌，而農業令人類的生活模式有了空前的改變。從舊石器時代人類自由散居，從事簡單採集、狩獵捕魚，依靠運氣覓食，到在固定的土地栽種作物、馴養動物的定居生活，人類的生活質量無疑得到巨大的提升。農業發展除了減少尋找食物的不定性，更顯著增加了食物產量，刺激人口上升。因為人口大幅上升，人類從最基本的家庭聚居，發展到氏族共存，然後有村落，規模逐步擴大，自然過渡至青銅時期的城市、邦國。綜上所見，新石器時期的農業躍進對人類文明發展，可說是功不可沒。

從另一角度，我們也可以見到農業加速了社會分工，甚至令社會漸為複雜，出現階級分化的現象——只有少數人掌握權力，而大多數人為他們服務。

2

青銅器與西周封建

青銅器知多少？

人類智能的進步可以體現在工具的製造上。早在石器時代，人就懂得就地取材，以石頭和泥土製造出工具和陶器，方便勞動及儲存物品。隨著農業發展，食物的來源逐漸穩定下來，人口上升，人也有更多時間投入創作更精美的工藝品。考古挖掘出形形色色的青銅器，歷史學家推定它們是商和周時期的產物，因此將這段作器世代統稱為「青銅時期」。

故此我們認定青銅器是研究商周兩代的重要一手資料——青銅器本身就是歷史的敘述者，而它身體的銘文記錄著其身世遭遇，能反映當時的政治環境，是考究西周封建制度不可或缺的證據。本文將以利簋（音：鬼）、天亡簋、克罍（音：雷）、何尊、多友鼎幾組青銅器展現西周的歷史。

青銅器的出土及種類

中國最早的青銅器發現在甘肅的馬家窯內，經校正時間約為公元前3000年[1]。現有的西周青銅器基本出土於周原[2]附近，也有在甘肅、寧夏和大西北的發現，證明周幅員之廣袤[3]。

青銅器的種類非常多，功能也很廣泛，它們可以用來盛載食物、又可以是禮器、樂器、兵器、農具或裝飾品，不但有觀賞價值，同時具備實用功能。事過境遷，受戰亂、各種人為因素和自然災害影響，存世而又保存良好的青銅器只有少數。

[1] 李學勤：《青銅器與古代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2
[2] 周人的原都，周、召二公的封地。文王都豐、武王以下以鎬為都。李學勤：《青銅器與古代史》，頁12
[3] 李學勤：《青銅器與古代史》，頁13

青銅器的重要性

青銅器的重要性有三點：

1. 青銅器都是在歷史時段當下鑄造，可反映時代脈動。一經鑄造就難以修改，因此整件器物都是可靠的原始資料。

2. 青銅器並不純粹是器皿或裝飾，某些青銅器的器體還刻鑄文字——金文[4]，為研究提供文字記錄。採取「二重驗證法」，以銘文為基礎，對照《周禮》、《尚書》等古籍所記，兩者互相補足，又避免「孤證不立」的情況，可進一步核實古書內容的真偽。

3. 青銅器造價高昂，極費資源鑄造，所以在商周時期擁有青銅器的人必然身分非凡，既有官方認可，也是財富的象徵。這種高端的製造技術標誌著中國科技史的新高峰，間接反映西周王室和貴族對財富的積累達到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步。

《史記》記載秦始皇命人在泗水打撈周鼎一事。為迎取該鼎，秦始皇還特意齋戒沐浴，但事與願違，即使動用千人，也是求而不得[5]。縱使君臨天下、隻手遮天的秦始皇也苦苦求鼎，該事例足見青銅器的重要性：它不但是身份的象徵，彰顯了持有者的社會地位，同時亦有宣示及確立政權合法性的內涵。

製造方法

青銅器的外形分別不大，這是因為鑄造青銅器的過程非常複雜：工匠先將紅銅、錫、鉛等熔化成合金[6]，調配至適當比例，再倒入模具塑型高溫燒製。製作青銅器所需時間、資源、人手遠比製作石器和陶器來得多，而且技術也十分複雜，只有極為富裕、掌握重大資源的政權才能製造。商製青銅器，在造型的複雜性和銘文長度均比不上周製，這也反映周族的經濟、科技實力凌駕於商；而就以上的證據，我們也可推敲至少在西周初期，王室貴族壟斷了青銅器的製造。

[4] 又名金石文或鐘鼓文
[5] 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
[6] 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臺北：南天書局，1991），頁492

我們應如何閱讀青銅銘文？

青銅銘文詳細記錄了時間和地點，後代才能以此為線索，重塑周的歷史。不僅如此，我們還能從中推敲周代的官職制度、祭祀儀式等一系列與政治、文化、社會息息相關的事務，是歷史研究的巨大助力。不過，古文字與現今漢字的讀音和意義不盡相同，青銅器上的銘文對現代人來說就顯得佶屈聱牙。雖然如此，銘文有固定的格式，要讀懂並不難。

就以常見的訓誥和冊命銘文為例，大部分銘文都會先明確標示時間（以天干地支表示），再點明地點。這也間接證明周王的活動範圍不只是在首都，周王有巡視國邑的職能。封獎冊命多數在宮殿進行儀式，以表莊嚴。

接下來，周王會先回溯歷史，述祖先之德，許多銘文都會記錄文武二王克商建周一事。繼而會有一段對受封者或其祖先的讚揚辭，對他們的服務表示肯定。若此乃冊命，王就會宣布任命的官職並對其加以勉勵。

緊接著便是王的賞賜，銘文會列出禮品的名稱和具體數量，這些禮品都有一定的象徵意味。受封者感激王的封賞並因此作器，銘刻上希望「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類的祝願辭[7]。

閱讀銘文需要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受封者多對周王心存感激，而且青銅器的製造過程或由王室監控，所以我們也不可忽視青銅銘文有政治傾向，其所言之事乃王室觀點[8]。

第二，由於青銅器是後製的，所以會出現時間誤差，讀者需謹慎。比如該器是記武王答謝諸侯為其服務，因此有所封賞，那麼成器時間可能要到成王時期。這是因為製造青銅器需耗費時間和收集物料，得到王的嘉獎是件大事，作器者必然隆重其事，盡可能用最好的物料來製造。另一種可能就是後人作器紀念祖先的偉績，並藉此彰顯家族地位。

青銅器如何反映商亡周興的歷史？

許多青銅器都刻有銘文，這令青銅器不只是器具，而是歷史的一部分。西周早期紀念性銘文多與戰爭有關[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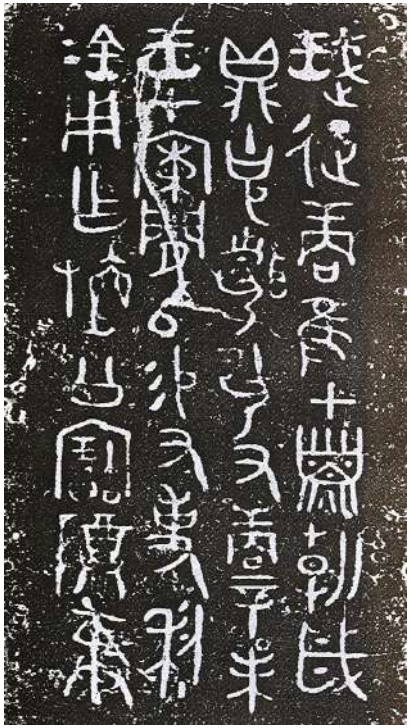
[7] 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頁355-357
[8]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頁22
[9] 同上註

（一）利簋（音：鬼）——牧野之戰，交代武王征商一事

簋是一種是食器，利簋1976年出土於陝西的一處青銅器窖內。器體有銘文四行，共三十二字，據考究應造於武王時期[10]。」



利簋
（圖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利簋銘文拓本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銘文大意：

武王帶領軍隊出征殷商，在甲子日的早上，歲星當空[11]，大勝。七日後，武王在管地駐軍，賞賜銅器給右史利。利因而鑄造了這件寶器作為紀念[12]。

利是該青銅器擁有者的名字。銘文顯示利是武王的右史，受武王賞賜，他因而作器記錄這場大戰——牧野之戰。利簋的重要意義是記錄了周武王向天下宣布周打敗了商的事實，商已成過去，周室是權力的掌控者。

[10] 王輝：《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31
[11] 吉兆，有利征戰
[12] 王輝：《商周金文》，頁34-35

分析：

那麼利為甚麼鑄造青銅器呢？他是史官，本身的職責就是記錄歷史，即使武王沒有對他進行賞賜，利還是要把戰勝商這件大事記錄下來。他得到金屬作為賞賜，即代表他有製作青銅器的權力，這是何等榮耀啊！故其將武王克商之事鑄在簋上。不難猜想其他鑄造青銅器者大多出自這種心態，畢竟王地位超然，得到封賜是很值得慶祝的事。以青銅為媒介，而不以其他隨手可得的材料造器，一來因為青銅材質堅硬有助保存，二來有具體器物能展示給更多人看，三來是能以此凸顯受器者（家族）的地位，最後就是青銅器本身有裝飾作用，能讓觀者賞心悅目[13]。

（二）天亡簋——武王祭天以示權威



天亡簋（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13]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頁22



天亡簋銘文拓本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天亡簋與利簋同是西周初最早的青銅器，其內容可補足利簋所言武王到管地之由，又反映了周初的天命觀。天亡簋是在清道光末年出土於陝西西岐山，器體有8行，共77字。

銘文大意：

在辛未日，武王舉行了盛大祭禮。武王率領西方諸侯，在太室山[14]上祭天。祭祀完畢後，武王由太公望陪同下山。之後武王在宗廟遍祭先王，特別為父親文王舉行了隆重祭禮。文王天命歸德，武王承其大業，推翻商王。丁丑日，武王又舉行了祭禮。太公望因輔助王祭天，得到王之賞賜。他永久感激，因而造天亡簋，以頌王之誇美。

[14] 今嵩山，主峰為太室山

分析：

天亡簋作於武王時期。天亡是器主之名，指的是太公望，也就是後代所說的姜子牙。他曾輔佐周文王及其子武王，是西周的開國元老。利簋指出武王戰勝商人後曾到過管地，而利也是在這個時候受到賞賜，天亡簋或進一步解說武王到此的原因。研究指出，武王此舉是準備出發到太室山祭天封禪[15]，有巡狩宣示權威的意味[16]。管地[17]與太室山相距約50公里[18]。換言之，武王從管地出發，登上太室山報天地之功，祭祀祖先，祈求庇佑，從而確立統治的合法性，並將這個消息昭告天下。

小結

從銘文中我們也可以核實周的建立、周王的經歷以及當時的政治局勢，因為這是青銅器的主要題材。將利簋與天亡簋並看，會發現周王常提及推翻商的管治而建立周這個政權，也一再陳述文、武二王之善。這些類似的段落重複出現在其他青銅器上，下文也有提及，表示周王認為姬氏得位是承天命，故有義務要推倒暴政，訴諸於形上力量將統治合理化。

青 銅器與西周封建模式

封建是周的一種政治模式。周武王成功建立周，因為國土之大難以一人控制，而且要嘉獎協助伐商的宗室人員、各部族和功臣，便把土地、人口、禮物賞賜給他們，讓他們協助管理。這些接受封地的人，被賦予公或侯的職銜，周王一般不會干預封地的內政，所以他們可說是擁有了封地的自治權。封建制度發展下去，公侯會在封地內部進行二次或多次分封，封地就像是國家的縮小版，一層層而下，自天子以至諸侯、大夫以至於庶人，構成整個封建系統。作為獲得身份和封地的代價，諸侯必須效忠周室，為周王提供軍事服務、覲見周王。

封建的特質我們都能在青銅器中窺見，而且青銅器也能敘述西周盛衰的故事。

[15] 封禪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典禮，君主向天地報告重整功業，同時表示接受天命、治理人世
[16] 李學勤：〈「天亡」簋試釋及有關推測〉，《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4期，頁5-8
[17] 即今河南省石佛鎮
[18] 李學勤：〈「天亡」簋試釋及有關推測〉，頁5-8

(一) 克罍——西周的分封模式



克罍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罍是酒器的一種。克罍作於成王時期，1986年出土於北京，有銘文6行，長42字，又名大保罍[19]。

銘文大意：

王說：「太保[20]，以你敬明之心，侍奉先王[21]。我大封土地，供你享用。我封你到燕地為侯，把六族劃歸燕國管理。」克來燕地就任侯，受王封國，於是讓人製作此件罍器，以示紀念[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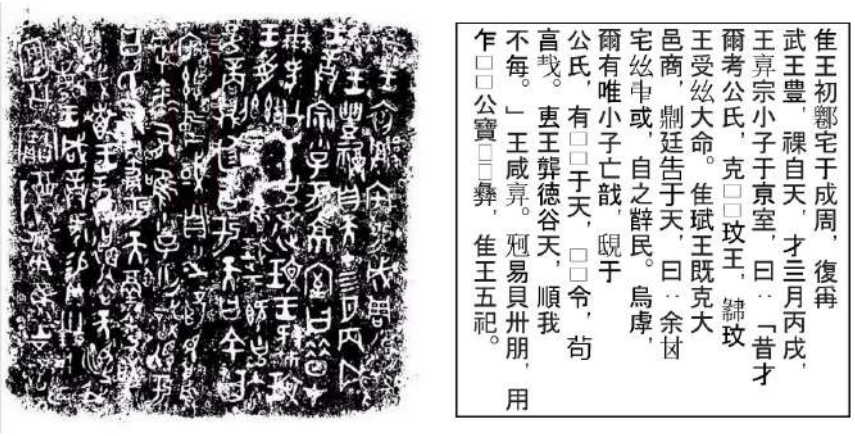
分析：

銘文中所說的「太保」是指召公奭（音：色），他與周室一樣姓姬，曾與周公旦一同輔助武王伐商，也是成王的重臣[23]。因受封於燕國，稱燕召公。成王為表率召公用心侍奉周室，便把燕地和六族封給他，交由他來管治。

[19] 王輝：《商周金文》，頁47
[20] 官職
[21] 周王，如文、武等
[22] 王輝：《商周金文》，頁47-49
[23] 《尚書・君奭》：「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二）何尊——西周官職的任命

尊是酒器一種。何尊刻有銘文12行，總長122字，因底部破孔，殘損3字，現存119字，記錄了成王對何的訓示。在1963年出土於陝西省寶雞市郊。



何尊銘文拓本（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隹王初䢅宅于成周，復稟武王豐，福自天，才三月丙戌，王彘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爾考公氏，克□□玟王，御玟王受茲大命。隹珷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自之辟民。烏虖，爾有唯小子亡哉，睘于公氏，有□□于天，□□令，苟享哉。恵王弗德谷天，順我不每。」王咸彘。𠂤易貝卅朋，用乍□□公寶□彝，隹王五祀。

銘文大意：

周成王五年四月，居於成周[24]，後來又折返豐京。四月丙戌日受天庇佑，大吉之日，成王在宮內召見宗子——何，對他訓話：「你的父親一直效忠文王、武王，文王受天命，而武王大敗殷。武王曾祭天祈禱：我要住在這裡，這會成為天下中心。你要謹記先輩的功勳，並效法他們，敬慎祭祀。我順應天意，對你作此訓示。」成王訓示完畢賞賜何貝三十朋[25]，何因此作此尊，以作紀念[26]。

分析：

何尊應作於周成王五年[27]。西周青銅器大致承襲商的傳統，但自成王開始，青銅器的銘文長度顯著增加，何尊就是一個好例子。從譯文可見周王並非只是出現在首都，也會在封邑巡視，何就在豐京覲見成王。何是此尊的擁有者，他的身份是「宗子」，負責祭祀致福之事。篇中成王先提及文王受天命和武王祭天兩件大事，繼而表率何的父親，讓何日後用心工作，恰恰是宣示了個人的權威。以上訊息透視了周代官位的世襲——何的父親是祭祀官，他也子承父職，擔任祭祀工作[28]。何尊的銘文為後代解讀周代的行政架構和官職提供線索，雖然未必直指嫡長子繼承權力，也未必保證官位的獲取只有世襲的方式，但不妨將此視為仕途的開始或一種可期的職位[29]。

[24] 今河南洛陽，成王欲遷都成周，但遇上困難
[25] 金文中用作貨貝的計量單位
[26] 李學勤：〈何尊新釋〉，《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頁37
[27] 李學勤：《青銅器與古代史》，頁186

（三）多友鼎——西周末年周邊民族入侵頻繁



多友鼎
（圖片來源：中文百科網）

多友鼎在1980年出土於陝西省的下泉村，作於西周厲王時期，有銘文22行，共277字。

銘文大意：

厲王某年十月，玁狁（音：險允）[30]重兵攻打周京，周厲王命令武公、多友率兵出戰。多友與玁狁激戰半月，四次大捷，在戰爭中共殺敵軍近四百餘人，俘虜二十，繳獲戰車合共一百二十七輛，玁狁大敗而逃。厲王得悉捷報，重賞多友，禮品包括酒勺、樂鐘、合金一百多鈞[31]。多友於是命匠以部分合金鑄造該鼎，並在鼎內鑄銘文，感謝周王賞賜，紀念戰爭的勝利，讓子孫後代永遠珍視祖先的功績[32]。

[28] 李學勤：〈何尊新釋〉，《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頁38
[29] 同上註
[30] 匈奴的一支
[31] 相當於現代的約3000斤
[32] 王輝：《商周金文》，頁221

分析：

多友是鼎的擁有者，他是厲王時期的一名武將，其功績在於成功打敗玁狁，保衛周室。以上銘文除了描述多友驍勇善戰的形象，更有幾個值得留意的地方：（一）多友與玁狁多次交戰，證明西周後期邊族入侵頻繁；（二）多友不是直接隸屬厲王，而是武公的武將。所以厲王要先命令武公，才能驅使多友出征；（三）武公作為諸侯，有對周王提供軍事協助的義務。

這些線索都鋪墊了周的衰敗，內憂外患接踵而來。西周之初周天子為穩定人心，分封諸侯，諸侯在封地擁有自治權，其權利與周王無異，日後容易坐大，威脅周王的地位。其次，周室依賴諸侯提供軍事協助對抗外來侵略者，假如諸侯離心，周室將無法控制大局。

總結——青銅器作為一手資料的利弊

研究青銅器對了解封建概念起莫大作用。周天子有巡視封國、分封諸侯、任命官員和祭天的職責。受封賞者多是因為服務或保衛當時或歷代的周王，又或者承繼祖先的職責，繼續對王表忠。如此之下，周王透過賦予土地、奴隸等一系列的禮物籠絡人心，受封者感恩戴德，事後作青銅器紀念該事。受封的領地可視為國家的縮小版，周王一般對此不加以干預，因此該處可謂是高度自治。諸侯仿效周王，設區內的行政架構，實施二次或多次分封，不過分封者還是名義上尊周。作為獲得禮物的代價，受封者及其部下必須為周王提供軍事服務，並服從國家安排。

不過青銅器作為史料涵蓋度不足。其製作費用高昂、工序繁複，非常人可以鑄造，故青銅銘文多反映王室和貴族政治發展，而未能從中得知低下層的生活。

3 從文物看秦的以法治國

秦位處西北邊陲，但由於文化落後，不受中原正視。經歷了變法圖強，秦兵強國富，躋身「戰國七雄」之列。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統一六國，自稱「始皇帝」，令秦從諸侯搖身一變成為天下的雄主。

秦始皇的功業只傳兩世，公元前207年劉邦攻佔首都咸陽，秦亡。不少學者將秦速亡之由，歸咎於窮兵黷武、好大喜功、修長城、築皇陵等，嚴刑峻法招致民憤。是篇將以「法」的角度切入，作出探討。

秦史最廣為研究之處有二，一是中央集權，二是以法治國。本文會以兩組文物為線索，解讀這兩個觀念——秦刻石折射出秦始皇以統一六國的功業為傲，確信秦的成功有賴法家的統治；而睡簡則印證了秦人對「法」的重視，展現了秦的治國模式。

秦 刻石

(一)秦刻石是甚麼？

秦始皇在大一統第三年（公元前219年）開始，七次巡遊各地，封禪祭天宣示權威，在名山大川之巔，立下七塊石碑，是為秦刻石[1]。詳情參見下表：

名稱	地點	時間
第一石：嶧山刻石	山東鄒嶧山	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
第二石：泰山刻石	山東泰山	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
第三石：琅邪刻石	山東琅邪	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
第四石：之罘刻石	山東福山縣之罘山	始皇29年（公元前218年）
第五石：東觀刻石		
第六石：碣石刻石	河北昌黎縣碣石山	始皇32年（公元前215年）
第七石：會稽刻石	浙江會稽	始皇37年（公元前210年）

秦二世仿效父親，沿著昔日始皇的路線巡視，「盡刻始皇所立刻石」[2]，確立自己統治的正當性。因此部分石刻的上半內容作於秦始皇時期，下半則作於二世之位。

遺憾的是，七石在天災人禍中亡佚[3]。即使現時保存最好的琅邪刻石也不過是把殘石黏合，僅能看到少數字體[4]，要研究這些刻石就只能依賴《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敘述[5]及後人的拓本[6]。

[1] 因為共有七塊刻石，所以也叫「秦七石」
[2]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3] 琦楓：〈秦刻石及其拓本的流傳〉，《紫禁城》，1982年04期
[4] 同上註
[5] 《史記・秦始皇本紀》只有六石文辭，欠缺第一石嶧山刻石
[6] 琦楓：〈秦刻石及其拓本的流傳〉

（二）秦刻石的重要性

目前考古學家並未發現秦始皇本人所寫的任何文字記錄，較貼近他的思想可數這七塊刻石，因此它們便成了歷史研究的一手資料。這或是他封禪的言辭，由史官或文臣記錄下來作碑[7]。無論刻石文辭的作者為何，石碑是秦始皇授權製作的，所以能反映及貫徹其思想。

後世對秦始皇的認知多是透過《史記・秦始皇本紀》，難免會摻雜司馬遷的主觀感受。儘管司馬遷本意不是誤導讀者，但他也想不到二千多年過去了，前人的著作已經散佚，只有《史記》得以保存，甚至成為研究秦漢歷史的權威典籍。如果不參考田野資料，僅用二手資料的記載，那麼今日我們所讀的歷史就只是某人對某事所抒發的看法而已。因此，在許可的情況下，我們更宜參考原始資料或文獻，再以《史記》為助，進行二重驗證。

（三）秦刻石如何反映歷史

七石的內容大同小異，均敘述秦始皇統一六國的豐功偉績，百姓生活安定的藍圖。每塊刻石都有明確的時間、地點，且所記主題一致。

統一大業，天下臣服

刻石花費大量篇幅鋪陳秦始皇統一天下，結束戰爭紛亂，天下臣服，為人民帶來和平的成就。

嶧（音：易）山刻石[8]、之罘（音：浮）刻石[9]、東觀刻石[10]和會稽刻石[11]特別標明秦始皇統一六國的事蹟，用詞貶低六國，陳其專權、暴虐嗜殺民眾的斑斑劣跡，秦始皇替天行道誅滅異端無疑是正義之舉。嶧山刻石更指出秦始皇統一天下，平定四海，為人民帶來和平的功績甚於五帝[12]，琅邪刻石也有「功蓋五帝」的誇耀之詞[13]。

不僅如此，泰山刻石[14]、琅邪刻石[15]、碣石刻石[16]、之罘刻石[17]陳述秦始皇夙興夜寐、親力親為、勤政愛民，把天下打理得井井有條，他的個人魅力感化群臣，讓他們心悅誠服。



嶧山刻石（圖片來源：Harvard Rubbing）



《秦泰山刻石》拓本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琅邪刻石（圖片來源：快懂百科）

[7] 因為刻文所用的是小篆體，可能為李斯所作。丁燕傑：〈秦刻石銘文作者辨析——兼述秦統治思想中的儒家因素〉，《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10期
[8] 嶧山刻石：「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
[9] 之罘刻石：「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眾，遂發討師，奮揚武德」
[10] 東觀刻石：「振動四極，禽滅六王」
[11] 會稽刻石：「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彊」
[12] 嶧山刻石：「功戰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
[13] 琅邪刻石：「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14] 泰山刻石：「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
[15] 琅邪刻石：「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
[16] 碣石刻石：「從臣群作，上頌高號。爰念休烈，戎臣奮威，遂興師旅，大逆滅息。武殄暴強，文復無罪，庶心鹹服」
[17] 之罘刻石：「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

社會和平的藍圖

刻石下半部分的內容與社會秩序有關，帶出「各安其位，各盡其責，不踰矩，盡享安寧」[18]的願景，呼應上半部分秦始皇制法之功[19]。

自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秦就以法家模式治國。秦國君篤信社會安寧有賴以法統治，秦始皇也不例外。他認為百姓只要明白法規且遵從規定，那麼國家就會大治——以法治國過程或會暴力，但最終是歌舞昇平的大治之世，我們可參考刻石內容猜測此想法。比如嶧山刻石有「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碣石刻石標明日後再無徭役，男耕女織，安居樂業[20]的期盼；會稽刻石則描繪人民奉公守法，社會和睦太平，無需戰爭的美好未來[21]。

小結

我們可以視七石為秦始皇的自白[22]，展示出其大一統的傲氣，及對未來施政的宏大願景；因為文字一再讚頌秦皇的功勳，而無絲毫低貶，我們也可看成為部下對他的討好之辭。

秦以法治國，嚴格控制社會秩序，目的是維護統治者的地位。經歷了諸如焚書坑儒等的歷史大事，後代對法家便有先入為主的負面觀感。不過，刻石所言人民守法、社會安寧和平，各司其職，恰如一個烏托邦。兩者有巨大的反差，以文物角度來看，秦法未必是惡法，而秦始皇也不盡然是暴君。這無疑是打破了我們對秦的刻板印象，不過原始資料本身是官方的說法，讀者誠需謹慎思考。

[18] 楊基煒引［美］柯馬丁（著），劉倩（譯），楊治宜、梅麗（校）：《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153
[19] 嶧山刻石：「治道運行，者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箸明，垂于後嗣，順承勿革」；琅邪刻石：「維廿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之罘刻石：「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箸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
[20] 碣石刻石：「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并來田，莫不安所」
[21] 同碣石刻石
[22] 高思莉：〈秦代刻石對大一統國家的精神認同〉，《中州學刊》，2020年03期，頁157-158

（四）秦刻石有何意義？

七石是由秦始皇授權而製作的，所以應是最忠於其思想之物，從中我們可以見秦始皇有大一統思想的自覺。刻石對統一六國的態度正面，並將之列為始皇最大的功勞，甚至還直言始皇功績蓋過五帝。東周時期諸侯勢大，周王失去權威，雖然名義上尊周，實際上都是野心勃勃欲取而代之。秦國對此亦圖謀已久，秦孝公開始商鞅變法，富國強兵，秦始皇繼承祖輩的志向，在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間逐步殲滅六國[23]，一統天下，結束五百多年的戰亂時期。

秦本來是西方的諸侯國，民風粗獷，以戰取勝。秦始皇的大一統需要向天下宣示自己的合法統治，因此在名山大川封禪，並立七石，讓臣民觀之。其所到之處涵蓋東部，七石中有五塊便是立於山東、南部和北部地區的新國土。秦國與山東六國[24]：韓、趙、魏、楚、燕、齊並稱「戰國七雄」，所以統一後頻繁巡遊山東各地，一來可以加強監控，二來是要鞏固民情，立碑極陳始皇功業「以功證德」[25]，「舉出百姓可見、可理解的事蹟來證明民眾受秦德恩澤，進而肯定秦統治之正當」[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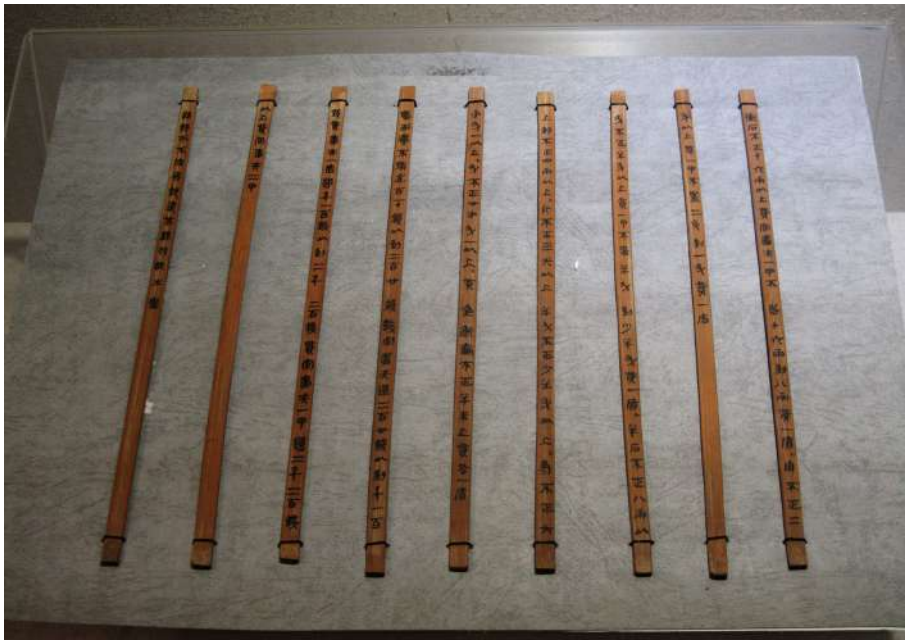
睡虎地法律竹簡

（一）甚麼是睡虎地法律竹簡？

睡虎地挖掘出秦的法律條文，為我們打開了認識秦法及當時社會的大門。

《秦律》是中國最早的明文法，對往後中國兩千多年的法制有深遠的影響，研究《秦律》更可以得悉當時的社會及政治發展模式。睡簡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豐富的資源。

[23] 林劍鳴：《秦漢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1
[24] 因地理上六國均處於函谷關以東，因而為名
[25] 楊基煒：〈秦德與秦法——從秦始皇刻石看秦王朝的帝國敘事〉，《管子學刊》，2020年第1期，頁76-80
[26] 同上註



《法律答問》竹簡/睡虎地秦墓竹簡——《效律》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睡虎地是指湖北省雲夢縣城關睡虎地十一號墓，該墓出土秦代竹簡高達一千多枚，當中秦代的法律令就佔六成[27]，成書時間最早可推至秦孝公時期的商鞅立法，部分為昭襄王至始皇初年的修訂本[28]。

竹簡中有一《大事記》，以編年體的方式記述秦昭襄王元年至始皇統一的大事，也有私名，以「喜」的記錄最為詳細[29]，故此推斷，墓主應是一名叫喜的男子。喜十九歲開始擔任地方的官吏，甚至曾參與秦的統一之戰[30]。陪葬物是墓主生前最寶貴的財富或能代表他身分的物品。把竹簡作為陪葬物，且法律竹簡數量眾多，喜應是地方郡縣負責主管法令的官吏[31]。竹簡內容也間接呈現了秦人對法令的重視，國家以法為治的方針。

[27] 黃展岳：〈雲夢秦律簡論〉，《考古學報》，1980年第1期，頁1
[28] 同上註
[29] 《湖北雲夢睡虎地十一號秦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06期
[30] 同上註，指出：「始皇三年（公元前24年）他十九歲，「八月，喜榆史」，就是在榆這個地方當官，秦始皇四年十一月，喜為安陸御史」，即他二十歲時在今（今湖北省雲夢縣）當御史，秦始皇六年「四月，為安陸令史」，即他二十二歲時在安陸管理法律的官，秦始皇七年正月甲寅，鄂令史，即他二十三歲時在郡（今湖北省宜城市）當管理法律的官；十二年，「四月癸丑，喜治獄那」，即他二十八歲時擔任有關獄方面的官，秦始皇十三年「從軍」，即他二十九歲時參加秦始皇帝統一中國的戰爭」
[31] 林劍鳴：〈從雲夢秦簡看秦代的法律制度〉，《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10月，頁67

（二）《語書》與郡縣制

儘管秦代的嚴刑苛法為後世所詬病，秦政府卻視以法治國為必然，並特意向地方作出解釋，這可見於《語書》——中央透過南郡最高長官騰頒發給各縣官吏的文告：

> 王二十年四月初二日[32]，南郡郡守騰宣佈各縣，告知官吏，大意是：各地有不同的鄉俗，但這不利於集體統治，因此地方的法律也要制度化，並跟隨中央的模式運作。秦王作法規，教導民眾，以強制的方式驅除人性之惡[33]。

《語書》記郡守騰在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宣布楚法被廢，日後以秦律管理郡內事務，官民從此應嚴遵法律。篇中所指的南縣原為楚國領土。歷史記載公元前223年秦將王翦、蒙武攻克楚國[34]，楚國正式滅亡。可見南郡在楚國淪陷前的四年就已經被秦吞併入版圖內，成為秦的一個郡。在未達成大一統之前，秦國已經在佔領的土地實行秦國的制度及律法，積極地實行同化政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王政正式統一六國，南郡也成為三十六郡[35]之一。

我們從《語書》的內容想像到郡守在地方宣讀中央頒布命令的情景，也可從中得知秦的郡縣制度如何運作：郡守是郡最高長官，他的職位是由中央任命，中央可以隨時更替，他的角色先是中央在地方的執法者，繼而才是地方最高長官。所以，《語書》的公告並非騰的個人意思，而是中央的旨意，騰只是按本子辦事，把中央命令告知部下、郡、縣政府的相關官員。墓主喜是南郡負責法令的官員，故此在他墓中的《語書》竹簡或是當時郡守派發下來的，或是喜聽到指令之後抄錄下來的。

除了楚地設南郡以外，秦攻佔土地便會視乎當地的規模，較大面積的設郡，較小的立縣，歸郡下，所以一郡便有若干縣。後世將以上的制度稱為「郡縣制」，秦統一後設三十六郡，地方需服從中央命令，天下大權盡歸始皇，開始了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故「秦制」成為中央集權的代名詞，恰恰與「周制」的封建體系相對。

[32] 公元前227年
[33] 《語書》原文：「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騰謂縣道夫：古者民各有鄉，其所利及好惡異，或不民，害於邦。矯端民心，去其邪避除巧之故。法律閒令下欺詐凡故居後有閒令下，教導淫去，除其惡俗，而使之於善殿」
[34] 中國文化研究院：〈秦始皇的大事年表〉：「秦王政二十四年，派王翦、蒙武攻克楚都壽春，俘楚王負芻，楚國滅亡」，網址：https://chiculture.org.hk/tc/china-five-thousand-years/466，瀏覽日期：2020年7月23日
[35] 數目其後有更改，而三十六郡包括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巨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咸陽至關中平原由內史管理是為一郡

《語書》的文字所指的秦王制法，呼應石刻秦始皇制法的功績，可見當時官方文件貫徹同一政治宣傳手段。秦的統一不但是將六國領土收諸囊中，無論在政治（法律）、經濟（度量衡）、乃至意識形態（法家思想）等方面全面實施相同的原則。

(三)《法律答問》——秦法分析

秦國的法令由國家頒布，在統一前秦國就規定在中央和地方設主管法令的官吏，專門處理法令和解釋法律條文[36]，可見於墓主喜的《法律答問》[37]。

秦律基礎來源於《法經》的六律[38]，性質是以刑法為主幹[39]，而後代慣用嚴刑峻法來概括。秦法之「嚴」有兩重意義：一為嚴謹，二為嚴厲，所以不應單純以「苛刻」標籤秦法。下文分兩方面解釋。

法之嚴謹——公開、清晰

學者認為秦法重視案件的真實，有法醫檢驗[40]和現場調查[41]的程序還原真相。秦律將控告不實視為刑事責任，避免誣告錯判，這可見於《法律答問》「告不審」的論罪[42]：

> （市民）問：甲控告乙偷牛，但乙實際是偷羊而非牛
> （官吏）答：因為甲誣告，給予假口供，所以應當以「告不審」論罪，判甲需繳納等同盾牌價值的罰則[43]

假如不滿控訴結果，被告人可上訴[44]，更有官員解釋法令[45]，規定死刑的判處是「三審終判」[46]，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實行拷打[47]，並要把審問過程記錄下來[48]。

[36] 林劍鳴：〈從雲夢秦簡看秦代的法律制度〉，頁67
[37] 曹旅寧指出「《法律答問》計簡二百一十支，內容共一百八十七條，多採用問答形式，對秦律某些條文、術語以及律文的意圖作出明確的解釋」，載氏著：〈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性質探測〉，《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3年01期，頁113
[38] 《盜法》與《賊法》是關於懲罰危害國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財產的法律規定，爲《法典》之首；《囚法》是有關囚禁和審判罪犯的法律規定；《捕法》是關於追捕盜賊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規定；《雜法》是關於「盜賊」以外的其他犯罪與刑罰的規定；《具法》是關於定罪量刑中從輕從重法律原則的規定
[39] 林劍鳴：〈從雲夢秦簡看秦代的法律制度〉，頁67
[40] 黃展岳：〈雲夢秦律簡論〉，頁3
[41] 同上註
[42] 同上註
[43] 同上註，黃引《法律答問》原文：「甲告乙盜牛，今乙盜羊，不盜牛，問可論？為告不審。貲盾不直，可論？貲盾」
[44] 乞鞫（音谷），《法律答問》原文：「以乞鞫及為人乞鞫者，獄已斷乃聽，且未斷猶聽？獄斷乃聽之。失鋈足，論可如失刑罪」
[45] 林劍鳴：〈從雲夢秦簡看秦代的法律制度〉，頁67
[46] 黃展岳：〈雲夢秦律簡論〉，頁3
[47] 黃展岳：〈雲夢秦律簡論〉，頁2引《封診式訊獄》
[48] 同上註

睡虎地出土《法律答問》是市民向官吏查詢法令的記錄[49]，《答問》與法令本身均有法律效力[50]，這表現出法之公開及清晰的內涵。上至國君，下至百姓均依律法行事。國君依法作表率，所以秦的法律改動很少[51]，秦孝公時期頒布的法尚沿用至秦二世[52]。此為法的延續，也證實了「有法可依」的準則。竹簡帶出的證據，似乎顛覆了我們對秦法的認知。

法之嚴苛——輕罪重刑

本著法家性惡的精神，秦律輕罪重刑，並有許多殘酷及不平等的律例，「以刑去刑」[53]殺一儆百，增強恐嚇力，動輒處死。其嚴苛使人輕易掉進法網，產生懼怕仇恨情緒。

秦的刑法種類不下二十種[54]，有死刑、肉刑、遷刑和贖刑等[55]。《法律答問》中有關於「戮刑」與「定殺」的記載，兩者均屬於死刑，前者是戰爭罪行，後者則是歧視性質：

「戮刑」——讚美敵人而擾亂軍心者，處之戮刑。受刑者生前要先受辱，之後再斬首[56]。

「定殺」——麻風病者如果有罪，會被判「定殺」。綁上重物投入水中活活淹死，特殊情況就會把麻風病人埋入土中[57]。

「戮刑」是戰爭的罪行，故此判決最為嚴厲。受刑者生前要先受辱，生不如死時再斬首，可說是從心靈到肉體都受折磨，死亡反而是一種解脫。若說打擊軍心，影響士氣，不戰而敗，處之死刑情有可原，但是「定殺」則是有歧視成分。麻風病人犯法，直接判死刑，或投水或坑埋，以防傳染[58]。

[49] 林劍鳴：〈從雲夢秦簡看秦代的法律制度〉，頁68
[50] 同上註
[51] 林劍鳴：〈從雲夢秦簡看秦代的法律制度〉，頁67
[52] 黃展岳：〈雲夢秦律簡論〉，頁1
[53] 林劍鳴：〈從雲夢秦簡看秦代的法律制度〉，頁71
[54] 同上註
[55] 黃展岳：〈雲夢秦律簡論〉，頁9
[56] 鄧佩玲：〈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所見之死刑——有關「戮」與「定殺」的討論〉，《簡帛》，2017年02期引用《法律答問》：「譽適以恐眾心者，謬。」「謬」者可如？生謬，謬之已乃斬之之謂」，頁108
[57] 同上註，引《法律答問》：「癘者有罪，定殺。」「定殺」可如？生定殺水中之謂殹。或曰生埋，生埋之異事殹」，頁112-115
[58] 同上註，頁115

法之不公——身份特權

秦法不公，其法是有層級的法。即使犯了同一罪行，犯罪者的身份不同，待遇也不一樣。秦社會階級的最底層是刑徒、繼而是奴隸、庶民、官吏、爵、大夫，還有大夫以上的階級。一級爵位以上犯罪，罰則多為降級[59]，而平民、奴隸和刑徒層層下降，罰則就更為嚴厲，詳見下表：

身份（從上而下）	罰則	特權與限制
大夫（五級爵及以上）	降爵	不受連坐、可贖
爵（一至四級）	降爵	可贖、受連坐
官吏	賦稅、徭役、笞、發配邊疆	受連坐、可贖
庶民	各類	受連坐、可贖
奴隸	各類、甚至死刑	受連坐、官奴隸非特赦不能贖
刑徒	各類、甚至死刑	受連坐、非特赦不能贖

除了死刑之外，一切處罰均無時限，即等於無期徒刑[60]。攀爬社會梯級是艱難之舉，最直接的方法是立下戰功，但這是危險的，故階層向上流動性甚低。秦法網森嚴，一人犯事，儘管只是犯了如偷竊般的小罪，家人、同居的親戚，甚至同伍的四鄰及鄉官等均要受罰[61]，是為「什伍連坐」。連坐目的是要人民互相監察，避免儒家的「子為父隱」，包庇的情況，確保社會安全。

[59] 黃展岳：〈雲夢秦律簡論〉，頁6引《漢官舊儀》：「男子賜爵一級以上，有罪以減」

[60] 林劍鳴：〈從雲夢秦簡看秦代的法律制度〉頁73。亦見於夏利亞：〈三十六年來《睡虎地秦墓竹簡》研究綜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3年04期：「秦時的刑徒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侯，都是因犯罪而判為終身服勞役的官奴，隸，非經赦、贖不得為自由庶民」

[61] 孫英民：《從雲夢秦簡看秦律——「連坐」法》，《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引律曰：「與盜同法，有日與同罪，此二物其同居、典、伍當坐之」

《法律答問》有這樣一則：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贖」

「耐」是指男性剃去鬍子，付出金錢即可免刑。大夫至平民犯法，原則上均「可贖」，付出等價的金錢、貨品或奴役就能減刑或免刑。但我們能想像階級越是往下，人民的經濟條件越差，一般百姓難以自贖或他贖，所以庶民犯法往往淪為奴隸，嚴重的會成為刑徒。奴隸、刑徒是社會最低層，往往是派去修築長城、靈渠或戍邊，身不由己。他們的卑賤的身份將持續一生，非特赦不能贖，也不受法律保障。

總結

七石和睡虎地竹簡都反映出秦人，尤其是官方和統治者對「法」的重視。七石誠然是對秦始皇製法的誇耀，也帶出了一幅以法治國的理想藍圖。《語書》重提此事之餘，又反映了郡縣制的運行模式。《法律問答》更向我們展示了秦法嚴謹和嚴苛的一體兩面。

對秦而言，「法」的意義不只是狹義指法令規則，而是深植的一套法家思想。法家認為依法而治有助維護社會秩序，因此審判程序乃至法規的解答都必須清晰，故有《法律答問》等的輔助文件。

另一方面，制法者不得不考慮人性自私邪惡特質，法令的嚴苛是必然，輕罪重懲。推行法治的過程是殘酷的，就如秦統一建基於六國的滅亡，只有經過戰爭才有和平。法家最終的目標是建構一個官民守法，各安其分的烏托邦。無疑這個想法是美好的，但是秦法之嚴苛將社會轉化為敵托邦，貴族擁有特權，這是與法治的平等精神相悖，鼓動民憤，惹起秦末的農民起義，成為亡秦的催化劑。

4 五經與太學

太學建於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是漢武帝的文治措施之一，教學側重於德育，內容為儒家的五部經典：《詩》、《書》、《禮》、《易》和《春秋》。太學的設立創造中國教育史的兩大先河：首先，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官學；其次，太學的考核機制與仕途掛勾，只要通一經便可任官，這種模式對隋唐的科舉制度影響深遠。因此太學無論是在兩漢，還是對於後世的影響，都是非常深遠的。

我們可以從文化史角度切入認識太學，第一部分會先簡介五經內容，繼而從兩組文物：海昏侯墓竹簡以及熹平石經入手，探索「五經」在兩漢的地位。第二部分將探討太學系統的運作，帶出兩漢興衰與太學的關係。

五經

許多漢代出土的文獻材料及文物都有「五經」相關的字眼，比如海昏侯墓出土了不少「五經」的竹簡，熹平石經則列明「五經」的內容，兩組文物均體現「五經」在兩漢風行及其廣泛影響士大夫階級。在具體探索這兩組文物之前，我們更宜先了解「五經」到底是甚麼，以及兩漢的政府和士人推崇五經的原因。

甚麼是「五經」？

「經」即經典，「五經」是五本儒家的經典著作：《詩》、《書》、《禮》、《易》和《春秋》。它們是漢代官方認可的教授材料，用於太學課程。董仲舒[1]認為時下書籍「諸不在六藝[2]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因此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由於學習「五經」是開啟仕途的第一步，此舉令儒家地位提高，成為正統，更促進了社會的學習風氣，開啟中國士人的經學傳統。

[1] 董仲舒（公元前192年－公元前104年），西漢著名的經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治學以公羊學為主，於景帝年間任為博士，於武帝時受賞識任江都相等職位

[2] 禮、樂、射、御、書、數

五經的作者

《詩》、《書》、《禮》、《易》作者不明，或是「三代聖王」[3]，或是他人，孔子之世以前已有之；至於《春秋》，孟子則認為乃孔子所作[4]。這五本書是春秋時期貴族階層的教材，孔子和其弟子均有修習[5]。

五經與儒家關係密切，普遍認為這五本書均由孔子修編成書，為儒者「內聖外王」必修之術。這五本書涵蓋文學、歷史、禮儀和宇宙觀，既可薰陶情操，又能培養個人鑑古知今和是非判斷的能力。三代聖人的事蹟，為儒者提供了行為規範，尚賢思齊，潛移默化之下，自然而然地就能成就「君子」。

兩漢政府為甚麼推崇五經？

儘管孔子及後學也有提及其他典籍，但只有《詩》、《書》、《禮》、《易》和《春秋》五書被尊為「五經」，此無疑與其道德教化功能有關[6]。以下將逐一探討：

《詩》[7]

孔子認為「不學《詩》，無以言」[8]。《詩》又稱「詩三百」[9]，是中國最早的詩歌集。周有採詩制度，樂官採集民間歌曲，整理並加以配樂，讓周天子瞭解民情[10]，惟歌謠是口耳相傳性質，作者身份無從稽考。其成書時間不遲於公元前六世紀[11]。《詩》的題材涉及農耕、婚嫁等習俗[12]，又有記錄貴族飲宴的情況[13]及周王室的宗廟祭祀[14]。

[3] 三代即夏、商、周；聖王是指聖君禹、湯、周文王、周武王

[4] 《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5]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7

[6] Michale Nylan. *Introduction to the Five Class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2

[7] 對《詩》的解讀到漢代有四家，《魯詩》、《齊詩》、《韓詩》三家統稱為「三家詩」，屬於今文學派，是官學課程；而毛亨和毛萇另立《毛詩》，是為古文學派。現時僅剩下《毛詩》和《韓詩外傳》，其他版本已經散佚

[8] 《論語・季氏》

[9] 「三百」只是約數，具體數目有加減

[10] 《詩經》中的歌謠原本是能配樂歌唱的，但是樂譜已經散佚

[11] Michale Nylan. *Introduction to the Five Classics*, p.21

[12] 稱為風或國風，作者多為平民

[13] 是為小雅及大雅，作者是貴族

[14] 頌，較為莊嚴的樂曲，述祖先之德而求庇佑

孔子對《詩》曾有此評註：「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15]，《詩》不但是合教育、諷刺為一體的作品[16]，聆聽音樂有安撫心靈、陶冶情操之效，可以促進修養，所以「詩之教」備受儒家推崇。

《書》[17]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18]，孔子尚古，尤其推崇周文，欲效法周公，所以有此感慨。那麼孔子是從何得知周的事蹟？那便是從《書》中習得。

《書》又稱《書經》或《尚書》，成書時間應與《詩》相若，作者不明。《書》為記言體，篇目以時代劃分，記述時期涵蓋夏、商、周三代，上起堯、舜，下至春秋時期的秦穆公，其內容主要記錄君主事蹟、君臣之間的對話，有勸戒之辭，也有謀議、戰爭的動員和誓師。

《尚書》在漢發展成三家：「歐陽氏學」、「大夏侯氏學」和「小夏侯氏學」[19]。武帝年間，三家均為博士，授今文版《尚書》。惟三書現已失傳，只能從熹平石經推測歐陽氏本的面貌。

學習《書》有助認識上古時期的歷史和政治思想，從上古賢王的身上學習君臣相處。將之列為「五經」之一，意味昭然若揭。

《禮》

「禮」包含一切儀式，也泛指莊重的行為，所以其不但是文化的載體，也有約束的功能[20]。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21]，禮對個人修身，甚或國家統治均有巨大影響。

《禮》分為六大章節[22]，每章均對應不同官職所作，記述其職能及規範、周代的行政機構及其管理模式，折射出一種理想的政治模式。西漢時本無其書，劉德[23]得《周官》古文經後上貢朝廷，始有此書[24]，又因荀悅[25]與劉歆[26]更名才被稱為《周禮》。王莽[27]志於重建周代政府管理架構，《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28]均被納入太學課程內，教授諸生。

《禮》原本是周代的官制，但發展至漢《禮記》，官位的職能許多已被刪減，使其道德意味更為濃厚。剩下的諸如〈大學〉、〈中庸〉等章目更是直指進學成德、為人處世的辦法。

《易》

「易」即變化。孔子曾感嘆若生命再多數年，在五十歲讀《易》，此生就可以不犯大錯了[29]，這足見孔子對《易》的推崇。古有「三易」的說法[30]，但《易》的成書時間不明，作者也無法查考。前兩本已失傳，只剩下《周易》[31]。因為《易》是一本占卜書，所以免於秦火，是「五經」中保存得最良好的作品。

《周易》內容玄妙無窮，涉及天文曆法，接通於「道」[32]，有趨吉避凶之效。當中有六十四卦，每卦的經文分為符號和文字兩部分[33]。因為《易經》晦澀難懂，所以後人作傳解釋。《易傳》的內容分七個部分，共十篇，故稱「十翼」[34]。

《周易》是卜辭[35]，體現占卜的平民化[36]，透過隨意投砸就能得到一個隨機爻（音：淆）象，翻查《易》便得出答案。先秦諸子都認為自己的學派最合於「道」，這個道不但是人世的「道」，比如為政道、人道，更是接通一種冥冥中的神奇力量——世界的規律。未必所有事情都有答案，想不通時，知識份子就會訴諸形上答案。

雖然漢初的思想形態在黃老道家與儒家間拉鋸，但《易》是兩家都會修習的學問。將之列為「五經」，是因為其具神奇的指引性，對知識份子有巨大的吸引力。

---

[15] 《論語・為政》
[16] 《毛詩・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17] 《書》和《詩》、《禮》和《春秋》均不能倖免於秦火，不過當時有一知識分子——伏生將《尚書》藏於壁中，保留了下來，是為今文經。不幸的是遭受戰亂和社會動盪，《書》在漢初僅剩下二十餘篇，伏生在齊、魯之間教學，而後來成為尚書博士的歐陽生和張生都是師承伏生。見班固《漢書・藝文志》：「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
[18] 《論語・述而》
[19] 班固《漢書・藝文志》：「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歐陽氏學」、「大夏侯氏學」和「小夏侯氏學」的作者分別是歐陽高、張生弟子夏侯勝和夏侯建
[20] 《論語・雍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21] 《論語・憲問》
[22] 《禮》又稱《周官》、《周官禮》和《周官經》，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記》六章
[23] 劉德（公元前160年代－公元前129年），西漢宗室，封河間王，諡獻，是為河間獻王
[24] 班固《漢書・景十三王傳》：「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25] 荀悅（148年－209年），字仲豫，東漢末史學、儒學思想家、政治家
[26] 劉歆（?－23年），字子駿，改名劉秀，漢朝宗室，西漢末年及新朝官員及重要學者，協助王莽篡位，出任新朝高職「羲和官」，號稱國師，晚年卻因兒子被殺與誤信預言，謀叛事敗自殺。劉歆博覽圖書，精通經學，提倡古文經學，推動把《左傳》及《古文尚書》等古文經列於學官，引發漢代今古文經學之爭；他曾與父親劉向一同校閱宮庭藏書，編成目錄學的重要著作《七略》及《別錄》
[27]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西漢末年政治人物及權臣，之後篡奪皇位並自立新朝
[28] 另加〈月令〉、〈明堂位〉和〈樂記〉三篇
[29] 〈論語・述而〉：「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30] 《周禮・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三易即《連山》、《歸藏》和《周易》
[31] 有說《易》乃周文王所作
[32] 世界的規律
[33] 黎子耀：《周易導讀》（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8），頁9指出周人以天文曆法中的象數組織卦爻，有陽爻（—）和陰爻（--）兩種。三爻構成一卦，有八種形式，是為八卦（乾、坤、坎、離、震、巽、艮、兌）；八經卦與八緯卦相重，則得六十四卦
[34] 《彖傳》上、下，《像傳》上、下，《文言》，《繫辭》上、下，《說卦》，《序卦》和《雜卦》
[35] 占卜的記錄
[36] 材料能在生活中找到，諸如蓍草、龜甲和銅錢

《春秋》[37]

《春秋》是中國首部編年體史書，記錄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間魯國十二位君主的歷史，反映魯國的內政、外交、戰爭等大事。《春秋》所錄時期是東周前半部分，後來也因而命名為「春秋」。該書或由魯國史官集體編寫，或為孔子作品[38]。

《春秋》所記時間清晰，每篇都是按照年份、季節、月、日排序，先記時間再以短句敘事。這種書寫模式被稱為「春秋筆法」，其不直接表達態度，反而在選材、用字等方面委婉表示。漢武帝在「五經」中尤其偏愛《春秋》[39]，令《公羊》成為西漢的官學；宣帝則偏愛《穀梁》，其與《公羊傳》出現分庭抗禮之勢。

《春秋》是歷史書，也蘊藏作者的價值判斷，所以具道德意味，儒者閱此可以明是非，知善惡，故不作與身份衝突之事。

小結

「五經」是把五本儒家典籍列為經典，在太學教授經書的目的是培養生員的全人發展：《詩》溫柔敦厚，有薰陶情操之效；《書》尚友古人學習為政之道；《禮》釐明職責，培養德位相稱的人才；《易》內容奧妙，通於「道」；《春秋》明是非，重思考。「五經」系統發展至後代已經不限於五本，到了明代甚至有《十三經》[40]。「五經」的設立無疑提高儒家的地位，令其在諸多學派中脫穎而出，「經學」在漢以後更成為中國學術的正統。

[37] 《春秋》所記之事言簡意賅，所以後有五家作傳解，分別為《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和《夾氏傳》。《鄒氏傳》和《夾氏傳》現已缺佚，而《左氏傳》、《公羊傳》和《穀梁傳》被合稱為「春秋三傳」。有說《左氏傳》是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所以又稱為《左傳》，是古文經，以敘事為主；《公羊傳》和《穀梁傳》是今文經，以解經為主。有說《公羊傳》作者為戰國時期的公羊高，而《穀梁傳》作者傳說為春秋時的穀梁赤。兩傳共同點在於以問答形式解讀《春秋》，然後判斷當中的微言大義。

[38]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頁7

[39] 班固《漢書・儒林傳》：「漢武帝時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40] 《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和《孟子》

文物與五經

(一)海昏侯墓

海昏侯墓位於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區大塘坪鄉觀西村墎墩山，是漢廢帝劉賀的陵墓。劉賀是漢武帝的孫子[41]，由於宣帝無後，所以霍光改立昌邑王劉賀為漢帝，但其在位僅僅27日被廢[42]，後被改封為海昏侯[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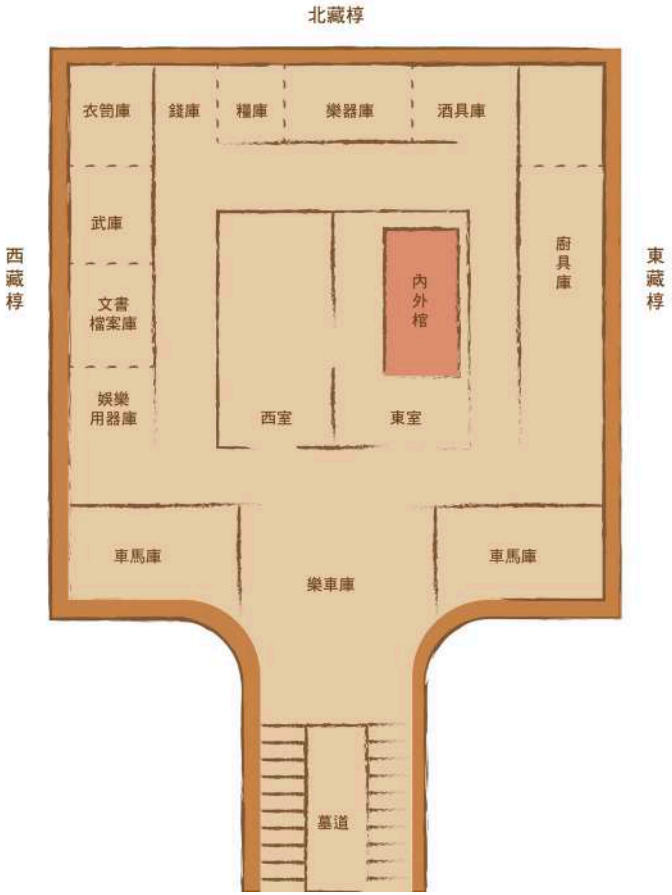


海昏侯劉賀印外觀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41] 《漢書・諸侯王表》：「昌邑哀王髆武帝子。天漢四年六月乙丑立，十一年薨。始元元年，王賀嗣，十二年，徵為昭帝後，立二十七日，以行淫亂，廢歸故國，予邑三千戶」

[42] 《漢書・宣帝紀》：「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奏王賀淫亂，請廢。語在賀及光傳」

[43] 《漢書・宣帝紀》：「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海昏侯墓墓室平面圖
（重繪圖，圖片來源：中國文化研究院：〈千古大墓——解構海昏侯墓〉，網址：https://chiculture.org.hk/tc/china-five-thousand-years/4386）

該墓自2011年開始發掘，為近年中國考古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墓中出土一萬件文物，當中有五千多個簡牘，許多是西漢時期的文獻，內含五經之三：《詩》、《禮》及《春秋》，且有不同版本及其註釋[44]，又有一面鏡屏。該屏特別之處在於背後有儒家師徒的圖畫，這是現有最早的孔子畫像，故學者暫稱為「孔子衣鏡」[45]。

[44] 楊軍、徐長青：〈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07期，頁61
[45] 同上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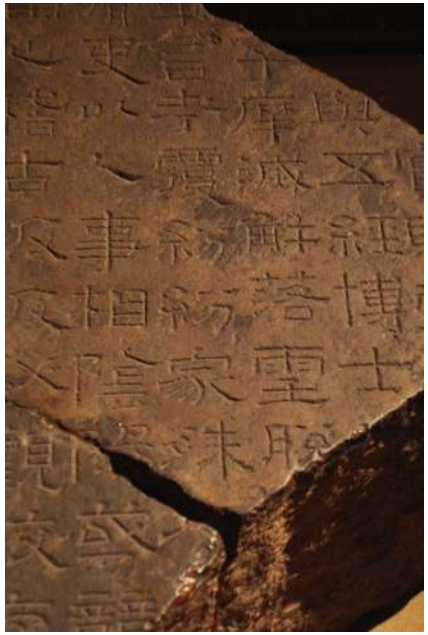
我們從海昏侯墓發現甚麼？

直到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技術，紙才開始廣泛成為文字的載體。由於海昏侯劉賀是西漢人，在蔡倫之前，其墓穴發現的簡牘便是當時主要的書寫面。

竹簡厚重，不便攜帶，抄錄麻煩需時，平民不可能擁有五千多卷。劉賀墓出土的竹簡數量龐大，一方面證明墓主人身份高貴、富裕且喜愛閱讀；另一方面，「五經」有三本被書於竹簡，反映「五經」的風行程度，即使是曾為漢帝的劉賀也將此收於墓中，足見「五經」的重要性。

墓中發現的「孔子衣鏡」呼應上文的說法。孔子是儒家的開創者，生前因為政治失意所以辦學廣收門徒。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諸侯均行霸道，主張王道的儒家學說並沒有凌駕的地位。然而，在漢廷實行獨尊儒術的政策，大力提倡以五經授課，孔子乃至儒家的地位大為躍升，海昏侯墓中「孔子衣鏡」的存在就是有力的證據。

（二）熹平石刻



熹平石經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熹平石經拓片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甚麼是熹平石經？

熹平石經是作於東漢熹平四年（175年）的刻石，共四十六碑，高十尺，寬四尺、共二十餘萬字，立於東漢首都洛陽太學門外[46]。遺憾的是，刻石多受損壞，現存百餘塊殘石存於中國各大博物館。

自武帝始「五經」成為官學，然而秦火與戰爭令五部經典散佚，時人依靠記憶背誦出來，是為今文經。後經書的原版（古文經）相繼出現，且在社會流傳。學者爭辯何者為正確，所以有古文經和今文經之爭。漢廷擁立今文經，以此為太學的教材，設五經博士教授。

至東漢時，「五經」已廣泛流傳，但是經書反複抄寫，文字多有錯漏。所以在靈帝時期，朝廷便校訂經文，將之刻於石碑，因此產生了熹平石經。是故石經記載了「五經」名稱及東漢時期官方認可的版本。除了「五經」，石經亦包括《公羊》、《儀禮》等與五經相關的典籍。

小結

無論是西漢海昏侯墓還是東漢熹平石經都有「五經」的記載，可見「五經」具官方認可，是極為重要的官學典籍，在兩漢有超然的地位。

[46] 范曄《後漢書・儒林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太學

(一)太學成立背景

武帝建太學絕非一時興起，當中有許多社會政治考慮。為了能長治久安，漢初文人積極反思秦速亡之由，得出結論：秦焚書坑儒、不重學風、暴力統治，導致社會缺少道德教育，難以穩定人心[47]。從漢開國至景帝年間，君主貫徹輕賦稅、重農業，與民休息的政策，國家累積財富[48]。漢景帝肅清七王之亂[49]，武帝更憑藉中央集權完成國家的大一統。興辦學校需要眾多資源，父輩的努力耕耘，無不為武帝的「文治」奠下基礎。

武帝即位之初就有許多大臣上疏復興儒學[50]，不過竇太后[51]阻撓，未能成事。直到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思想及文化與道德教育的貧乏，不利統治與國家發展，亦為了避免重蹈秦窮兵黷武的覆轍，武帝便採納董仲舒與公孫弘[52]等人的提議，於長安建設中國史上首個官辦教育機構——太學。除了《詩》和《春秋》被選為課程，更另設《書》、《禮》、《易》，由「五經博士」教授儒家經學，為政府培養人才[53]。

(二)太學的發展怎樣反映兩漢歷史？

太學建於元朔五年，漢武帝在長安設立校舍，收生員五十人。西漢後期至東漢前期太學發展迅速，由於漢廷重視辦學，因此太學收生規模不斷擴張。從武帝時期的五十人，發展至昭帝時期的百人，元帝時期的千人；到成帝末年，太學收生已擴展至三千人[54]。由於生員數目龐大，王莽在平帝時期開始擴建校舍，令太學規模足以容納萬人，史稱「築舍萬區」[55]。

[47] 賈誼《過秦論》：「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

[48] 司馬遷《史記・平準書》：「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49] 七王之亂（七國之亂），發生於公元前154年。當時以吳王劉濞為中心的七個劉姓宗室諸侯：楚王劉戊、膠西王劉卬、膠東王劉雄渠、淄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趙王劉遂，由於不滿朝廷實行削藩政策，剝奪地方諸侯權力，所以興兵反抗，最終爲竇嬰、周亞夫所鎮壓

[50] 班固《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51] 竇太后（公元前200年代－公元前135年）為漢文帝皇后、漢景帝生母、漢武帝祖母。竇氏掌握政權橫跨景帝、武帝兩代，主張「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

[52] 公孫弘（公元前199年－公元前121年），字季，武帝時曾擔任御史大夫、官至丞相，封平津侯

[53] 《詩》和《春秋》在景帝時已置博士。章權才：《兩漢經學史》（臺北：萬卷樓，1995），頁86

[54] 班固《漢書・儒林傳》：「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

[55] 班固《漢書・王莽傳》：「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

時至東漢，漢室遷都洛陽，建武五年，光武帝劉秀在洛陽新立太學。明帝時期，皇室、諸侯及大臣之後代均修經學[56]，且另立「四姓小侯學」[57]，吸引不少民族慕名而來[58]。

東漢和帝以後，外戚、宦官擅權，政治不利因素導致太學衰敗。安帝時期學風敗壞[59]，順帝中興，力挽狂瀾擴大校舍[60]，廣招生員，令學生數目激增至三萬餘人[61]，但是時太學已無儒者之風[62]。桓靈時期，敢言的太學生因「清議」公開抨擊宦官專政，而得罪宦官集團，引致兩次黨錮之禍，大批學生被終身囚禁或誅殺[63]。靈帝受唆擺設立「鴻門學都」制衡太學，令太學地位下降。漢末的黃巾之亂和州牧割據，使社會不穩、政治黑暗，嚴重影響太學運作，最終更令教學終止。

(三)太學的教學模式與授課內容

「博士」是教導「五經」的專職學官，所以又名「五經博士」，他們是經學的專家，在太學擔任老師的職責。太學學生，在西漢稱為「弟子」，而東漢則稱為「諸生」。武帝時太學只有五十個學額，篩選條件是「年十八以上，儀狀端莊」的官宦子弟[64]，而地方地主子弟也可作為旁聽生，是為「受業子弟」。前者有官祿、免役，而後者則要費用自理[65]。

太學的授課形式和現代大學相似，學生以自修為主，大班教導「五經」的正課。光武帝設十四名博士分別教授今文經[66]《施氏易》、《孟氏易》、《京氏易》、《梁丘易》、《歐陽書》、《大夏侯書》、《小夏侯書》、《魯詩》、《齊詩》、《韓詩》、《大戴禮》、《小戴禮》、《嚴氏春秋》和《顏氏春秋》[67]。正課以外時間，學生可以按個人興趣學習，他們既可以請教校外名師、高足弟子[68]，也可以和同儕互相交流[69]。太學不設畢業年限，但學生必須通過考試才可以授予官職，所得的成績和所分派官位相等[70]。

[56] 袁弘《後漢紀・孝和皇帝紀下卷第十四》：「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
[57] 袁弘《後漢紀・孝和皇帝紀下卷第十四》：「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
[58] 范曄《後漢書・儒林列傳上》：「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59] 范曄《後漢書・儒林列傳上》：「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薪蘇，至於薪刈其下」
[60] 范曄《後漢書・儒林列傳上》：「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61] 范曄《後漢書・儒林列傳上》：「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62] 范曄《後漢書・儒林列傳上》：「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63] 范曄《後漢書・儒林列傳上》：「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
[64] 晉文：〈漢代太學淺說〉，《山東師大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頁75
[65] 同上註
[66] 與古文經相對。古文經在秦始皇「焚書坑儒」及咸陽被攻陷之後所起的「秦火」大量缺佚。因此依賴時人口耳相傳，重新默寫出來，這個版本就是今文經
[67] 范曄：《後漢書・儒林列傳上》
[68] 高年級學生
[69] 晉文：〈漢代太學淺說〉，頁76
[70] 同上註

總結

太學既是學府，也是一種仕途機制，學子進入太學的目的是謀求官職，以「五經」為課程，旨在培養德位相稱的預備官員。

太學的發展與漢的盛衰互為因果。一方面，漢廷重視教育令太學發展蓬勃，但社會因素也會影響太學運作。另一方面，太學的設立推動了社會學習風氣，學子修讀經典可陶冶性情，因此這個與仕途緊扣的制度也培養不少政治人才。學生居住在校舍與同儕協作，促進彼此交流，一同進學修德，無疑是兼具個人與群性發展。然而，這個制度並未完善，只教授儒家學說難免予人「統治者將個人思想移植於儒家經典，並將統治措施合理化於聖人之言」的猜想[71]。不僅如此，博士數目遠遠追不上學生人數，只能由弟子高足助教，難免影響教學質量。

[71] 林曉希：〈近三十年來漢代經學研究述評〉，《雲南社會科學》，2014年05期，頁27-31引朱日耀：〈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結構及其特點〉，《政治學研究》，1987年06期

5 匈奴與漢的和親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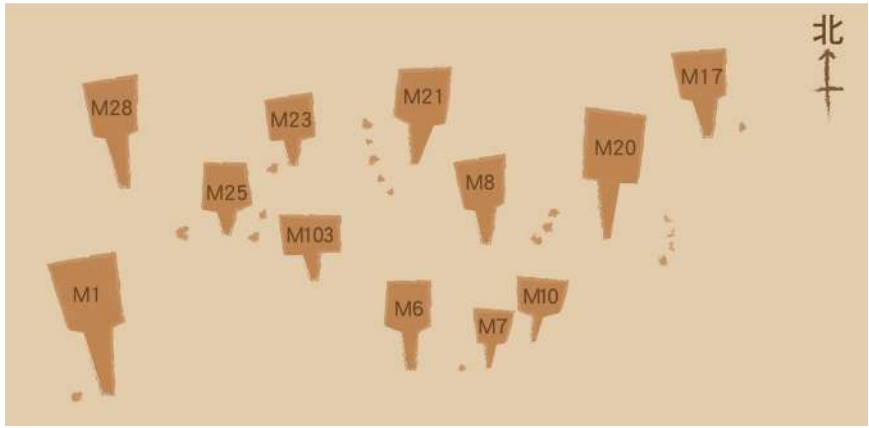
匈奴是中國北邊的遊牧民族，在秦漢時期對中原有很大威脅。為解除威脅，漢高祖開啟了漢匈和親之路，希望能不戰而臣之。本文將以高勒毛都2號墓地論述匈奴的民族特性及墓葬文化，繼而抽取M1墓的三組文物：銅鏡殘片、玉璧及漢式馬飾展現漢匈交流的痕跡，最後附上史書論證漢匈的和親關係。

高勒毛都2號墓地

甚麼是高勒毛都2號墓地？

匈奴墓散佈在今蒙古、山西、陝西、青海等地[1]，而本文抽取的高勒毛都2號墓地，是位於蒙古國後杭愛省高勒毛都[2]的一處大型的匈奴墓葬群。其為「地表有長方形或梯形土台，帶墓道的墓地稱甲字形積石墓」[3]，墓主應該是匈奴政權的上層或核心人物。一般的貴族墓葬地表只有近圓形石頭堆，無墓道，且規模較小，被稱為「圓形積石陪葬墓」與「獨立圓形積石墓」[4]。這三種墓型均見於高勒毛都2號墓地[5]。

[1] 馬利清：〈包頭張龍圪旦一號墓的族屬及部分南匈奴墓葬辨析〉，《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06期，頁137
[2] 周立剛：〈高勒毛都2號墓地調查記〉（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勒毛都2號墓地調查記（一）〉，網址：https://www.hnswwkgyjy.cn/NewsView.php?News_ID=964，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3日
[3] 潘玲、薩仁畢力格：〈匈奴大型墓葬概述〉，《草原文物》，2015年02期，頁100-109
[4] 同上註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勒毛都2號墓地調查記（一）〉，網址：https://www.hnswwkgyjy.cn/NewsView.php?News_ID=964



高勒毛都墓地分佈
（重繪圖，圖片來源：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考古學報》，2009年第1期，頁74）

高勒毛都2號墓地有何特別之處？

高勒毛都2號墓地中葬墓大小差異非常明顯。目前發掘出面積最小陪葬墓的直徑為2米，而最大者為M1墓直徑達19.5米[6]。較小的陪葬墓，多位於「弧形鏈南端」，較大的則是位於北部[7]。隨葬品的豐富程度與陪葬墓的面積成正比，或折射墓主的地位[8]。

高勒毛都2號墓地有何重要性？

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調查，目前在蒙古國境內發現了八座包含了甲字形積石墓的墓地，高勒毛都2號墓與諾音烏拉墓[9]及高勒毛都1號墓為最大的三處[10]。在三者中，高勒毛都2號墓地的墓葬總數為最多，最新調查統計有571座，甲字形墓佔了104座，其分佈密度乃三者中最高[11]。

綜上所述，高勒毛都2號墓地應為貴族墓，我們可以將此視為認識匈奴的民族特性、貴族生活的一手材料。由於高勒毛都2號墓的墓葬總數非常龐大，本文將抽取M1墓作簡介。

[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勒毛都2號墓地調查記（一）〉，網址：https://www.hnswwkgyjy.cn/NewsView.php?News_ID=964
[7] 同上註
[8] 同上註
[9] 位於蒙古國中央省色楞格河畔的諾彥烏拉山的一處匈奴墓地
[1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勒毛都2號墓地調查記（一）〉，網址：https://www.hnswwkgyjy.cn/NewsView.php?News_ID=964
[11] 同上註，周指出諾音烏拉墓地面積最大，各類墓葬總數約212座，其中確認的甲字形墓29座；高勒毛都1號墓地2014年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墓葬總數483座，214座為甲字形墓；2號墓地最新調查結果墓葬總數為571座，其中甲字形墓104座。雖然2號墓地的面積在三者中最小，但是墓葬總數最多，分佈密度最高

高 勒毛都2號墓地M1墓與文物

從何得知M1墓是匈奴墓？

匈奴墓與漢墓在形制上有很大的差別。匈奴墓葬的表層沒有密封土，墓道是純粹以石塊堆積而成，M1墓由石塊向上堆疊12層，在地面用石塊砌出明顯的甲字形，部分石垣至今可見，最大殘堆高達1.6米[12]。「M1墓有28座圓形積石陪葬墓，東側有27座圓形積石墓組成北向的弧形列隊，列隊與主墓之間有一個規模最大的圓形積石墓」[13]。

M1墓的具體情況

年代：西漢晚期到東漢早期[14]

墓主：有學者認為M1墓主為13至16歲的男子[15]，另有蒙古學者推斷此乃匈奴王，即單于（音：善於）[16]，惟至今為止沒有定論是哪位單于。

大小：墓室邊長46米，墓道長37米，總長83米，是所發現同類墓葬中最大[17]。28個呈弧形的陪葬墓分佈在主墓側面，「佈局經仔細規劃，應與主墓同時形成，即墓主與陪葬者是同時下葬」，有可能是一種殉葬儀式[18]。墓主與殉葬個體的關係暫時不明[19]，不排除是墓主生前的近臣或親屬[20]。

狀態：放置人骨的棺室被盜擾，但相鄰兩個放置財寶珍貴器物的棺室，反而保存完好，似是要報復墓主而非偷竊行為[21]。

[12] 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考古學報》，2009年第1期，頁70
[13] 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大眾考古》，2019年09期，頁52-56
[14] 周立剛：〈高勒毛都2號墓地印象（二）〉載於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網址：http://www.hnswwkgyjy.cn/NewsView.php?News_ID=557，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3日
[1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勒毛都2號墓地調查記（一）〉，網址：https://www.hnswwkgyjy.cn/NewsView.php?News_ID=964
[16] 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頁52-56
[1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勒毛都2號墓地調查記（一）〉指出墓最小者總長度爲8米，墓室邊長5米，墓道長3米，網址：https://www.hnswwkgyjy.cn/NewsView.php?News_ID=964
[18] 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頁78
[19] 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頁52-56
[20] 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頁78
[21] 周立剛：〈高勒毛都2號墓地印象（二）〉載於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網址：http://www.hnswwkgyjy.cn/NewsView.php?News_ID=557，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3日

M1墓的墓葬形式反映了甚麼？

M1墓位於北是甲字形大墓，當中有二十八個圓形墓並伴有豐富的陪葬品，規模上是同類墓中最大。儘管該墓的墓主尚未成年且身份不明，但上文曾提到甲字形墓的墓主身分較圓形墓的擁有者更高，有學者推論這些圓形墓乃陪葬墓，種種證據都彰顯墓主身份不凡。即使他並非匈奴單于，也應為上層人物，與單于關係非凡。

M1墓的文物與歷史意義

M1墓出土文物豐富，有漢式馬車一輛、馬具、銅鏡殘片、若干漢式漆器、金屬容器、一塊玉璧[22]。下文將以重點介紹銅鏡殘片、玉璧及漢式馬飾三組文物，印證墓主身份之高。

1.銅鏡殘片



銅鏡殘片
（重繪圖，圖片來源：潘玲、薩仁畢力格：〈匈奴大型墓葬概述〉，《草原文物》，2015年02期，頁100-109）

大小：復原直徑27.4厘米[23]

款式：雲雷連弧紋鏡[24]

造型：圓形，內區有連弧紋裝飾[25]。一般雲雷連弧紋鏡的外區有銘文[26]，M1墓的銅鏡的復原圖並未見銘文。

時間：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之間[27]

[22] 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頁52-56
[23] 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頁79
[24] 同上註
[25] 于燕：〈漢代連弧紋銘文鏡〉，《尋根》，2017年06期，頁90-98
[26] 同上註
[27] 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頁79

銅鏡殘片如何反映歷史？

銅鏡的精粗、尺寸之別，「能體現所有者的社會地位，其所有者應是身份顯要之人，很可能即單于本人」[28]。M1墓發現的銅鏡為殘破狀態，但這有可能並非意外或盜擾所致，反而是匈奴人故意為之。除了M1墓，其他蒙古匈奴墓也出土不少破碎的漢式銅鏡，學者由此推論匈奴流行在墓葬儀式之後將銅鏡打碎，並把碎片納入墓葬之中[29]，此舉動意義未明，「有可能蘊含著某種特殊的宗教意義，是在宗教儀式上使用的法器」[30]，銅鏡殘片能助我們了解匈奴葬禮習俗。

漢墓一般注重陪葬品的完整性，而銅鏡作為照容的器物更應該完整保藏，才能發揮作用。然而匈奴卻將銅鏡打碎，此點與漢文化明顯不同，且不論銅鏡是否M1墓主生前所用的器物，或只是作為墓儀用具，均與器物原本的功用存在差異。

另一方面，M1墓的銅鏡殘片乃漢式設計。從此可以推測當時漢匈之間已有交流，該銅鏡極可能是漢廷所贈之物[31]。

2.玉璧



玉璧
（重繪圖，圖片來源：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大眾考古》，2019年09期，頁52）

[28] 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頁79
[29] 同上註
[30] 馬利清：〈匈奴墓葬出土銅鏡及毀鏡習俗源流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09期，頁77引〔俄〕I.V.菲利波娃（著），鄭文（譯）：〈銅鏡在匈奴宗教儀式中的作用〉，《文博》，2007年02期，頁87、93
[31] 同上註

發現位置：棺壁[32]

玉質、顏色：青玉出廓璧[33]，有土黃、深褐兩種沁色[34]。

大小：玉璧外徑18.5厘米，內徑3.4厘米，通高22.8厘米[35]。

造型：主紋分兩部分，外區為龍紋，大致呈M字形，龍頭到尾部紋理如波浪狀起伏[36]。

玉璧如何幫助我們了解歷史？

學者認為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墓的玉璧是「典型的漢文化器物」[37]，其造型與山東青州馬家塚子墓出土的玉璧十分相似[38]，兩者均為龍形出廓璧，但後者透雕「宜子孫」[39]三字，而M1墓的玉璧則無任何文字。這表示M1墓的玉璧應是來自中原[40]。

3.馬車配件



馬器裝飾示意圖
（重繪圖，圖片來源：周立剛：〈探索匈奴文化：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紀行〉，《大眾考古》，2017年10月，頁70）

[32] 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頁52-56
[33] 圓型璧的基礎上，於其外緣鏤雕出輔助的裝飾
[34] 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頁52-56
[35] 同上註
[36] 同上註
[37] 同上註
[38] 同上註，指出山東青州馬家塚子墓出土的玉璧為「白玉質，兩面內外緣及中部各處圈突棱，將璧面紋飾分內外兩區，內區飾谷紋，外區減地浮雕盤繞過的龍紋，璧上端出輪廓局部透雕兩個相對的螭龍形飾」，與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墓玉璧非常相似
[39] 「宜子孫」為吉祥用語，意為「子子孫孫宜室宜家」
[40] 鄧新波：〈漢朝與匈奴交流的見證：蒙古國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出土的玉璧〉，頁52-56，指出山東青州馬家塚子墓出土的玉璧為「白玉質，兩面內外緣及中部各處圈突棱，將璧面紋飾分內外兩區，內區飾谷紋，外區減地浮雕盤繞過的龍紋，璧上端出輪廓局部透雕兩個相對的螭龍形飾」

存放位置：中層深9.5-10米的墓道中[41]

狀態：零件由車體的木質結構上被特意拆卸[42]

材質：金屬[43]

造型：有學者認為馬車配件上的圖案是以雪豹、羚羊等動物為原型的「獨角獸」[44]，但亦有學者認為是麒麟，或為匈奴人的圖騰[45]。

大小：最大的圓形金器直徑13厘米，長條形金器長度約近30厘米[46]。



雄麒麟　　雌麒麟

A型麒麟（當盧）（重繪圖，圖片來源：額爾敦：〈蒙古國高樂茂杜二號遺址M1出土的匈奴麒麟紋飾研究〉，《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03期，頁25-29）

[41] 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頁81
[42] 武高明、包蘇那嘎：〈從出土文物探索漢匈和親與草原絲綢之路關係〉，《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02期，頁37-43
[43] 同上註
[44] 周立剛：〈高勒毛都2號墓地印象（一）〉指出角獸裝飾是匈奴的神獸，匈奴遇見有角的動物會放生，網址：http://m.hnswwkgyjy.cn/NewsView.php?News_ID=555，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6日
[45] 額爾敦：〈蒙古國高樂茂杜二號遺址M1出土的匈奴麒麟紋飾研究〉，《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03期，頁25-29
[46] 周立剛：〈高勒毛都2號墓地印象（一）〉，網址：http://m.hnswwkgyjy.cn/NewsView.php?News_ID=555

馬飾反映了甚麼？

匈奴是中國北邊的遊牧民族，因水源、風沙等自然因素致使該民族不得不時常更換居住地[47]，所以對牛馬等動物極度依賴。在生活需求的習慣驅使下，匈奴無論老少均擅騎射[48]，所以在匈奴墓中發現馬具、馬車和馬飾是理所當然的事。儘管圖案是何種動物尚未有定論，但此神獸應為引導亡靈至冥界的媒介[49]。不尋常之處在於M1墓中的馬車車體的裝飾及零件為漢式設計[50]，該馬車應為漢人製造，並非匈奴的產物。那麼匈奴是如何得到這輛馬車呢？

史書記載了多次漢廷贈送車輛於匈奴的記錄[51]，故該馬車可能為「禮儀性的饋贈物」[52]。除了饋贈之外，漢匈因和親而互通關市[53]，匈奴也時常侵犯漢村落。但以馬具的精美程度，不太可能是交易或掠奪得來。

小結

M1出土的三件文物：銅鏡殘片、玉璧及馬飾均為漢式，揭示了漢與匈奴兩民族之間存在交流。而根據學者的判斷，該墓建設時間應為西漢末年至東漢之間，由此推論，上文提及的文物可能是和親的禮物，下文將引史書解釋和親的具體內容，並對此加以輔證。

[47] 《史記・匈奴列傳》指出匈奴有「逐水草遷徙」的生活模式
[48] 《史記・匈奴列傳》：「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毋弓，盡為甲騎」
[49] 安緯、奚芷芳：〈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頁86
[50] 武高明、包蘇那嘎：〈從出土文物探索漢匈和親與草原絲綢之路關係〉，頁37-43
[51] 同上註，可參考下文有關「西漢的和親歷史」列表（頁62-63）
[52] 同上註
[53] 同上註

漢 匈和親

史書顯示漢匈主要存在戰爭及和親這兩種關係[54]。戰爭顧名思義是武力衝突，秦漢之際，匈奴屢次干擾邊境。西漢初期，漢廷屢次驅逐，後來便有了和親政策[55]。

甚麼是和親？

和親是政治通婚，泛指民族之間因經濟、軍事等目的，以聯姻輔以其他條件維護雙方關係的行為[56]。雖然先秦已有類似的措施[57]，但正式確立該制度是西漢時期。高祖劉邦派漢公主與匈奴聯姻[58]，並贈送絲綢、錢幣等禮物。作為交換條件，匈奴不得干擾邊疆，掠奪漢村落的村民及財物。

和親制度不但在西漢實施，其後的東漢、唐等朝代也延續下來[59]，以政治聯姻的手法與邊疆民族結好，盡量減少戰爭的爆發。

漢匈為甚麼會推行和親政策？

為甚麼漢廷要與匈奴和親，而匈奴又接受這個約定呢？無論中西，古代的婚姻是合二姓之好，而並非浪漫關係。和親雖說是「避戰言和，保持長久的和好」[60]，但無論是漢還是匈奴，和親都離不開實效主義，旨於保持雙方關係的平衡。

1.政治考慮

漢室基於政治考量，採用和親的方式，將敵人變為親家，令敵對關係消弭：公主是單于妻子，變相漢王與單于是翁婿關係，婿不會攻打翁，而翁的地位凌駕於婿；公主日後生子，其子因為有匈奴血統，順理成章成為匈奴的繼承人。另一方面，繼承人也有漢人血統，是漢皇的外孫，不會對外公兵刃相見。如此代代繁衍下去，人種逐漸同化，匈奴的上層人員便會有漢人血統。在理想的圖則下，漢與匈奴成為一家人，最終「不戰而臣之」[61]。

[54] 《史記・匈奴列傳》及《漢書・匈奴傳》
[55] 《史記・匈奴列傳》：「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
[56] 宋超：《制度、名物與史事沿革系列——和親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1
[57] 同上註，頁2指出早在先秦時期，典籍中有「和戎」字眼，反映諸侯國之間已有聯姻
[58] 《史記・匈奴列傳》
[59] 有學者認為宋並無和親，見於劉興成、薛平拴：〈東漢、宋、明三代無「和親」說質疑〉，《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04期，頁162-167
[60] 蔣萍：〈西漢細君公主和親事蹟考〉，《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13年第17期引崔明德：〈中國古代民族關係研究二題〉，《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02期
[61] 紀庸：《漢代對匈奴的防禦戰爭》（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5），頁11

無疑，漢室對和親的想法是出於漢人至上的原則，從根本上認定中原文化程度凌駕匈奴。然而，匈奴沒有儒家的家庭倫理概念，並無父慈子孝，權力是以暴力獲取[62]，所以出現「和而不親」[63]的反差，是漢室始料不及的。

對匈奴而言，和親有助單于鞏固地位。匈奴崇尚武力，內部鬥爭以武力解決，被漢承認，等於無外患。即使不謹守協議，漢廷也無可奈何。就算是戰鬥稍有頹勢，匈奴料定漢軍不會深入巢穴，便會北退。可見，和親的約定使匈奴處於進可攻，退可守的不敗之境。

2.經濟考慮

學者認為和親對漢室來說是最優考慮，把公主外嫁並輔以禮物其實是以金錢購買和平，其花費遠少於軍事投入[64]。和親雖難以達到絕對和平，但可以改善雙方關係，在短時間內匈奴安順，漢朝便可藉此休養國力[65]。

匈奴不事農業，依賴畜牧為生，所以糧食等資源長期短缺。侵犯邊境村莊掠奪是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徑，但同時有巨大風險——與漢軍交戰，勢必會造成傷亡。與漢和親可避免戰爭，同時能向漢廷提出條件，得到賞賜、嫁妝等補償[66]。

西漢的和親歷史

《史記》和《漢書》均有對西漢和親政策的記載，該政策始於高祖九年，下至於元帝時期[67]，但凡新政權交替、漢皇即位、新單于立，或是爆發大規模的亂邊行為，就會以和親政策平息矛盾[68]，可見和親是西漢初期對邊族的主要策略。

西漢時期，漢匈共有八次和親記錄[69]，可見匈奴對漢室威脅之大，誠需安撫。武帝時期是個轉折點，他深信匈奴是個潛在禍端，無論給予多少禮物，也不會達到最終和平。一直與其和親只是「和而不親」[70]，致使匈奴坐大，越來越貪心，與父輩目的背道而馳。所以其即位之初便開始以攻伐[71]和其他方式[72]打擊匈奴，自元封六年，接連兩次和親對象都是烏孫。

[62] 《史記・匈奴列傳》司馬遷對匈奴有此評價：「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
[63] 宋超：《制度、名物與史事沿革系列——和親史話》，頁2
[64] 張燕：〈漢、唐和親政策再思考〉，《教育教學論壇》，2013年04期，頁175-177
[65] 同上註
[66] 同上註引林恩顯：《中國古代和親研究》（黑龍江：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頁97-98
[67] 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頁52-53
[68] 閻明恕：《中國古代和親史》（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頁133
[69] 文帝後元四年，軍臣單于新立，文帝提出和親一事，不過後因軍臣單于侵略邊境，並無和親。見《漢書・匈奴傳上》：「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史記・孝景本紀》：「景帝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
[70] 宋超：《制度、名物與史事沿革系列——和親史話》，頁2
[71] 衛青在龍城之戰（公元前129年），打開漢匈戰爭的勝利首戰、霍去病在漢北之戰（公元前119年），封狼居胥，自此匈奴退回漢北
[72] 漢武帝在公元前138年令使者張騫出使西域，目的是探索塞外合適夥伴對抗匈奴，但張被匈奴扣押，遲遲未歸。張騫在公元前115年自烏孫還，十年後，經其搭橋，開展了漢烏和親，細君公主遠嫁烏孫王

匈奴受衛青、霍去病兩名大將追擊，只得退回漠北，之後一連串內鬥導致勢力大減，只好對漢俯首稱臣。直到宣、元時期，漢匈才重新和親。

西漢一朝和親細節詳見下表：

	年份	對象	公主	使者	禮物	其他
高祖	九年	匈奴冒頓單于	宗室女	劉敬[73]	每年給予棉、帛、酒、米[74]	約為兄弟[75]
惠帝	三年	匈奴冒頓單于	宗室女			
文帝	四年	匈奴頭曼單于	不詳	郎中係虖（音：呼）淺	駱駝一匹，戰馬兩匹，駟馬車八匹[76]	
	六年	匈奴老上稽粥單于	宗室女	係虖淺	約定數量的種子、金、帛、絲綢、駱駝[77]	漢與匈奴約為兄弟，另加豐厚禮物：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件，金製的髮飾一件，黃金裝飾的衣帶一件，黃金帶鉤一件，繡花綢十匹，錦緞三十匹，赤綈和綠繒各四十匹[78]

[73] 《漢書・匈奴傳上》：「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74] 《漢書・匈奴傳上》：「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
[75] 《史記・匈奴列傳》：「約為昆弟以和親」
[76] 《漢書・匈奴傳上》：「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
[77] 《史記・匈奴列傳》：「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
[78] 《史記・匈奴列傳》：「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年份	對象	公主	使者	禮物	其他
景帝	元年	匈奴軍臣單于	御史大夫青翟[79]		與約和親	通關市
	五年	匈奴	公主名不詳[80]			
武帝	武帝即位之初	匈奴			不詳[81]	通關市、厚遇
	元封六年	烏孫王昆莫	江都公主劉細君			
	太初四年	烏孫岑娶[82]	解憂公主			
宣帝	神爵二年	烏孫右大將	馮嫽[83]			
元帝	竟寧元年	匈奴呼韓邪單于	後宮良家子王嬙（昭君）[84]			第一個匈奴單于到漢廷覲見，賞賜更多錦、帛、絮[85]

[79] 《漢書・景帝紀》：「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80] 《漢書・景帝紀》：「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81] 《史記・匈奴列傳》只是交代有和親的約定，並給予匈奴優厚的待遇：「明和親約束，厚遇」
[82] 昆莫之外孫
[83] 解憂公主侍女。《漢書・西域傳下》：「初，楚主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
[84] 《漢書・匈奴傳下》：「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
[85] 《漢書・匈奴傳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

西漢的和親政策反映了甚麼？

縱觀西漢時期，除了武帝兩次與烏孫和親，其餘的和親對象均為匈奴。以和親與匈奴結好，能反映匈奴在西漢時期勢力的鼎盛；反過來說，和親的歷史也從側面反映匈奴的勢力，漢高祖至景帝時期為匈奴勢力巔峰，但武帝開始，漢匈和親次數明顯減少，即代表匈奴勢力急速衰退。元帝授予呼韓邪單于的禮物非常豐盛，但是派去和親的並非公主，而是宮女，這點不但能折射出匈奴勢力的轉變，同時亦見漢廷態度的不同。

總結

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墓是西漢末年至東漢時期的匈奴貴族墓。當中的三件文物：銅鏡殘片、玉璧及馬飾都是漢式設計，證明了漢匈之間在此時期有物質交流。而馬車作和親禮物的記錄已納入史書中，因此高勒毛都2號墓地M1墓的陪葬品有可能是和親禮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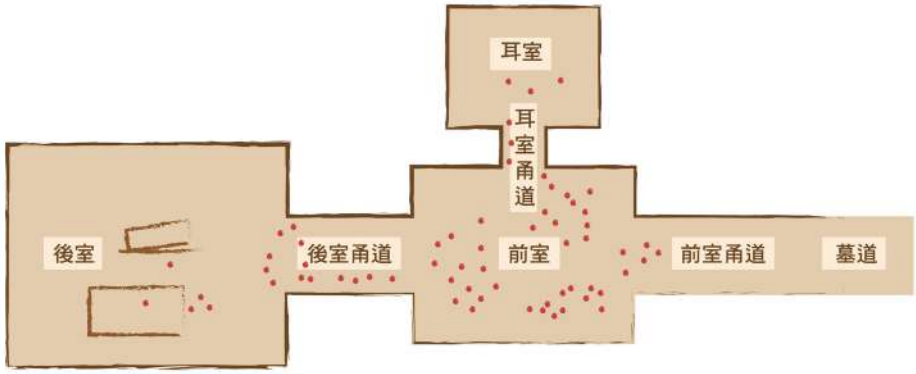
和親乃漢高祖訂立與匈奴結好的政策，透過締結姻親將「公主」嫁予匈奴，每年送上糧食及財物，換取短暫和平。但這個政策在武帝時期出現變化，應付匈奴的手段從和親變成了征伐。直到宣、元時期，漢匈重新和親，但此時匈奴的勢力已大不如前，須歸附於漢廷。

6 北魏司馬金龍墓

東漢結束後，中國進入長達三百多年的混亂時期，史稱「魏晉南北朝」。三國鼎立後，西晉曾有短暫的統一。此後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對峙，政局紛亂。但亦在這一個時期，各族之間的交往加強了，促進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本文將以於山西大同市發現的司馬金龍墓為例，透過三組文物：〈司馬金龍墓誌〉、墓室石棺床雕刻及《古賢列女圖》漆畫，探討北魏政權的漢化模式，以及胡漢文化在這個時期的交流、融合過程。

司馬金龍墓的基本資料



司馬金龍墓平面圖
（重繪圖，圖片來源：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年03期，頁21）

司馬金龍墓穴是司馬金龍與其妻欽文姬辰的合葬墓，當中文物的設計及內涵均展現了北方鮮卑族和南方中原文化的融合。

出土地點：山西大同市城東6公里的石家寨村[1]

出土時間：1965-1966年

規模：全墓由甬（音：擁）道、前室、東耳室及後室（主室）構成，總長度近18米，加上墓道全長超過45米[2]。前後兩室均為四角攢（音：全）尖頂，後室高4.2米[3]。

出土文物：早期被盜，仍有大批陶俑、生活用具以及墓誌、木板漆畫等文物共計四百五十四件[4]。

[1] 郝媛：〈北魏《司馬金龍墓表》書法特色研究〉，《美術文獻》，2019年12期，頁54-55
[2] 宋馨：〈北魏司馬金龍墓葬的重新評估〉，《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2期，2002年1月1日，頁274，引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年03期，頁21
[3] 同上註
[4] 伊迪：〈司馬金龍墓葬出土書法資料微探〉，《山西青年》，2016年10期，頁96

誰是司馬金龍？

司馬金龍家世顯赫，他是司馬懿弟司馬馗（音：葵）的九世孫，其父乃司馬楚之，母為北魏宗王女河內公主。司馬家族在三國年間輔助曹魏政權，在朝堂位居高位。自司馬懿開始圖謀奪權[5]，直到266年，司馬炎成功迫魏元帝曹奐（音：換）禪讓，建晉稱帝，是為西晉。

419年，司馬金龍父司馬楚之派遣使者向北魏投降[6]，之後降附於北魏，並為北魏屢立功勞，加上與北魏宗室聯姻，深得統治者的寵信。司馬金龍的經歷和父親相近，不過由於母親是北魏人，加上其自小就已經移居北魏鄴（音：業）城[7]，因此除了傳統中原文化外，亦受北方鮮卑族的文化薰陶[8]。

司馬金龍其後繼承其父瑯琊（音：狼耶）王的爵位，是為「瑯琊康王」，且先後與鮮卑上層貴族聯姻，「納太尉隴（音：壟）西王源賀之女，後娶沮（音：咀）渠氏[9]」[10]，頗得北魏朝廷寵信，此可見於史書的記載、司馬金龍墓出土的墓誌及其他文物亦為佐證。

司馬金龍墓有何重要性？

學者認為「司馬金龍與欽文姬辰合葬墓是迄今為止在大同周圍發現的規格最高、保存最好的一座北魏墓葬」，當中不少出土文物是國寶級別[11]，「能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意識形態、經濟文化生活，其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頗高，在北朝繪畫和書法史上彌足珍貴」[12]。

[5] 高平陵之變，亦稱正始之變，發生於249年2月5日。曹魏宗室大將軍曹爽和朝中重臣太傅司馬懿之間有權力鬥爭，最後司馬懿趁著曹爽與魏帝曹芳到高平陵謁陵時發動政變，控制京城，族滅曹爽。自此司馬氏全面掌權，曹氏皇帝皆淪為司馬家的傀儡

[6] 泰常四年三月癸丑（419年5月3日），薛辯及司馬楚之、司馬順明、司馬道恭派遣使者向北魏投降。出自《魏書・帝紀第三・太宗紀》卷三《帝紀第三》：「三月癸丑，築宮於蓬臺北。司馬德文寧朔將軍、平陽太守、匈奴護軍薛辯及司馬楚之、司馬順明、司馬道恭，並遣使請降」

[7] 今河北省臨漳

[8] 劉曼、吳濤：〈北魏司馬金龍墓室石棺床雕刻圖形研究〉，《藝術品鑒》，2017年15期，頁13-14

[9] 沮渠氏，乃河西王沮渠牧犍女，其生母為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音圖）妹武威公主

[10] 《北史》卷二十九《列傳第十七》：「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

[11] 郝媛：〈北魏《司馬金龍墓表》書法特色研究〉，頁54-55

[12] 劉貴斌：〈北魏司馬金龍墓木板漆畫工藝探究〉，《文物世界》，2020年03期，頁58-64

司馬金龍墓文物

(一)〈司馬金龍墓誌〉



司馬金龍墓誌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大小：49厘米、寬45厘米，有楷書十行，每行七字，共66字，字徑4厘米[13]。

所記時間：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

發現地點：後室甬道

材質：石

狀態：字跡完好

內容：維大代太和八年／歲在甲子十一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代故河內郡溫／縣肥鄉孝敬里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吏部尚書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瑯琊（即琊）康王司馬金／龍之銘

[13] 郝媛：〈北魏《司馬金龍墓表》書法特色研究〉，頁54-55

〈司馬金龍墓誌〉有甚麼重要訊息？

雖然墓誌並無列出司馬金龍的出生年份和壽命，但載有他的死亡時間——他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八年（484年）十二月十九日身故。

銘文的其餘內容則與他的官位有關，他是「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吏部尚書、羽真司空、冀州刺史、瑯琊康王」，既是武官，又掌文職。學者將此墓誌與司馬金龍妻子姬辰的墓誌[14]作對比，發現當中也有記載其父親司馬楚之的職位，兩者內容相近，故推斷司馬金龍繼承了父親原有的爵位[15]。「瑯琊王」則是司馬家族世襲的爵位，「康」乃司馬金龍的謚（音：試）號，用以區別其父親與他的身份。

墓誌的內容反映司馬金龍在北魏朝廷出任許多官職，且世襲爵位。這不但與他本身的家族背景有莫大關聯，更是因為北魏統治者積極推行漢化措施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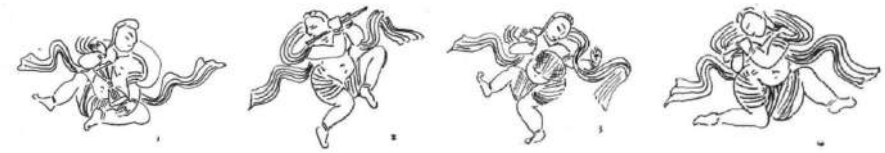
（二）墓室石棺床雕刻

司馬金龍石棺床「由六塊淺灰色細砂岩石板組合而成，前立面石板呈倒山字形，呈南北向置於墓後室西部」[16]。石柱有承托狀的力士、忍冬[17]、伎樂童子、龍虎、鳳、金翅鳥等圖案[18]，當中以伎樂童子圖案最為有趣。

大小：長241厘米，寬133厘米，高51厘米[19]。

材質：石

伎樂童子圖形簡介：



[14] 〈姬辰墓誌〉：「唯大代延興四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漢內溫縣倍鄉孝敬里人、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敦府儀同三司都督梁益兗像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羽真瑯琊貞王故司馬楚之嗣子、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朔州刺史羽真瑯琊王金龍妻，侍中太尉隴西王直懃賀豆跋女，乞伏文照工外孫女欽文姬辰之銘。」，浙江大學圖書館古籍碑帖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歷代墓誌數據庫」引《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網址：http://csid.zju.edu.cn/tomb/stone/detail?id=40288b955ab29f4b015b9fa0c6e500ab&rubbingId=40288b955ab29f4b015b9fa0c6ef00ac，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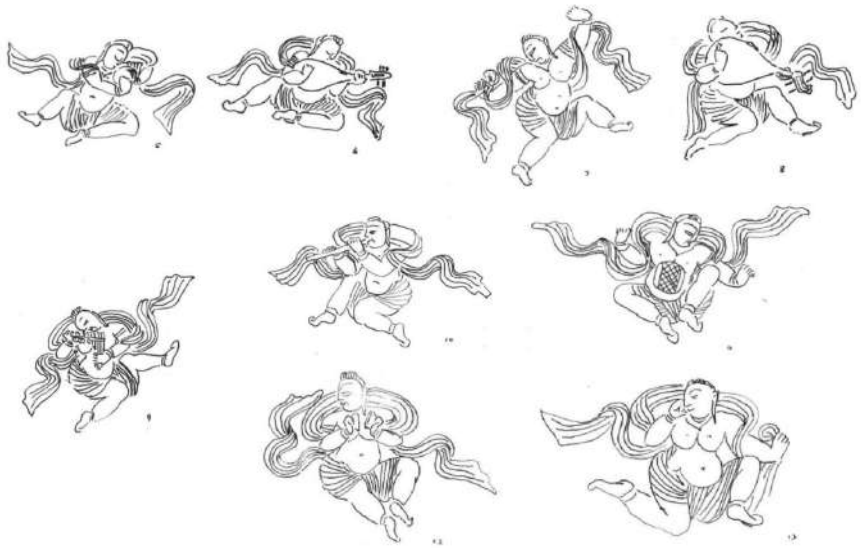
[15] 梁建波：〈關於北魏司馬金龍墓誌的幾個問題〉，《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01期，頁39-40、44

[16] 劉曼、吳濤：〈北魏司馬金龍墓室石棺床雕刻圖形研究〉，頁13-14

[17] 忍冬是花類植物，其圖形常見於中國建築雕塑及其他藝術品中

[18] 劉曼、吳濤：〈北魏司馬金龍墓室石棺床雕刻圖形研究〉，頁13-14

[19] 同上註



伎樂童子
（圖片來源：王漢：〈從司馬金龍墓所出人物圖像談北魏與東晉南朝的藝術交流〉，《湖北美術學院學報》，2019年04期，頁17-23）

根據學者觀察，墓室石棺床雕刻共有伎樂童子十三名[20]。他們均「頭梳髡（音：坤）髮[21]，額頭中間部分留有髮髻，兩耳各垂一撮長髮；上身赤裸，大腹便便；下身著犢（音：毒）鼻褲」[22]。童子「頸佩戴裝飾，陰刻有臂釧（音：寸）[23]、腕釧、足釧，錦帛從頸後繞兩肘飄於身體兩側」[24]。

中間的伎樂童子正翩翩起舞，應是表演的中心人物。在他兩邊的伎樂童子依次演奏「琵琶、曲頸琵琶、排簫、橫笛、鈸（音：拔）、鼓」等樂器[25]。位於最左側屈膝半跪的伎樂童子，右手攏於嘴邊似在喊叫，似是指揮整個演奏[26]。

墓室石棺床雕刻反映了甚麼？

司馬金龍墓中的石雕平整，工藝精湛，圖像的佈局具有邏輯，應是精心設計，這點引證了墓主非凡的身份。

[20] 劉曼、吳濤：〈北魏司馬金龍墓室石棺床雕刻圖形研究〉，頁13-14

[21] 部分頭髮被剃去的髮型

[22] 鬆垮的短褲，即一種男士寬鬆的襯褲

[23] 意為臂飾

[24] 劉曼、吳濤：〈北魏司馬金龍墓室石棺床雕刻圖形研究〉，頁13-14

[25] 同上註

[26] 同上註

鑑賞樂曲乃雅好，孔子對此十分推崇，認為聆聽音樂既能娛樂，也是培養品德的方法，所以歷來備受中原士人的推崇。司馬金龍墓石棺床雕刻有十三名伎樂童子演奏，除了曲頸琵琶，其餘均屬漢族樂器。從此可見胡漢的文化交流，但整體形式仍是以漢樂為主。

另一方面，石棺床雕刻的人物裸體部分較多[27]，上身赤裸顯示了人體骨骼結構[28]，與漢畫較保守的衣飾打扮不同，體現了北魏鮮卑文化的特徵。有學者將司馬金龍墓石棺床雕刻的伎樂童子與同期南朝的南京宮山墓磚印壁畫[29]人物作對比，竟發現兩者有許多共同特徵[30]。雖然南京宮山墓出土的《竹林七賢與榮啟期》[31]「人物身體赤裸部分較少，但比之漢晉傳統的屏風漆畫人物則又較多」[32]。畫家對嵇（音：兮）康與向秀的「肩部、胸部、手臂的結構描繪都比較細緻，人物所著衣物似輕紗薄衫，觀者能夠通過衣服線條感受到其下肌肉骨骼的高低起伏」[33]，而且「嵇康、向秀、阮籍都露出腰部，且明顯可見腰部收縮」[34]，繪畫技法與伎樂童子非常相近。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27] 王漢：〈從司馬金龍墓所出人物圖像談北魏與東晉南朝的藝術交流〉，《湖北美術學院學報》，2019年04期，頁17-23
[28] 同上註
[29] 南朝墓穴，位於南京。該壁畫現存於南京博物館
[30] 王漢：〈從司馬金龍墓所出人物圖像談北魏與東晉南朝的藝術交流〉，頁17-23
[31] 竹林七賢為魏末晉初的七位名士，包括山濤、阮籍、劉伶、嵇康、向秀、阮咸、王戎。榮啟期則是春秋時期的隱士
[32] 王漢：〈從司馬金龍墓所出人物圖像談北魏與東晉南朝的藝術交流〉，頁17-23
[33] 同上註
[34] 同上註

在漢晉及前朝鮮見司馬金龍墓石棺床雕刻的伎樂童子及南京宮山墓《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的人物繪畫技法，因此有學者推測南北兩地並非完全分裂，而是存在著藝術交流，或參考了同期的創作圖式[35]。也就是說，魏晉南北朝不僅有胡人漢化，也有漢人胡化，出現了胡漢文化交流、融合的情況。

(三)《古賢列女圖》漆畫



古賢列女屏風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古賢列女圖》是司馬金龍墓出土的五塊精美朱紅色屏風，題記及榜題的底色為黃色，上書墨書黑字。整個畫面分為上下四段[36]，所描繪的故事出於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和劉向的《列女傳》等漢籍，正反兩面均有人物繪畫，題材是「帝王將相、列女、忠臣、孝子、聖賢等傳統故事」，儒家氣息濃厚[37]。正面為上古至漢代女性的典範人物——「列女」，背面則為古代賢人，學者因而以《古賢列女圖》命名之[38]。

[35] 王漢：〈從司馬金龍墓所出人物圖像談北魏與東晉南朝的藝術交流〉，頁17-23
[36] 白晶：〈司馬金龍墓屏風漆畫的歷史文化價值探究〉，《文物世界》，2020年03期，頁73-75
[37] 同上註
[38] 毛炳軍：〈山西大同司馬金龍墓漆繪屏風及其歷史場域考論〉，《山西檔案》，2018年02期，頁133-135

大小：五塊，每塊長約80厘米，寬約20厘米，厚約2.5厘米。

發現地點：後室

《古賢列女圖》所繪畫的內容是甚麼？

保存較完好的漆畫共有五塊，現挑選其中一塊正面四圖作介紹。

據學者描述，《古賢列女圖》「第一層自右至左繪有虞帝舜、娥皇及女英二妃像、舜父瞽叟（音：古手）與弟象填井、舜後母燒廩（音：凜）[39]三幅畫，反映的是舜恪守孝道的故事」[40]。舜自幼喪母，父親後來續娶生子，偏愛弟弟，甚至想置舜於死地。畫中繪畫瞽叟與象填井，意味著他們二人欲將舜活埋。然而，舜胸懷坦蕩，依然孝順父母，愛護繼弟；面對家人的追殺，他只好躲避起來，不讓他們發現。

「第二層自右至左繪有周武王母太姒（音：似）、周文王母太任、周太王妃太姜三位婦人像」[41]。太姒、太任、太姜是三位周王之妻，她們聰明賢惠，輔佐周王，是婦女的模範[42]。因此，畫師特地刻畫出三位女性容貌端莊，衣帶當風，來展現她們雍容華貴的氣度[43]。

「第三層自右至左為魯師春姜及春姜女二婦人像」[44]，講述了《列女傳・母儀・魯之母師》的故事：春姜因為丈夫早逝，獨自養育九個兒子，她尊天敬地、謹慎祭祀，對兒子管教有方，並身體力行教導媳婦女德。

第四層是〈漢成帝乘輦（音：攆，lin5）[45]圖〉，「自右至左繪漢成帝和班婕妤（音：節如）像」[46]，漢成帝讓班婕妤出行同乘龍輦，但班婕妤並無接受且勸告漢成帝不應如此，反映出她的知書達理[47]。

[39] 糧食的意思
[40] 郭彩萍：〈司馬金龍墓屏風漆畫反映的傳統漢文化探析〉，《蘭臺世界》，2016年24期，頁152-154
[41] 同上註
[42] 白晶：〈司馬金龍墓屏風漆畫的歷史文化價值探究〉，頁73-75
[43] 同上註
[44] 郭彩萍：〈司馬金龍墓屏風漆畫反映的傳統漢文化探析〉，頁152-154
[45] 意為華車
[46] 郭彩萍：〈司馬金龍墓屏風漆畫反映的傳統漢文化探析〉，頁152-154，指出「班婕妤是名門之女，才學出眾，美麗動人，是漢成帝的愛妃。為了能時時看到班婕妤，漢成帝讓班婕妤每天陪伴左右，就連出行時也要和班婕妤同乘龍輦」
[47] 郭彩萍：〈司馬金龍墓屏風漆畫反映的傳統漢文化探析〉，頁152-154

《古賢列女圖》漆畫如何展現鮮卑的漢化？

日本學者古田真一對司馬金龍墓的繪畫有此評價：「司馬金龍墓漆畫儘管出土於北朝的北魏墓，卻完全具備了南朝繪畫的形式」[48]，在外形設計及圖畫內涵兩方面均體現了漢化特徵。

首先，司馬金龍墓中五塊屏風均為紅底墨書，有強烈的顏色對比，是中國漆藝作品最典型的顏色搭配[49]，在配色上延續了漢族文化的傳統。不但如此，朱紅色象徵尊貴[50]，而「屏風最早源於西周，是周天子的專用器具，是統治者無上權力的象徵。後隨著社會發展廣為封建權貴使用……隨葬屏風基本出高官達貴之墓」[51]。這點再可說明司馬金龍身份顯赫，雖然有一半鮮卑血統，但仍追慕漢族文化。

其次，漆畫屏風的內容圍繞著上古時期的歷史故事和漢代的人物傳記，內容也盡述儒家之德。上文提及的舜，是上古聖皇之一，其為人子恪守孝道，即使父親、後母與繼弟百般刁難且欲置其於死地，他也沒有報復，而是繼續孝順父母、體恤家人。圖二至四都是宣揚女德。「周室三母」：太姒、太任、太姜三位周后母儀天下，輔助丈夫成就偉業；春姜獨自養育九子成人，言行身教；班婕妤提點漢成帝注意身份，造就明君。

儘管修墓者並非司馬金龍本人，但有可能是其生前佈置或其後人所立，這可以側面推斷司馬金龍本人或其後代，甚至整個北魏政府的上層人員均非常推崇漢族文化。

小結：司馬金龍墓中的人物形象有何不同？

司馬金龍墓室石棺床雕刻的伎樂童子與《古賢列女圖》中人物的形象有非常大的差異。前者袒胸露臂、奔放自由，屬邊疆民族本色；後者穿著厚重的衣服，難以窺探衣服下身體的線條[52]，可說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畫法。然而，巧妙的是這兩種風格存在於同一墓中，而不顯突兀，文物的本色有如墓主身世一樣胡漢融合。

[48] 王漢：〈從司馬金龍墓所出人物圖像談北魏與東晉南朝的藝術交流〉，頁17-23
[49] 郭彩萍：〈司馬金龍墓屏風漆畫反映的傳統漢文化探析〉，頁152-154
[50] 同上註
[51] 同上註
[52] 王漢：〈從司馬金龍墓所出人物圖像談北魏與東晉南朝的藝術交流〉，頁17-23

司馬金龍墓與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關係

魏晉南北朝是歷史上承前啟後的重要王朝，促進了藝術的發展[53]。南北朝政權更替頻密，尤其是北方政權由邊疆民族建立，十六個政權就有八個是鮮卑族所建立[54]。「北魏拓跋政權最早居住在黑龍江、嫩江流域大興安嶺附近，過著遊牧生活。386年建立代國後遷都盛樂[55]，改國號為魏。398年，拓跋珪（音：歸）遷都平城[56]，正式稱帝」[57]。入主中原後，北魏統治階級用儒家的禮、樂、法化民，頒布了一系列漢化改革政策——「成教化，助人倫」。

平城是今日的大同市，與司馬金龍墓發現的地點一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在486年實行「太和改制」，由平城遷都洛陽……通過漢化政策而發展成為切實控制中國北方的強盛帝國」[58]。儘管在「太和改革前，當時的平城以鮮卑文化為主」[59]，但「司馬金龍屏風漆畫中的列女孝子內容無須從南方傳入，該題材也可能自漢代以來一直在北方地區流傳」[60]，此或可為司馬金龍墓的文物極具漢族文化特色的原因。

另外，〈司馬金龍墓誌〉所記的時間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即484年，比「太和改制」還早了兩年，即可以側面論證北魏政權的漢化政策比官方全力推動的「太和改制」時間更早。

我們如何演繹司馬金龍墓的考古發現

上文已簡述司馬金龍的家族背景：他是晉室之後，父親改投北魏政府、娶宗室女並擔任要職。而他有一半鮮卑血統，繼承了父親的爵位。墓穴出土的墓室石棺床雕刻及《古賢列女圖》屏風，其設計之精密反映了墓主社會身份之高。由此我們可見北魏朝廷甚為寵信司馬家族，漢化之意非常明顯。

不僅如此，學者認為司馬金龍本人雖為鮮卑族與漢族的混血兒，但其心底裏卻是篤信與踐行漢晉文化[61]，墓中的《古賢列女圖》屏風就是最佳的證物。西漢宗室及文學家劉向所作的《列女傳》，以「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和「辯通」等六卷記錄各類美好的女性德行，為社會提供了理想女性的典範。文中提及的「《周室三母》」、「《魯之母師》」及娥皇、女英的記錄均出於此；而班婕妤的事蹟則出自《漢書・外戚傳》；《史記・五帝本紀》則記錄了舜的美好德行。屏風畫的創作毫無疑問是對漢族文化，尤其是對儒家的五倫非常看重：母親言傳身教、子女應該孝順父母、妻子應該輔助丈夫。學者由此評價：「漆繪屏風作為典型的漢晉家具，也是先秦漢晉文化遺緒的載體，圖繪列女古賢，表其事蹟，奉為楷模，凸顯儒家文化之附加價值——器以載道」[62]。

司馬家族投靠北魏政權，為該政權注入漢化元素，但同時鮮卑文化也在影響司馬金龍，這可見於墓室石棺床雕刻伎樂童子裸露的設計。北魏鮮卑文化，乃至整個魏晉南北朝其實並非完全割裂，反之，兩地應存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總結

司馬金龍墓是北魏時期的貴族墓葬。本文以當中的〈司馬金龍墓誌〉、墓室石棺床雕刻和《古賢列女圖》漆畫三組文物輔以史書記載，透析墓主的生平、鮮卑政權漢化的端倪及南北文化交流的軌跡。就文化影響而論，司馬金龍墓集胡漢文化於一體，這與墓主的生平與當時的政策有很大關係。

[53] 劉曼、吳濤：〈北魏司馬金龍墓室石棺床雕刻圖形研究〉，頁13-14
[54] 毛炳軍：〈山西大同司馬金龍墓漆繪屏風及其歷史場域考論〉，頁133-135
[55] 今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
[56] 平城為今山西大同
[57] 周冉：〈宴樂雜耍狩獵勞作壁畫中的北朝社會生活〉，《國家人文歷史》，2020年17期，頁70-77
[58] 毛炳軍：〈山西大同司馬金龍墓漆繪屏風及其歷史場域考論〉，頁133-135
[59] 韋正、馬銘悅：〈司馬金龍墓屏風漆畫散論〉，《西部考古》，2018年02期，頁219-233
[60] 同上註
[61] 毛炳軍：〈山西大同司馬金龍墓漆繪屏風及其歷史場域考論〉，頁133-135
[62] 毛炳軍：〈山西大同司馬金龍墓漆繪屏風及其歷史場域考論〉，頁133-135

7

隋唐運河新知

運河運輸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下至清代才見式微。隋代二帝為達成統一大業，開鑿五條運河，連接南北；唐代乃至之後的時代也是依賴著運河達到了政治和經濟文化的大一統，可說運河與朝代憂戚與共，對歷史發展影響深遠。

運河不只是一條河流，其沿線古蹟豐富，有橋樑、倉窖、民宅、古塔、城址等，這些都是文化的瑰寶。為配合主題，本文將抽取隋唐糧倉及柳孜（音：之）遺址，以文物角度敘述隋唐的運河歷史。

甚麼是隋唐運河？



隋運河分佈圖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運河是人工開鑿的河流。隋代興修的五條運河，沿用至唐，變動不大，故以「隋唐運河」概括之。

隋文帝時期建廣通渠與山陽瀆（音：毒）：

- 584年設廣通渠，連接大興至潼關。
- 587年設山陽瀆接通山陽至江都段；605年重修。
- 605年隋煬帝即位，立東都洛陽，建立其餘三條運河：
- 605年設通濟渠，洛陽至盱眙（音：虛兒）段。
- 608年設永濟渠，連接洛陽與涿州[1]。
- 610年建江南運河，江都、餘杭[2]互通。

除廣通渠以外，其餘四條運河以東都洛陽為中心相互銜接[3]。唐代基本沿用隋運河，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疏通，如四疏汴渠[4]、五浚山陽瀆[5]、三治江南運河等工程[6]。

隋代的運河有甚麼歷史意義？

中國的運河開鑿工程始於春秋，但這時所修的河道只屬地區性質，並未跨越全國[7]，直到隋代，運河工程才得以實現。隋運河全長5000里，溝通了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和海河五大水系，將河南、河北、江蘇、浙江等地緊密扣連起來，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將南方重要農業產區與中原政治中心和北方軍事重鎮連成一體[8]，應是當時世界最長的運河[9]。

1 今北京
2 今杭州
3 任紫鈺：〈淺談隋唐大運河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中國文化遺產》，2016年05期，頁108-113
4 潘鏞等：《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52-55，汴渠即隋通濟渠，該渠接通黃河，故有泥沙沉積，在唐有四次疏通工程
5 同上註，頁55-58，唐初長江江面收窄，長江以南不能行船，故要修築
6 同上註，頁58-63
7 同上註，頁15
8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世界遺產》，2014年07期，頁46
9 潘鏞等：《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頁15-16

隋運河體系開啟後世治河的傳統。唐開國以來投放不少資源疏通運河，促進經貿文化交流，累積財富，締造「開元盛世」。北宋都城汴京便是得益於隋唐運河，成為貿易之都，這可參考本教學資源冊（中二級）所載〈《清明上河圖》與宋代城市〉一文。明清時期開通京杭大運河，令運河網絡涵蓋的地區更廣泛。

建設運河工序複雜，不但需要大量的資金和時間，還須要動用龐大的民力，所以修築運河也成為統治者集權和威信的象徵。那麼為甚麼歷代有開鑿和維護運河的傳統？運河又為統治帶來甚麼好處？下將探討。

為甚麼要開鑿運河？

漕運比起陸運的遞送量更大，方便長途運送如木材、糧食等的重物。不但如此，漕運也能縮短運輸時間，使君主能更有效地運用全國資源，比之陸路運輸更符合經濟效益。所以儘管開鑿及維護河體的支出甚高，統治者不計成本都要打通各地運河。

雖然楊堅得北周靜帝禪讓，在581年建隋，但是時天下尚未統一，仍有南陳等政權的存在。隋文帝在建國後三年下令開通運河，不難想像建構運河網絡最初始的目的是達致國家的大一統。以下將從政治及經濟文化層面，配合文物以作分析。

(一)建設運河有甚麼政治誘因？

政治的統一，既包括剛性的擴展國土、維護主權，又可指軟性的宣示權威和穩定資源供應、確保民生的政策。隋運河兼具上述作用，可謂隋代最重要的基建。

擴展國土、維護主權

上文提及，隋文帝最先建設的運河是廣通渠，這條運河連接首都大興至潼關，潼關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所以這項建設應是為了確保關中東部的安全，守護首都。

三年後隋文帝又下令開鑿山陽瀆，學者認為此次建造是預備伐陳，為運送兵糧物資，山陽瀆竣工之後，隋文帝便大舉出征[10]。

[10] 潘鏞等：《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頁26

江南是陳朝的中心地帶，誠需收攏以穩定政局，所以又開通了其餘通往南面的運河。隋滅陳次年，江南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叛亂，隋軍平亂所用時間比滅陳還要長[11]。因此，隋文帝令楊廣坐鎮江南達十年[12]，目的就是為了監察江南，防止叛亂勢力死灰復燃。

學者認為江南是隋代水上軍事要地，開鑿南方運河是一種準備[13]。江南地區河網交織，當地人擅長造船，一旦叛亂，水戰是其特長；若遇劣勢還可以避於孤島或海上[14]。比如開皇十年（590年），高智慧[15]叛亂，戰敗後就逃至海上。因此，要徹底消滅叛軍，必須出動水軍[16]。

「從平陳到楊素平亂，或從海道，或從山陽瀆入揚子津來到江南」[17]。建設江南運河是最直接掌管這片水域的方法，即使有叛亂，軍隊及物資都可以第一時間到達，在軍事上鞏固政權。

宣示權威

隋煬帝建設三條運河，且沿河建設奢華的行宮，方便自己南巡玩樂，可說是勞民傷財的反面措施，為後世所詬病。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運河的建設連接南北水陸網絡，隋煬帝認為「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18]，指出統治者必須巡視國土，親自體察民情。南巡之事可反映他有統一國家的自覺——繼承傳統，借出遊宣示個人的權威，穩固統治地位，加強民間的向心力[19]。

穩定民生

同時，搭建水路也有助解決首都糧食供應的不足，從而穩定民生，達致社會安寧。隋都大興位於西安，關中平原群山拱衛，易守難攻確保政治的穩定。魏晉南北朝連年戰亂導致大量人口南遷，令人口急速上漲，誠需依賴其他地方運輸物資[20]。因此，隋煬帝才會在即位之後立刻建立東都洛陽，便是為日後運河的工程鋪路。江南在中國有「糧倉」的美譽，其氣候相對暖和濕潤，長江也較黃河穩定，便於農業種植。在605年至610年間，隋煬帝一連開鑿的通濟渠、永濟渠和江南運河，這三條運河互通。運河體系由江南延伸開來，連接北方及關中，將南方的糧食送往各地，以解決糧食不足問題。

[11] 張劍光：〈江南運河與唐前期江南經濟的面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4年04期，頁15-27
[12] 同上註
[13] 同上註
[14] 同上註
[15] 高智慧（？-590年），越州會稽人，隋朝初年江南地區叛軍首領。開皇十年（590年）起兵反叛，自立為帝。隋文帝楊堅派遣名將楊素、大將軍李景前往鎮壓。高智慧節節敗退，被斬首於泉州
[16] 張劍光：〈江南運河與唐前期江南經濟的面貌〉，頁15-27
[17] 同上註
[18] 《資治通鑑》，卷181，大業五年三月
[19] 張劍光：〈江南運河與唐前期江南經濟的面貌〉，頁15-27
[20] 潘鏞等：《隋唐時期的運河和漕運》，頁28

(二)建設運河與確保糧食供應的關係

學者指出隋代兩位君主都在運河附近，尤其是洛陽修建大量的糧倉，積穀防饑[21]。近年考古挖掘得以證實運河是運送糧食的重要渠道。以下將以黎陽倉、回洛倉和含嘉倉為例，加以說明。

1.黎陽倉遺址

黎陽倉是目前考古發現的永濟渠沿線唯一的大型轉運糧倉[22]。黎陽倉城依山而建，平面近長方形，東西寬260米、南北殘長300米，目前探明儲糧的倉窖有80餘座[23]。

建倉時間及使用時間：隋文帝（583年），且沿用至初唐[24]。

位置：河南省濬縣城東關大伾（音：披）山北麓，東鄰黃河故道，西距永濟渠約1.5公里[25]。

歷史意義

倉城遺蹟出土了不少帶「官」字款板瓦[26]，可見這是一個官倉，用於政府儲糧而非民間私自存取。其面積之大、且規劃良好，證明隋政府主動建倉，良好利用運河網絡有意識地儲存糧食。

2.回洛倉遺址

建倉時間及使用時間：建於隋煬帝大業初年（605至606年間），一直使用至初唐[27]。

位置：洛陽城北1200米[28]。

考古發現的倉窖數量700座左右，是現時發現倉窖數量最多的古代糧食倉儲遺址[29]。倉城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1140米、南北寬355米，且有寬3米的城牆。中部為管理區，東西為倉窖區，存儲糧食為黍[30]。

3.含嘉倉

建造時間：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唐代繼續擴建。

位置：洛陽城內

含嘉倉作為儲糧城要晚於回洛倉，但儲糧基地已經從洛陽城外轉移到城內[31]。「整座倉城佔地面積達43萬多平方米，共探明287座糧窖，四周有城牆和城門，內部十字形大街將倉城分為庫區、生活管理區和漕運碼頭區。同時也是唐代最大的官倉」[32]。

歷史意義

含嘉倉出土的銘磚長32.5厘米，厚6.5厘米，可見的文字為：

「含嘉倉東門從南第二十三行從西第五窖，△△蘇州通天二年粗糙米白多一萬三△十五石△內右聖歷二年十一月八日納了」

上述的銘磚清晰交代了倉庫的名稱，也有明確時間指出糧食是在唐代武周時期收納。銘磚上刻錄著糧窖的位置、糧食品種、數量、來源地等，帶出該倉的糧食來源地分佈在大運河沿線[33]。

糧倉的形制與保存

學者認為現時「發現倉窖的形制基本相同」[34]：「均呈口大底小的圓缸形。在修建時一般先夯（音：坑）實窖的底、壁，並火燒烘乾，再用土和黑炭拌成的混合物塗抹做防潮層，鋪設木板和草再裝糧食。窖頂用木板搭架，再鋪以很厚的草蓆、塗上混合泥，搭建成一個類似房屋一樣的坡屋頂。這樣的封存方式可有效防止雨雪、潮濕對糧食的影響，儲糧時間一般可達10年以上」[35]。

[21] 曾謙：〈隋唐洛陽運河體系與漕糧運輸〉，《農業考古》，2013年01期指出：「洛陽的漕糧運輸從隋文帝開皇年間就已開始。隋文帝定都長安以後，鑑於『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新唐書》志第43，食貨3）的困境，決定從關東的河南、河北地區轉輸糧食至京。於是，隋開皇三年（583年）在黃河沿岸的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在衛州境內置黎陽倉。同時，與此相配套，還在渭河南岸修建一條全程三百餘里的廣通渠，以加強關中地區的糧食運輸」
[22]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頁48
[23] 同上註
[2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中國文物報》，2015年1月9日8版
[25] 同上註
[26]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頁48
[2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中國文物報》，2015年1月9日8版
[28] 同上註
[2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中國文物報》，2015年1月9日8版
[30] 同上註
[31]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頁46
[32] 同上註
[33] 同上註，頁47
[34] 同上註，頁46
[35] 同上註

小結

糧食是國家發展的必需品，保持穩定的供應有助達致社會安寧，維護民生；反之，遇上災荒國家的糧食短缺，便需要大量向下徵納，百姓收成不足尚且未能應付生活，還要被迫上繳，容易產生反叛情緒，動搖政權。

是次抽取的三個倉城都是在運河附近，黎陽倉位於永濟渠，而回洛倉和含嘉倉都在運河網絡中心點——洛陽，可見隋代運河的建設方便了儲糧，在基礎上達致穩定的糧食供應，對維護民生和應付危機有重大作用。

不但如此，隋建設的糧倉到唐代仍持續使用，其存糧量之大、倉庫規劃之精細以及選址均見政府對儲糧一事十分重視。

另外，糧倉的庫儲也是透視隋唐社會的優質第一手史料，它們的存在告知後人——隋唐兩代的糧食類型。比如黎陽倉窖內近底部有為帶殼的粟、黍及豆殘存[36]，而回洛倉藏黍（音：鼠）[37]、含嘉倉則有白米的記錄[38]，這些證據揭示了隋唐的飲食文化與生活模式。

總括而言，運河的建設是政治統一的必要措施，有軍事用途及民生用途，方便監視南方，兼具進攻與防守功能。

（三）建設運河與經濟和文化關係

運河的建設不只為方便統治者監察與宣示權威，這也是國力的指標，屬於軟性宣傳，在經濟文化上促進南北大一統。運河遺址歷經時光的洗禮已經所存無幾，但近年考古挖掘有一重大發現——柳孜遺址，向我們還原隋唐運河之一的通濟渠到底運送甚麼物品。

[36] 洛陽市考古研究院（河洛文明起源研究中心）：〈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網址：https://www.lykgy.com.cn/keyanchengguo/，瀏覽日期：2020年11月26日
[37] 同上註
[38] 李琴：〈運河糧倉——考古發掘揭秘漕運歷史〉，《世界遺產》，2014年07期，頁47

甚麼是柳孜集遺址？

柳孜集（又名柳孜或柳孜村）位於淮北市濉溪縣百善鎮境內[39]，是淮北隋唐大運河的遺址，被確定為1999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並在2014年申遺成功。學者認為「柳孜是隋、唐、宋三代，淮北大運河岸邊的一個重要集鎮，既是漕運中轉碼頭，又是較大的商品集散地」[40]。

柳孜集有甚麼考古發現？

柳孜挖掘出眾多文化遺物、八艘唐沉船遺骸和碼頭遺址。該遺址出土大量生活用具，以瓷器所佔的比例達八成五[41]，專家鑑定這些器物的製作時代涵蓋了隋唐至元代，瓷器的來源為南北的著名窯口[42]，涵蓋安徽、淮北、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河南、陝西、河北等地[43]。瓷器中生活用具包括食具和寢具，以飲食器具中碗、盤、盞類易碎的消耗品最多[44]。

除了陶器之外，還有挖掘的品種眾多，另有鐵器、銅錢、石器、骨器等文化遺物，在歷史上十分罕見，可歸納如下。

- 娛樂用具：陶球、陶鈴、骰子、瓷圍棋子、象棋子、石球、石錠[45]
- 武器：鐵矛[46]
- 俑：人俑及動物俑[47]
- 飾品：骨簪、銅簪、木梳[48]

不僅以上文物，另一枚刻有「緘滕」的殘石印章更是向人揭示沿河貨物具私人交易性質。該印章的印文鑿刻深度0.5厘米，印面4.9厘米，厚1.7厘米。該石的材質為廣東肇慶端溪紫石。印面為圓角方形，印邊較寬，印文部分殘破，但仍可辨認出為「緘滕」二字[49]。「緘滕」一詞在《辭源》有「封存」的意思，所以應是防止貨物私自拆封而印在封泥上的一種取信之物[50]。

[39] 今泗永公路
[40] 楊忠文：《中國隋唐大運河・淮北新韻》（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頁103
[41] 陳超：〈安徽隋、唐、宋古運河遺址考古研究〉，《中國港口》，2019年S1期，頁91-98
[42] 同上註
[43] 同上註，指出瓷器的產地為安徽的壽州窯、蕭窯、繁昌窯；淮北烈山窯；浙江的越窯；江西的吉州窯、景德鎮窯，福建的建窯，湖南的長沙窯、岳州窯，河南的鞏縣窯、鈞窯、鶴壁窯、界莊窯，陝西的耀州窯、黃堡窯，河北的邢窯、定窯、磁州窯等
[44] 同上註
[45] 陳超、宮希成：〈安徽柳孜隋唐運河遺址第二次考古發掘〉，《大眾考古》，2014年03期，頁14-15
[46] 同上註
[47] 同上註
[48] 同上註
[49] 楊忠文：〈隋唐運河遺址出土的『緘滕』石印〉，《收藏界》，2010年05期，頁108
[50] 同上註

柳孜集出土的文物反映甚麼？

1. 柳孜出土的文物多樣化，基本為消耗品與消費品，當中以瓷器餐具佔量最多。瓷器的製作需經歷複雜的工序，加上又是易碎品，在這種情況下柳孜集仍挖掘出大量的瓷器，這便直接披露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優渥，肯定了隋運河的建設為唐代奠定物質基礎。

2. 挖掘的文物來源地遍及五湖四海，以南方最多。可見運河網絡促進了南北資源互通，交通往來便利，且有利於商業交流和文化融合。

3. 「緘滕」印章的發現或證明部分貨物並非官用，而是民用，即代表隋唐運河有很高的開放性，政府對商業發展持支持的態度。

總結

中國的運河古已有之，但隋朝是歷史上第一個建運河將南北連接起來的朝代。建設運河的目的是為了達致軍事、政治及經濟文化上的大一統，出土的文物證明了這些理念的實踐確具成效。

糧倉的發現主要論證了隋唐重視糧儲的政策，這也再次認證運河網絡有助於集合和囤積南方各地的糧食。柳孜遺址則披露隋唐時期經濟的強大及高度自由，也進一步說明了物產富庶的南方城市正不斷加強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從上可見，運河對隋唐政治及經濟影響確實不可忽視。遺憾的是，隋從建立到滅亡只經歷兩代，僅僅39年便亡國了，而花費甚巨的運河網絡，也是為唐的繁盛「作嫁衣裳」。

8 長安城與唐代多元文化

長安位於關中地區[1]，是西漢、隋[2]、唐等十三朝的都城。618年，唐高祖將「大興」易名為「長安」，取其長久安定之意，設首都於此，寄語對國家發展的期盼[3]。

開放多元是大唐文化的代名詞，而長安作為唐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其寺廟林立，外國旅客絡繹不絕，市場交易頻繁，更是完美闡述了唐朝的氣質。故此我們不妨以首都長安作為切入點，並以宋人呂大防的《長安圖》剖析其城市結構，從宗教和商貿兩個層面，感受唐文化的多元色彩，繼而以文物〈蘇諒妻馬氏墓誌〉為例，分析中外文化融合交流的情況。

長安的城市佈局

據統計，長安的人口高達一百萬[4]，佔地84平方公里[5]，或是當時世界上最高人口的聚居地。長安的城市佈局與隋大興城大致相同，不過面對如此龐大的人口，唐代君主也作出相應的擴建，並新建大明宮。

我們現在對長安古城的認識來自呂大防的《長安圖》[6]及其他文獻。現代考古學家以呂大防的繪畫重現唐長安城的面貌，研究出長安城方正對稱，印證了白居易《登觀音台望城》詩云：「百千家似圍棋局」的說法。以下將輔以經修復的《長安圖》解說長安城方正、對稱的特色：

1 大概是現今西安一帶，但唐代的長安城規模遠大於現代的西安
2 名為大興
3 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6），頁15
4 劉章璋：《唐代長安的居民生計與城市政策》（臺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頁90
5 龔國強：〈再現輝煌隋唐長安城遺址考古精粹〉，《大眾考古》，2019年12期，頁21
6 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頁7；李健超：《漢唐兩京及絲綢之路歷史地理論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頁291：「南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一書的記載，《長安圖》，元豐三年正月五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汲郡呂公大防，命戶曹劉景陽按視，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檢定，其法以隋都城大明宮，並以二寸折一里，城外取容，不用折法。大率以舊圖及韋述《西京記》為本，參以諸書及遺跡」



［宋］呂大防《長安圖》復原圖

為甚麼說長安城「方正」？

長安城分為三重，宮城是皇廷所在地；皇城則為百官之所；外廓城是一般貴族和平民的居所及活動之所[7]。城市四面由夯（音：坑）土城牆圍繞，清楚標明城市的範圍，在不同方向設木城門由士兵守衛[8]，防衛森嚴。長安城以里坊制度劃分區域，一個方形的城市被劃分成108坊，東屬萬年縣，有54坊；西屬長安縣，有54坊[9]，每一坊四面都有牆圍繞[10]。

7 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民族研究》，2000年03期，頁63
8 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頁23
9 曹爾琴：〈唐代長安城的里坊〉，《人文雜誌》，1981年02期，頁83指出長安有109坊，東有54坊，西有55坊；但實際上里坊的數目有波動，此處取108坊為數，是因為此數較普遍。來源出自龔國強：〈再現輝煌隋唐長安城遺址考古精粹〉，頁20的考察：「里坊數先後略有變化，唐初置時為108坊，後因大明宮新建，其南里坊分割而旋增為109坊，至開元十四年（726年），因興慶宮擴建又成108坊，遂成永制」；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頁63，則明確提出東西里坊的數目均為54
10 曹爾琴：〈唐代長安城的里坊〉，頁84

為甚麼說長安「對稱」？

長安城東西結構對稱，各司其職。城內以要道朱雀大街分割東西，兩個市場因為方位不同，被稱為「東市」和「西市」。東邊人口較多，發展地方較少，屬於平民住宅區，最下方有一曲江芙蓉池，不過並非公眾開放場所，只有高中進士才有參加「曲江大會」[11]的資格；西邊則有較多地方，貼近絲綢之路，中間有售賣貴價貨品的西市，西市附近有不少胡寺，是繁華的商貿文化地帶。

長安的城市管理怎樣？

面對如此龐大的人口，必須有嚴格的指引，以維持秩序，長安的宵禁制度就是一例。六街各設街鼓，鼓聲響起，城門、坊門就要關閉[12]，夜間禁止出入[13]。直至早晨再次敲鼓，城門才會再次打開[14]。城市設左右街使夜晚巡邏[15]，如發現犯夜者，則用鞭或竹板打其身體二十下以作懲罰[16]；越坊市垣籬者，則杖七十[17]。遇到緊急事務或婚嫁喪病等特殊情況必須夜行，就應持官府或本坊文牒，經檢查後才能夜出坊門[18]。

我們能從長安的佈局和城市管理得出甚麼訊息呢？

長安城方正對稱，毫無疑問是出於精心規劃。如此精心的設計使城市井然有條，內外交通便利，促進了中外的文化交流，是長安繁盛的必要條件。

從另一角度來看，長安城的佈局也有維護皇權的目的。長安如一個圍城，城的外圍、里坊都有夯土護牆圍繞，既隔絕外來威脅，又明確控制居民的活動範圍；六街的終點是不同方位的城門，設常駐守衛，即使城內有動亂也能夠快速到達。城市的硬件配套不但有保護的作用，更具一定的監察功能。配合宵禁措施和嚴謹的《唐律》，就可確保城市秩序的穩定。唐文化雖然多元，但我們也可以從城市的管理窺見政府對人民的嚴格控制。

[11] 曲江大會為新科進士的集宴，也是身份的象徵
[12] 肖愛玲、周霞：〈唐長安城城門管理制度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1月41卷01期，頁68引趙貞〈唐代長安城街鼓考〉，《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03期一文指出宮城、皇城城門在五更一點開啟，按現在時間推算應為凌晨3:24；日入前五刻閉門，即17:48。京城（外郭）門四更一點開門，相當於凌晨1:40分。對於外郭的閉門時間兩者有不同看法，趙貞按日入前十四刻閉門，推算時間大概在15:38；而肖愛玲及周霞則認為外郭門的關閉時間要更晚，應在17:48後
[13] 肖愛玲、周霞：〈唐長安城城門管理制度研究〉，頁63
[14] 同上註，頁67
[15] 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頁57引《新唐書・百官志四上・左右金吾衛》
[16] 肖愛玲、周霞：〈唐長安城城門管理制度研究〉，頁67引《唐律疏議》：「閉門鼓後，開門鼓前，有行者，皆為犯夜，違者，笞二十」
[17] 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頁57
[18] 肖愛玲、周霞：〈唐長安城城門管理制度研究〉，頁67-68

從不同面向看唐的多元文化

上文勾勒出長安城的具體形象，以下將分別介紹長安城的特點，證明其如何達致文化的開放及多元：

(一)交通便利，水陸皆宜

交通便利是城市發展的必要條件，長安四通八達，有利文化和商業交流。長安城有精心的城市設計，這點可見於城內的六條主要道路——「六街」[19]，每條街都通往城門，東西相連、南北互通，陸路四通八達，方便其他地方人士來訪：

1. 開遠門街至通化門街[20]
2. 金光門街至春明門街[21]
3. 延平門街至延興門街[22]
4. 安化門街至芳林門街[23]
5. 明德門街至朱雀門街[24]
6. 啟夏門街至興安門街[25]

此外，長安被渭水、涇水、灞水、滻水、澧水等八條河流環繞[26]，便於排水和灌溉[27]，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先天優勢。自隋代開始挖掘大運河，唐繼續這個工程，構建成完善的水路網絡。配合運河系統，日本、朝鮮、印度、波斯、大食等各地商旅都能輕易以水陸兩路到訪長安城[28]。

文獻顯示有不少外國人在長安進行文化商貿交易，並在此常駐生活，甚至成為唐朝官員[29]。長安的商業蓬勃發展，而非法勾當之事亦時有出現，由敦煌莫高窟出土的《胡商遇盜圖》便清晰描畫了三個漢人盜賊伏擊胡商團隊的情況。

[19] 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頁23
[20] 肖愛玲：《古都西安：隋唐長安城》（西安：西安出版社，2008），頁104
[21] 同上註
[22] 同上註
[23] 同上註
[24] 同上註
[25] 同上註
[26] 王蓬：〈漢唐長安〉，《絲綢之路》，2017年05期，頁63
[27] 王才強：《唐長安的數碼重建》，頁25
[28] 武復興：〈唐長安的市場和商業〉，《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02期，頁42
[29] 同上註，指出日本人阿倍仲麻呂（中國名字叫晁衡，也作朝衡）曾在唐王朝任秘書監、散騎常侍等職；印度人羅好心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

（二）廟宇繁多，百花齊放

長安是文化之都，這可體現在林林總總的寺觀建設，不同的宗教在此紮根，合共有151所宗教場所。著名的寺廟要數大慈恩寺，乃是長安四大譯經場之一，玄奘法師在此潛心翻譯佛經十餘年，佛教歷史遺蹟大雁塔也位於寺中。除此之外，長安的宗教也別具異域色彩，景教自唐代傳入中國，長安城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向我們交代了景教在唐代流行的情況。寺廟的具體例子及種類可參考後文「長安城宗教列表」。



大雁塔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大秦寺景教碑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為甚麼長安城廟宇眾多？

廟宇的作用不僅於供奉神明，還有其他附加價值。它們既是宗教場所，也是旅館。據統計，唐國子監收各州府學生，最高時期有八千留學生[30]，面對如此多的外來人口，廟宇就成為了商人、士子住宿、修業的臨時居所[31]。寺院風景優美，庭院清幽，同時也是文人騷客聯誼之地，有賞花、賞月的雅致活動[32]，不少唐代文學作品都有提及。

長安的寺觀多建在里坊一隅，方便宗教活動[33]。108坊過半數都有涵蓋宗教網絡[34]，多數寺觀分佈在外廓北部，即長安的中心區，貼近宮城、皇城的核心區及兩市的中心商業區，是居民集中的熱鬧繁華之地[35]。下表就此作簡介：

長安城宗教列表[36]

	數目	宗教	例子
僧寺（男）	81	佛教	大慈恩寺（大雁塔）、薦福寺（小雁塔）、大興善寺[37]
尼寺（女）	28	佛教	龍華尼寺、法明尼寺、昭成尼寺等
道觀（男女）	30	道教	玄都觀[38]、玄真觀、華陽觀等
女觀（女）	6	道教	金仙觀、玉真觀[39]等
胡祆祠	4	拜火教	分別位於布政坊、義寧坊、醴泉坊及崇仁坊[40]
波斯觀	2	景教	位於醴泉坊、義寧坊有大秦寺[41]

[30] 曹爾琴：〈唐代長安城的里坊〉，頁86

[31] 李芳民：〈唐都長安的道觀與詩人的詩歌創作〉，《古典文學知識》，2018年05期，引杜光庭《神仙感遇傳》：「進士王璘，因投旅館住宿不成，遂入豐邑坊景雲觀租一獨院居住，每月五百文即「稅轡秣馳焉」；裴鉶《傳奇・許棲岩》亦載許棲岩舉進士時「習業於昊天觀」

[32] 同上註

[33] 劉章璋：《唐代長安的居民生計與城市政策》（臺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頁87

[34] 肖愛玲：《古都西安：隋唐長安城》，頁119指出109坊中有77坊設寺觀

[35] 同上註

[36] 劉章璋：《唐代長安的居民生計與城市政策》，頁86，引［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

[37] 龔國強：《隋唐長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24

[38] 劉禹錫賦詩兩首於此觀，詩中的劉郎是指劉禹錫本人，從詩中可見詩人在玄都觀賞桃會友：〈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再遊玄都觀〉：「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開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39] 《唐會要》卷50：「金仙觀輔興坊。景雲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睿宗為第八女西寧公主入道立為觀。至二年四月十四日。為公主改封金仙。所造觀便以金仙為名；玉真觀輔興坊。與金仙觀相對。本工部尚書竇誕宅。武后時為崇先府。景雲元年十二月七日。第九女昌隆公主立為觀。二年四月十日。公主改封玉真。所造觀便以玉真為名」

[40] 宿白：〈隋唐長安城和洛陽城〉，《考古》，1978年06期，頁418

[41] 武復興：〈唐長安的市場和商業〉，頁42

長安城的寺廟可反映唐文化的甚麼特點？

長安城宗教百花齊放，體現了唐的開放多元文化內涵。

種族共融

從上表可見，長安城同時存在多種宗教。佛教是唐代的一大宗教，故佛寺數量最多。但佛教是外來宗教，早在漢代已經從印度傳入。唐皇族姓李，並自稱為老子後人，故道教成為唐朝的國教，而長安城的道觀數目亦甚多。除了在中國紮根的佛教及本土的道教，西亞、中亞的拜火教、景教、摩尼教等不同教派也在長安設立宗教場所，雖然數目不及佛寺和道觀，但也可以體現對少數宗教的包容。

有如此數目龐大的宗教建築及多元的宗教文化，反映了長安城對外交流的頻繁，不同種族紛紛到來，雖然彼此的信仰不同，但卻能在這片土地共存共處。

性別階級平等

一般而言，宗教的性質是樹立一個大同社會，導人向善，追求精神的圓滿。故此，要使不同宗教能有所發展，先要盡量移除不平等因素，比如性別及階級的差異。長安的寺觀設計充分考慮不同性別的宗教需要，既有專門為男性而設的僧寺，也有為女性量身打造的場地，如尼寺和女觀；甚或男女共用同一地方，諸如道觀。證據甚至顯示女性道教信徒的數量曾一度超越男性信徒[42]，反映了不論是何性別，在唐長安城都享有宗教自由，社會性別相對平等。

另一方面，無論是唐貴族皇室人員還是平民都有投身宗教的權利。女觀的建造乃公主出家修行的居所，比如睿宗為第八女西寧公主入道，因而建金仙觀；與金仙觀相對的玉真觀便是為昌隆公主而建[43]。另一方面，普通女性如果要修行，可選擇進入女觀，或投入尼寺、道觀。所以，不論出身在皇家還是平民家庭，都同樣有投身宗教的自由。

[42] 李炳武：《長安學叢書・宗教卷》（陝西：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三秦出版社，2009），頁56引《新唐書・百官志》：開元24年，道士776，女冠988
[43] 《唐會要》卷50

（三）東西二市，絡繹不絕

從古籍可見，長安有不少外來人口，他們在此進行文化貿易交流，有些甚至在此居住。長安城有兩個市場：東市和西市，分別位於朱雀大街左右。

東市

研究指出西安交通大學校園有部分是東市遺址，其南北長1000餘米，東西寬900餘米，街道呈井字形，比西市的街道寬一倍[44]。［宋］宋敏求《長安志》有「公卿以下民止多於朱雀街東」[45]的記載，可見東邊是長安的平民區。人口密集必然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甚大，古書所記東市有220個行業[46]，涵蓋食物、日用品、消閒、零售、服務等[47]。

西市與絲綢之路

東市人口密集，並無地方作倉庫存貨，商人轉而投向西市；西市是絲綢之路的起點與終點，外國商人到達長安之後最貼近西市，所以他們便在此交易。故此，西市較東市繁華，有更多奇珍異寶[48]。

商人中又以波斯人、大食人、粟特人[49]最多，他們被稱為「胡人」[50]，其中波斯人擅長鑑定玉石，故多經營玉石、珠寶業[51]；而粟特人則是商業民族[52]，他們多住在長安城西部，經營店鋪也多在西市。西市的南大街中部，出現似是珠寶店的遺址，有許多骨器、珍珠、瑪瑙、骰子等物[53]。骰子是中亞大陸當時流行的玩具，西市商人將骰子與珠寶一同售賣，引人聯想此貨乃出於胡人[54]。

因為大量胡人流連長安，唐代的藝術品——「唐三彩」[55]便有大量與胡人相關的題材，常見的有釉陶馬、牽馬胡人俑及胡樂師騎駱駝陶俑等瓷器造型。除此之外，波斯銀幣、羅馬金幣、阿拉伯銀幣以及波斯人〈蘇諒妻馬氏墓誌〉等文物也出土在西安西郊或西南郊[56]，印證了以上的說法。

[44] 肖愛玲：《古都西安：隋唐長安城》，頁125
[45] 《長安志》卷八
[46] 《長安志》卷八：東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
[47] 劉章璋：《唐代長安的居民生計與城市政策》，頁96-97
[48] 于賡哲：《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第二講隋唐人的城市生活（二），頁39
[49] 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頁63
[50] 武復興：〈唐長安的市場和商業〉，頁42
[51] 同上註
[52] 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頁63
[53] 宿白：〈隋唐長安城及洛陽城〉，頁418
[54] 同上註
[55] 泛指唐代的彩陶，主要以黃、綠、褐（或綠、赭、藍）三色為主，所以稱之為「唐三彩」
[56] 武復興：〈唐長安的市場和商業〉，頁42



唐三彩駝和外域商賈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甚麼是〈蘇諒妻馬氏墓誌〉？

墓誌銘是死者親屬為紀念死者而刻的碑文，一般放在墳墓上方，予人辨識身份。在眾多挖掘的文物中，最能反映中外文化交融的文物要數〈蘇諒妻馬氏墓誌〉[57]。該墓誌銘文的特點是雙語寫作，上半刻中古波斯婆羅鉢文，下半為漢字銘文[58]。

漢字誌文：

左神策軍散兵／馬使蘇諒妻馬／氏己巳生年廿六／於咸通十五年甲午／午□[59]二月辛卯建／廿八日丁巳申時身／亡故記[60]

[57] 作銘：〈西安發現晚唐祆教徒的漢、婆羅鉢文合壁墓誌——唐蘇諒妻馬氏墓誌〉，《考古》，1964年09期，頁458：「誌石為白色石灰石，略呈方形，寬39.5、高35.5、厚7厘米，無蓋。誌面刻有兩種誌文，下半為漢字，7行，每行6字至8字不等，最後一行為3字，共41字。漢字的字劃因為刻得韌而淺，有的字不甚清楚。石作也不甚精緻……僅正面因刻此文」
[58] 同上註
[59] 缺一字
[60] 作銘：〈西安發現晚唐祆教徒的漢、婆羅鉢文合壁墓誌——唐蘇諒妻馬氏墓誌〉，頁458。漢字銘文大意：第一及第二行交代了立誌人名叫蘇諒，在唐擔任左神策軍的職位。死者是他的妻子，曰馬氏。馬氏死亡時只有26歲，丈夫便為她立碑紀念

中古婆羅鉢文：

此乃已故王族，出身蘇諒家族之左神策騎兵之長的女兒馬昔師，於已故伊嗣俟240年，及唐朝之260年，常勝君王崇高之咸通十五年，〔波斯陽曆〕十二月五日建卯之月於廿六歲死去願其住地與阿胡拉・馬茲達及天使們同在極美好的天堂裡，祝福。[61]

墓誌銘的內容：

漢字銘文寫蘇諒的職位左神策軍散兵馬使，學者考察是787年時唐室授與留居長安的西域各國王子、使者的武職[62]，故蘇諒應為胡人。死者馬氏在849年生[63]，卒於874年[64]，虛歲26[65]。漢字銘文只為我們提供蘇諒在唐任職、死者名曰馬氏、馬氏生卒時間這三個有限信息。

由於兩者是外國人，我們不能單靠漢字銘文理解當中的文化，故此需要閱讀更詳細的原文墓誌銘。以中國傳統來看，蘇是姓，諒為名；馬氏，意為馬家的女兒，馬是父親家族的姓氏；婆羅鉢文墓誌顯示蘇諒乃是家族名，而不是本名，更要補充的是他是波斯王族之後。有關馬氏的身份，外文譯文與漢字銘文內容有差異，死者馬氏與蘇諒的關係是父女而非夫婦。外文的墓誌在收結時也增加了宗教色彩，為死者祈求祆（音：牽）教主神阿胡拉・馬茲達和天使的庇佑，這說明蘇諒及馬氏都是祆教信徒[66]，這是漢字銘文所沒有提到的。

〈蘇諒妻馬氏墓誌〉如何反映長安文化的多元？

1. 立誌人蘇諒和妻子都是波斯人，但他們有漢字姓名。蘇諒甚至在唐政府擔任官職，可見唐室對外國人的重視。

2. 蘇諒在長安任職，所以他和亡者生前應該常居於此，而亡者死後又埋葬在長安，顯示有外國人在長安定居，並以此為家。

3. 刻寫墓誌是中國傳統，而且該誌也是以典型的中國風格寫成：先交代死者與立誌者的關係，然後簡單交代其生卒，最後以立誌懷念短句作結。

[61] 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頁69-70
[62] 作銘：〈西安發現晚唐祆教徒的漢、婆羅鉢文合壁墓誌——25唐蘇諒妻馬氏墓誌〉，頁460，指出787年為唐德宗貞元三年，留居長安的西域各國王子及使者授予武職的官銜為左右神策軍散兵馬使
[63] 唐宣宗大中三年
[64] 唐懿宗咸通十五年
[65] 作銘：〈西安發現晚唐祆教徒的漢、婆羅鉢文合壁墓誌——唐蘇諒妻馬氏墓誌〉，頁461
[66] 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頁70

4. 墓誌為雙語寫作，包括漢字與中古波斯的婆羅鉢文，反映中西文化的融合。

除了馬氏墓誌外，還有不少胡人選擇在長安設墓[67]，可見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受漢化，且推崇唐文化。

長安佈局模式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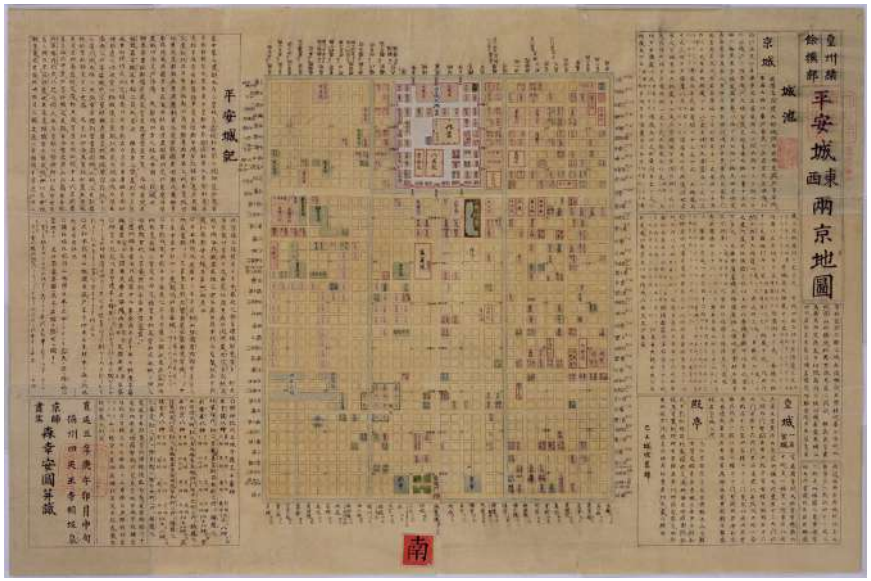
長安城的建築風格對不同地區的城市建設影響深遠，唐代東北的渤海國及日本京城的設計大體參考長安模式。「上京殘磚」出土於渤海國五京之一的上京，即今黑龍江寧安縣的東京城龍泉府城遺址。學者考究上京的整體構造仿如長安，有外廓、皇城和宮城三層，其宮城亦居於北部正中[68]。



上京殘磚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67] 韓香：〈唐代長安中亞人的聚居及漢化〉，頁64-65列舉胡人在長安設墓誌的文獻記錄，下舉幾例：康志達：終於長安永樂里官舍；安祿山：先居道政坊，玄宗後賜第親仁坊；康阿義屈達幹：卒於上都勝業坊之私第
[68] 宿白：〈隋唐長安城及洛陽城〉，頁423

此外，日本也極力吸收隋唐文化，打造出仿長安或洛陽的都城[69]。藤原京、難波京、平成京、長岡京及平安京，均採宮城居於北部正中的佈局，設朱雀大街於都城正中[70]。可見長安佈局模式的影響之廣。



平安京復原圖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總結

綜合以上所舉在宗教、商業、文化層面上的胡漢交流，均建基於唐皇室對外的開放態度。唐室主動招攬外來人口入唐，唐太宗在貞觀三年開始吸引塞外平民，歸附者達120萬[71]。不同種族人士來到長安，有期間性的商業活動，更有長久的文化融合，胡化、漢化同時進行。這一方面流露出唐室對外來文化的尊重；另一方面，唐文化的高度亦為外國人所仰視。彼此來往，達致文化互相影響融合，產生新的結晶物，拼湊出多彩繽紛的大唐盛世。

[69] 宿白：〈隋唐長安城及洛陽城〉，頁423
[70] 同上註，及上文「長安城宗教列表」（頁93）
[71] 劉章瑋：《唐代長安的居民生計與城市政策》，頁34

9 「唐宮仕女圖」與唐朝女性生活特色及地位

唐代藝術種類多元，其中人物繪畫以仕女圖的成就最高。仕女圖描繪唐代貴族女性的閒適生活，她們生活優渥，身穿華衣美服，活動較其他朝代的婦女自由。是次我們藉仕女圖透析唐代貴婦的生活、服飾打扮、娛樂文化，繼而說明當時的社會風氣如何提高女性的地位。下文將以唐代周昉（音：訪）[1]《簪花仕女圖》及佚名《宮樂圖》兩畫作分析。

甚麼是仕女圖？



宋人臨摹之《虢國夫人游春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宋徽宗臨摹的《搗練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揮扇仕女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1] 周昉（8世紀－9世紀初），又名周景玄，字仲朗，唐代著名仕女圖畫家，官至宣州長史

仕女圖又名仕女畫或綺羅人物畫，是起源於兩晉的傳統人物畫，而唐代則是中國仕女畫的創作高峰[2]。仕女即宮廷的女性，如皇室貴族、嬪妃等。因為她們常年生活於宮廷之中，日常生活由宮人負責，所以造型和衣著不同於勞動階層的婦女：仕女一般穿著華衣美服，形象端莊從容[3]。張萱和周昉是唐代最著名的仕女圖畫家，前者有《虢國夫人游春圖》[4]及《搗練圖》兩作，而周昉則有《揮扇仕女圖》及《簪花仕女圖》，連佚名所作的《宮樂圖》，五圖合稱「唐宮仕女圖」。由於張萱之畫作原本已經失傳，現僅可見後代畫家的臨摹本，雖可從中透視唐代女性的風韻及當時的社會狀況，但亦恐防畫的內容有刪減變更，影響其真實性和可信程度，故本文僅選取周昉《簪花仕女圖》及佚名《宮樂圖》兩圖討論唐代女性的生活狀況及特色。

仕女圖有何歷史價值？

仕女圖繪畫古代女性的生活狀況，是幫助我們了解古代女性生活和內心世界的上佳史料[5]。在美學層面，不同朝代均有其特色服裝，我們可從仕女圖還原當時女性的衣著妝容及時人的審美概念。在社會文化層面，女性的裝扮、行為與當時社會風氣息息相關，因此仕女圖又可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態。仕女圖起源於六朝，後代文人畫家亦作圖記錄女性之美，因此對比歷代的仕女圖，我們便可從中窺見女性地位的變化。綜合以上，仕女圖雖然只是女性的肖像畫，但卻有非凡的歷史價值，是探究古代社會文化狀態的一手資料。

[2] 趙文潤：《隋唐文化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頁275
[3] 段亞蕾：〈透過《簪花仕女圖》觀唐代女性生活〉，《青年文學家》，2017年20期，頁180
[4] 《虢國夫人游春圖》描畫虢國夫人騎馬春遊的畫面。虢（音：隙gwik1）國夫人，乃楊貴妃之姊，在堂姊妹中排行第三
[5] 譚梅：〈淺析唐代仕女畫的藝術特點〉，《美術大觀》，2017年10期，頁68-69

仕女圖作為史料有甚麼需要注意？

歷代畫家都是按照自己心中的美的典範來塑造仕女形象[6]，而中國傳統中有許多以女性為題材的繪畫作品，比如歷史人物、仙女、神女、美婢等，畫中的女性未必真實存在，她們的形象多是畫家根據詩詞、坊間傳聞，甚至是個人想像繪畫出來[7]。畫中的女性美則美矣，但所有女性美好的形象都是在刻板地宣傳婦德，使仕女圖淪為社會教化的工具。然而，唐代仕女圖中女性的形象與其他時代不同，畫家主要是按真人生活繪畫，畫作不帶任何教化目的，繪畫只是一種記錄生活的藝術手法。故唐代仕女圖中的女性形象會較其他朝代真實。

唐代仕女圖有何特色？

唐代的仕女畫一般是設色的絹畫，畫面以對角線構圖，左右對稱，描繪女性全身肖像、宮廷仕女的生活，是貴族女性豐富多彩生活的真實寫照[8]。畫中婦女豐腴的體態、精美的服飾及慵懶的神態，躍然紙上[9]。人物站位高低有序，畫家同時以「近實遠虛」，暗示身份高低[10]。下文將以《簪花仕女圖》及《宮樂圖》兩畫作具體說明。

[6] 譚梅：〈淺析唐代仕女畫的藝術特點〉，頁68-69
[7] 同上註
[8] 郭萍：〈仕女畫從宮廷走向民間——以綿竹年畫為例〉，《美術大觀》，2013年03期，頁54
[9] 譚梅：〈淺析唐代仕女畫的藝術特點〉，頁68-69
[10] 同上註

《簪花仕女圖》



［唐］周昉《簪花仕女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簪花」是指髮髻上加插花朵裝飾[11]，石榴裙配簪花是唐代貴族婦女的經典造型，這可見於《簪花仕女圖》。除侍女（左4）之外，畫中五名女眷插上牡丹、蓮花、海棠、芍藥和絹花點綴髮髻[12]。

畫家：周昉
成畫時間：中晚唐
材質：絹畫設色
大小：46厘米×180厘米
館藏：遼寧省博物館
畫卷特點：畫面以三段拼接，畫家把人物、小狗、白鶴均勻地排列[13]。整個畫面左右對稱，卷首與卷尾的仕女前呼後應，準確地刻畫了六個仕女的各種姿態：賞花、戲蝶、春遊及逗犬[14]，展現唐代貴族女性的閒適生活。

解畫：

《簪花仕女圖》描畫宮廷仕女在園中嬉戲遊樂、怡然閒適的生活場景[15]。圖中有六位女子，她們多身穿斜格圖案的硃砂色長裙——石榴裙，或以藍紅二色相間的團花圖案，配以素色紗衣[16]。最左邊的婦女身處辛夷花旁，她嘴角微微上揚，一手輕捻蝴蝶，回過頭望向地上跑過來的小狗，似是在賞花時被小狗的叫聲吸引過來。左二的婦女靜靜站立，側身看著遠處的辛夷花。小狗的後面有一隻白鶴正向左邊前行，看似是在追趕牠；牠們歡樂地玩耍，你追我趕，好不快活。鶴在中國的文化中與君子的品格及仙道有密切的關係[17]，畫中的白鶴或帶有這樣的寓意，但同時也可能暗示婦女的所在地並非室內，而是花園中或野外。畫面正中是一個面向左邊捻著石榴花的女子，姿態優雅，在她身後不遠處有一個低眉順目的掌扇侍女[18]。畫面的右邊有兩個女子，一個正以棒逗弄小狗，另一個則在觀望她們嬉戲的過程。從《簪花仕女圖》可見唐代婦女生活較自由的一面。

畫家周昉出身於顯貴之家，又歷任越州長史和宣州長史，遊於卿相之間，所見非富即貴[19]。一般宮廷畫師是為統治者服務，奉旨而繪，作品容易失卻本身的風格；但周昉是官員，從官宦人家日常生活玩樂中取材，其創作背景相對輕鬆，作品不必為政治服務，可將上層社會的奢靡生活刻畫得真實生動[20]。

有學者分析《簪花仕女圖》中女性的活動及神態，認為此畫是「浮華的表像中透露出幽怨之情」[21]。畫中的「婦女縱然是體貌豐盈、雍容華貴，也掩不住內心百無聊賴，她們的精神世界極度匱乏[22]。這種對比或是標幟著唐經歷安史之亂由盛轉衰的真實寫照，皇室雖然依舊生活奢靡，但是社會氛圍已經大有不同。也有學者認為婦女的憂鬱之情，是畫家的個人寫照[23]。唐代集賢院設有畫直，專門為宮廷婦女畫像，然而繪畫在唐代卻登不上正席，畫家對此深感遺憾[24]。

[11] 中國文化研究院：〈簪花是古時身份的象徵〉，網址：https://chiculture.org.hk/tc/china-five-thousand-years/1636，瀏覽日期：2021年3月3日
[12] 黃秀蘭、張幃超（著）：《簪花仕女圖》（臺北：天行書苑，2017），頁56
[13] 譚梅：〈淺析唐代仕女畫的藝術特點〉，頁68-69
[14] 同上註
[15] 同上註
[16] 段亞蕾：〈透過《簪花仕女圖》觀唐代女性生活〉，頁180
[17] 練璎：〈《簪花仕女圖》中的動物形像對主題表現的分析〉，《青年文學家》，2017年17期，頁169
[18] 黃秀蘭、張幃超：《簪花仕女圖》，頁71
[19] 王宗英：《中國仕女畫藝術史》（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0），頁36
[20] 譚梅：〈淺析唐代仕女畫的藝術特點〉，頁68-69
[21] 郭萍：〈仕女畫從宮廷走向民間——以綿竹年畫為例〉，《美術大觀》，2013年03期，頁54
[22] 同上註
[23] 譚梅：〈淺析唐代仕女畫的藝術特點〉，頁68-69
[24] 同上註

《宮樂圖》



佚名《宮樂圖》（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宮樂圖》描繪了唐代貴婦飲宴的場面，在宴會中婦女或吹奏或暢飲，一派閒適。由於作品沒有畫家的款印，因此曾被命名為《元人宮樂圖》[25]。但學者觀察畫中人物的髮式，有將髮髻梳向一側的「墜馬髻」，有把髮髻向兩邊梳開、在耳朵旁束成球形的「垂髻」，也有頭戴「花冠」，凡此都符合唐代女性的裝束[26]。另外，繃竹蓆的長方案、腰子狀的月牙几子、飲酒用的羽觴[27]，還有琵琶橫持，並以手持撥子的方式來彈奏等，亦與晚唐的時尚相侔（音：謀）[28]。因此，將畫名改為《唐人宮樂圖》[29]。

畫家：佚名
成畫時間：晚唐
材質：絹畫設色
大小：48.7x69.5cm
館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25] 臺北故宮博物院：《唐人宮樂圖》，網址：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0957#inline_content_intro，瀏覽日期：2021年3月5日
[26] 同上註
[27] 觴（音：商），是古人喝酒的器皿
[28] 臺北故宮博物院：《唐人宮樂圖》，網址：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0957#inline_content_intro，瀏覽日期：2021年3月5日
[29] 同上註

解畫：

畫中有十個美婦圍桌環案而坐，有兩個侍女站立於畫面的左方。畫面的正中是一張巨型的方桌，桌面上擺放著茶具，顯示婦女正在舉辦茶會。畫家以人物的姿態和衣著區分身分，坐著的婦女精心梳裝，佩戴各式的步搖、梳篦（音：避）、簪釵[30]，她們衣飾華麗，在享受宴會，中央四人吹樂助興，所持用的樂器，自右而左，分別為篳篥（音：不律）、琵琶、古箏與笙[31]；畫面左邊，吹笙婦女身後有一白衣侍女站立輕敲牙板，為演奏的美婦打節拍助興[32]；戴「花冠」的女士（左3）手執扇子，她旁邊坐著的婦女（左4）正在煮茶。左邊最近的女子（左5）則在細啜茶湯，藍衣侍女在其身後輕扶，美婦看起來像是「醉茶」。其實不只酒會醉人，空腹喝茶也會醉，桌面上沒有吃食，而美婦又大量飲用茶水，因此出現暈眩的症狀。

畫面的右邊有一女子（右2）手執長柄茶杓，正從席桌中央的大茶釜盛取茶湯分入茶盞裡[33]；一女子（右3）手持茶盞朝外斜視[34]，一女子（右4）手執扇子背向畫面，看不到她的神情，但似乎是在聽音樂或與人聊天。從每個人臉上陶醉的表情來推想，席間的樂聲應十分優美，茶香瀰漫，在席桌底下一隻連蜷趴臥慵懶的小狗，與悠閒的氛圍融為一體[35]。

兩畫所示的唐代貴婦生活與風尚

《簪花仕女圖》與《宮樂圖》為我們還原唐代上層女性的真實生活。由於兩幅仕女圖都是婦女的群體畫像，並非單獨的肖像畫，這佐證了唐代貴族女性群體都是一同進行活動，並非獨例。兩圖均記錄了唐代貴族婦女休閒生活的情景：前者描畫的是女眷盛裝打扮春遊之景，後者則是女眷聯歡宴會的場面。事實上，唐代女性在元日、人日、上元節、寒食節、清明節、上巳節、七夕節、重陽節和除夕等節日都有相應的活動[36]，而遊園和飲宴會是最為普遍的應節活動。日常活動方面，唐代貴婦會欣賞音樂、豢養小動物，也參與馬球、驢鞠、蹴鞠等比賽[37]，可見唐代女性的社交生活十分豐富。

[30] 陳乃惠：〈唐代《宮樂圖》的表現美〉，《懷化學院學報》，2013年12期，頁95-97。步搖、梳篦及簪釵均為女子梳頭挽髻的裝飾物。步搖是在笄（音：雞）、簪上的飾物，因為行走時隨着腳步的移動，垂掛着的珠玉便會不停的搖動，故稱為「步搖」；梳篦，篦，為密梳
[31] 臺北故宮博物院：《唐人宮樂圖》，網址：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0957#inline_content_intro，瀏覽日期：2021年3月5日
[32] 同上註
[33] 陳乃惠：〈唐代《宮樂圖》的表現美〉，頁95-97
[34] 同上註
[35] 同上註
[36] 孫玉榮：〈唐代歲時節日中的女性休閑活動〉，《湖北理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02期，頁15-18及60指出唐代婦女在節日有以下活動：元日（正月初一），婦女設家宴；人日（正月初七），女性造華勝，用紙、金箔剪成人形或花鳥，即剪紙；上元節（正月十五），女性出遊觀燈。婦女在寒食節及清明節會傾家出城郊遊、打球、賞花；上巳節（三月初三），婦女在水邊祓禊（音：忽揭。古人在水邊以香薰草藥沐浴，以除不祥的一種祭祀）祈福，而後春遊祈福。端午盛行競渡、射粉糰之戲。婦女在七夕節則會穿針縫紉。至於重陽節，唐代婦女便會登高野飲。除夕，唐代婦女流行歡飲守歲、點燎火
[37] 胡輝：〈閨門內外話休閑——以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為中心〉，《湖北理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04期，頁35-40

讀者或有疑問：我們從何得知圖中女眷是貴婦？能證明仕女的身份有三大原因：

1. 兩圖婦女的打扮和行為是相吻合的。她們穿著華貴的服裝，畫上精緻的妝容，髮髻華麗繁瑣，如果沒有一定的財力和時間是不會這樣打扮的。加上舉手投足之間散發著貴氣，這種精神氣度絕非平民婦女可比擬。同時，貴婦有此打扮是證明她們不須從事勞動，每日生活無所事事，非常需要消磨時間，於是便衍生出逗狗、戲蝶、遊園及宴飲等一系列的悠閒活動。

2. 兩圖的宮婦都有侍女隨行伺候，從衣著打扮和行為中也可透視階級地位的差異。《簪花仕女圖》有六名婦女，當中有一個侍女持扇隨行；而《宮樂圖》則有十二位婦女，左邊有兩個侍女：白衣侍女敲牙板助興，而藍衣侍女則輕扶醉茶美婦。侍女的衣服與貴婦有明顯的分別，這點《宮樂圖》表現得更為明顯：左邊站立的兩個侍女頭梳雙髻、身穿素色無花紋的簡便男裝，身上甚至連裝飾品都沒有。

3. 以猧（音：窩）子狗為寵物，證明畫中婦女身份非凡。《簪花仕女圖》中有兩隻小狗，其一在與白鶴玩耍，另一隻在被宮人逗弄。而《宮樂圖》中的小狗則捲縮在桌子下睡覺。這種狗是唐初自高昌傳入，叫做猧子[38]。牠們的毛髮較長，耳朵耷拉，嘴巴和鼻子也相對扁平，和現在的京巴狗十分相似[39]。由於是貢品，所以十分珍貴，只有皇帝妃子和朝中大臣才能飼養[40]。兩仕女圖都出現猧子，說明了兩點：這些女眷身份顯赫，呼應仕女的身份；猧子進入中原社會之後便成為唐代上層女性的貼身玩物[41]，反映唐代女性生活無聊，養寵物解悶，為我們透析唐人生活的風尚。

[38] 練瓔：〈《簪花仕女圖》中的動物形象對主題表現的分析〉，頁169。猧子又名拂菻（音：林）狗，拂菻即拂菻國（Byzantine Empire），是中國中古史籍中對東羅馬帝國的稱謂。其首都位於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堡）
[39] 同上註
[40] 同上註，引杜文玉：《唐代宮廷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頁326
[41] 孫玉榮：〈寵物與唐代女性休閑生活〉，《湖北理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06期，頁30-33及40

為何唐代是仕女畫的巔峰？

歷代都有仕女畫，而唐代的仕女畫的藝術成就處於巔峰，後世莫之能及。盛唐之際，國力昌盛，富貴奢華之風在當時社會慢慢浸染開來，上層社會的奢靡生活一時成為創作表現的主要元素，仕女畫也由此發展起來[42]。而文化、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的優越性，賦予唐代貴族婦女華貴、大方的氣質[43]。然而這種氣質並沒有被之後的朝代繼承，宋明以理學思想統治，各種清規戒律的限制加諸在女性身上，令貴族女性生活在封閉的高牆之內，與世隔絕[44]。仕女畫題材因而變得狹窄，一種慵懶、冷寂、悠遠之情佔據主體[45]。

唐代仕女畫的非凡成就，是女性社會地位提升的表現，甚至有學者表示：「唐代婦女是中國古代婦女中比較幸運的一群」[46]，此離不開以下因素：

1. 唐代社會胡風盛行，多種意識形態共冶一爐，減弱對女性的束縛，大大擴寬上層女性的交友空間[47]。唐皇室有鮮卑族的血統[48]，而且頻繁地與邊疆民族交流、通婚[49]。因多種文化思想在那時代急速交融，儒家思想不再佔領主導的位置，而是呈現一種儒釋道三足鼎立的狀態，故放寬了對禮教的要求[50]。

2. 在唐代前期以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為基礎的土地賦役制度之下，女子亦獲授田交租，參與生產，平民女子並非三步不出閨門[51]。

3. 唐代貴族階層普遍重視女性教育，即便是女子也可通過各種途徑接受教育[52]。季振宜《全唐詩》錄唐詩人1895人，其中女詩人就有124

[42] 譚梅：〈淺析唐代仕女畫的藝術特點〉，頁68-69
[43] 儲湘茹：〈淺析《虢國夫人游春圖》所反映的社會風尚〉，《青年文學家》，2013年16期，頁171
[44] 郭萍：〈仕女畫從宮廷走向民間——以綿竹年畫為例〉，頁54
[45] 同上註
[46] 孫玉榮：〈唐代歲時節日中的女性休閑活動〉，頁15-18及60，簡報中對比了〔東晉〕顧愷之《洛神賦圖賦圖》（宋臨本）、〔南宋〕陳清波《瑤台步月圖》、〔明〕文徵明《湘君湘夫人圖》及〔清〕焦秉貞《桐蔭仕女圖屏》，發現其他朝代的仕女圖多是圍繞神話、文學作品或女性的閨房生活為題，畫中的女性多身材纖瘦苗條、情態抑鬱，與唐代仕女圖所繪畫的女性有很大分別
[47] 黃兆宏：《南北朝及唐代女性社會群體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6），頁154-156、159-161
[48] 胡輝：〈閨門內外話休閑——以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為中心〉，頁35-40，引孫玉榮：〈論唐代社會變革期的女性婚姻地位〉，《婦女研究論叢》，2009年05期。黃兆宏：《南北朝及唐代女性社會群體研究》，頁155指出李氏多與鮮卑聯姻，比如李淵之母為獨孤氏，妻子竇氏、李世民妻長孫氏都是漢化的鮮卑族人
[49] 黃兆宏：《南北朝及唐代女性社會群體研究》，頁154，吐蕃、回紇、突厥等少數民族與唐政府長期保持政治婚姻
[50] 同上註，頁159-161
[51] 胡輝，〈閨門內外話休閑——以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為中心〉，頁35-40
[52] 同上註

人[53]，佔整體的6.5%，出現如此多的女性作品是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54]。

4. 唐代女子有一定擇偶、離婚、改嫁的自主權和財產繼承權，社會地位相對較高[55]。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頒布了「勸勉民間嫁娶詔」，其中規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其妻喪達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媒媾，令其好合」[56]。《唐律疏議》規定「若夫妻不相安諧，謂彼此情不相得，兩願離者」[57]，允許女性提出離婚。唐朝前期從上層婦女到一般民間婦女都不忌諱再嫁，從皇帝貴族到平民百姓形成一種普遍現象[58]。《新唐書・公主傳》記載公主211人，有27位公主曾改嫁，而且中宗的安定公主、玄宗的齊國公主、肅宗的蕭國公主甚至是三嫁[59]。這充分證明了唐中期以前婦女再嫁是不受限制的，貴婦也不以再嫁為恥[60]。

5. 武曌於690年稱帝，因為她是第一個女性帝王，所以在任大量求諸女史，提拔有才能的女性擔任重要職位。除了上官婉兒之外，司馬慎微之妻李氏及殷履直之妻顏氏等女性亦獲提拔在朝任職[61]。上層女性可以在政府任職，在國家政治中發揮著一定作用[62]。以上兩幅仕女圖由於沒有特別交代畫中女子的身份，故不能推論她們到底是嬪妃還是女官，但卻為解讀畫作帶來更多可能性。

[53] 以李冶、薛濤、劉采春、魚玄機最為著名，她們並稱為「唐代四大女詩人」。簡報舉出魚玄機的《浣紗廟》「吳越相謀計策多，浣紗神女已相和。一雙笑靨才回面，十萬精兵盡倒戈。范蠡功成身隱遁，伍胥諫死國消磨。只今諸暨長江畔，空有青山號嶓蘿（音：寧羅。青山號嶓蘿（音：寧羅。山名，在浙江省諸暨市南，相傳為西施的出生地）。」為例，指出其詩風雄渾，能反思歷史事，思想頗具深度

[54] 詹志紅：〈封建政權統治下的唐代女性生活與詩歌〉，《齊齊哈爾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1年05期，頁85-86

[55] 胡輝：〈閨門內外話休閑——以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為中心〉，頁35-40，引孫玉榮：〈論唐代社會變革期的女性婚姻地位〉。雖然婦女可享有離婚自由，但是仍是受限於規例，只可以說是相對自由，而非絕對自由。婦女仍受限於父母之命、七出之條：不順父母、無子、淫僻、惡疾、嫉妒、多口舌、盜竊，妻子犯上任何一條，丈夫都可以出妻。而和離的基本是需要夫妻二人達成共識，若婦女擅自離去、改嫁，是會受到法律的懲罰

[56] 轉引自丁兆倩：〈論析漢唐宋時期寡居婦女再嫁問題〉，《臨沂大學學報》2014年04期，頁76-78

[57] 〔唐〕長孫無忌等著：《唐律疏議》，卷第十四戶婚（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頁243

[58] 丁兆倩：〈論析漢唐宋時期寡居婦女再嫁問題〉，頁74-78

[59] 黃兆宏：《南北朝及唐代女性社會群體研究》，頁144

[60] 丁兆倩：〈論析漢唐宋時期寡居婦女再嫁問題〉，頁74-78

[61] 上官婉儀（664－710年），唐朝的女官、詩人、政治家，唐高宗時期宰相上官儀的孫女，亦是唐高宗李治之才人、唐中宗李顯之昭容，因此又稱上官昭容。十四歲時，因聰慧善文得武則天重用任女官，掌管宮中制誥多年，有「巾幗宰相」之名；司馬慎微之妻李氏，曾為武則天女史官之一，司馬慎微的墓誌銘記「載初年，皇太后臨朝求諸女史，敕穎川郡王載德詣門辟召侍奉……墨制詞，多夫人所作」，李氏在武周時期為女帝制誥；殷履直之妻顏氏為顏真定（654—737年），她是顏真卿的姑母，以其「精究國史，博通禮經」，選為女史

[62] 胡輝：〈閨門內外話休閑——以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為中心〉，頁35-40

小結

基於以上的原因，唐代社會環境較自由，婦女的地位得到提升。她們不僅可以進行靜態的活動，如作詩、欣賞音樂、下棋、豢養小動物，也可與男性一同參與馬球、驢鞠、蹴鞠、射獵、拔河等比賽[63]。輕鬆開明的社會，豐富女性的休閒娛樂，令她們的日常生活更多樣化[64]；女性敢於打扮，以豐腴為美，且敢於表達自我，畫家可畫的題材增加，且不必為政治服務[65]。因此，唐代仕女畫也由教化功能轉向單純的審美，畫家選材為仕女的日常生活[66]，其藝術成就自然冠絕各代。

總結

《簪花仕女圖》及《宮樂圖》兩幅仕女圖為我們透析了唐代貴族女性的生活、服飾打扮、娛樂文化乃至當時的社會風氣。圖中可見，唐代貴族女性的休閒生活多樣化，印證了唐代較輕鬆自由的社會風氣，以及女性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63] 萬軍傑：《唐代宮女生活研究》（北京：社會文學出版社，2019），頁79-149及胡輝：〈閨門內外話休閑——以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為中心〉，頁35-40

[64] 胡輝：〈閨門內外話休閑——以唐代女性日常生活為中心〉，頁35-40

[65] 譚梅：〈淺析唐代仕女畫的藝術特點〉，頁68-69

[66] 同上註

書名　古物新知 中國歷史科教學資源冊（中一級）
編撰機構　嶺南大學歷史系
主編　梁萃行　劉智鵬
研究助理　翁靜儀
出版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版次　2025年3月第一版
規格　16開（140 X 210 mm）

© 2025本書版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所擁有。學校及機構可選取適用內容作非牟利之教學用途。任何人士未經版權持有人同意，不得翻印本資源冊內容作商業用途。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2025